



G649.712  
H346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 美国高等教育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美] 罗伯特·M·赫钦斯 著  
汪利兵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A102504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高等教育/(美)赫钦斯著;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2002.12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318-5

I.美... II.①赫...②汪... III.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945号

---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美国高等教育**

[美]罗伯特·M·赫钦斯著

汪利兵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5 字数 130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

**ISBN 7-5338-4318-5/G·4288**

**定 价：10.00 元**

#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萍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所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 译者前言

罗伯特·M·赫钦斯(1899—1977),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历任耶鲁法学院院长(1928—1929)、芝加哥大学校长(1930—1951)、福特基金会副主席(1951—1954)、共和国基金会主席(1954—1977)、《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席(1947—1977)、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主任(1959—1973,1975—1977);著有《不友善之声》《美国高等教育》《为自由而教育》《民主的困境》《教育的冲突》《乌托邦大学》《学习的社会》。

赫钦斯是当代西方自由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反对大学过分专业化,强调学生的心智训练,强调名著学习的重要意义。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他积极引进名著学习课,推动大学机构重组,捍卫学术自由,在当时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高教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重视保持西方的智力传统,长期担任《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席,主编了54卷本的“西方名著丛书”(1952年),并与莫蒂默·J·阿德勒合编了《当代伟大的思想年鉴》(1961年),为整理和推广西方名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为罗伯特·M·赫钦斯的代表作。原著于193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36年和1937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印

刷,在美国当代高等教育史上有广泛影响。

本书正文部分共四章。第一章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第二章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第三章阐述什么是普通教育;第四章从普通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什么是高等教育。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如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化倾向、学科间的孤立主义现象、学习经典名著的价值和意义、大学应强调学生的思维训练等等,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除正文之外,我们还选译了《赫钦斯传》的部分章节,以及赫钦斯的亲密同事莫蒂默·J·阿德勒所写的“名著:过去与现在”,作为本书的附录,希望为读者了解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以及有关名著运动的各种问题和争论,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本书的正文部分由汪利兵翻译,附录一由倪劲锋、吴鸿翻译,附录二由邝伟乐翻译。汪利兵对附录部分进行了校对。

王承绪先生不顾九旬高龄,对译稿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并惠赐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永为学界典范。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译文肯定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作为正文的主译者及附录的校阅人,我愿意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汪利兵**

2001年10月

# 目 录

译者前言 .....	汪利兵
第一章 外部环境 .....	1
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两难困境 .....	20
第三章 普通教育 .....	35
第四章 高等教育 .....	52
附录一 赫钦斯与名著阅读运动 .....	69
附录二 名著:过去与现在 .....	155



## 第一章 外部环境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将考虑美国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在第二章,我将讨论大学,特别是专业性学院所面临的一些特别的困难。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将分别指出什么是普通教育,什么是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深受混乱的困扰。这种混乱开始于中学,并一直延续至大学的最高层次。中学不能确定是为学生将来的生活作准备,还是为他们进入大学作准备。它们的学生多种多样,但是课程却相当一致,没有考虑到学生们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律师、职员或劳工。这种课程显然只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需要,即预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需要。

在大多数地方,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是中学的延续,其学生大体与中学相似,只不过人数较少罢了。在这里,也存在学生是在此结束其教育,还是准备继续进大学深造这一问题,而且这种机构的目标也不明确。

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有一部分属中学性质,有一部分属大学性质;有一部分从事普通教育,有一部分从事特殊教育。它时常看上去像一所师资培训机构,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它所颁发的学位似乎证明,学生已平安地通过了一个

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触犯任何地方、州和联邦的法律;同时也证明,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东西有良好的(即便是暂时的)记忆。正如我稍后要表明的那样,人们很少提及学生所学的许多东西具有多大的价值。

大学与学院(college)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专业性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和博士学位。目前,我不知道大学为什么应该有专业性学院,或这些专业性学院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专业性教育包括重复前人留下的规矩,或不同程度地发展我们认为更加有效的各种理念。博士学位因为成了学院或大学教师的一个必要标志而丧失了其他意义。然而,大学还要从事研究工作,并希望训练研究人员,授予博士学位是对研究的认可。那些将要成为教师的学生,接受的却是一种培养研究者的教育。大学本科的教学、课程、学习内容及培养目标和中学一样混乱。

当然,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夸大了高等教育的困境。实际上,它也有许多令人羡慕的优点,至少它能友善地接纳任何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人士。不过作为投身于高等教育的人士,我们也应该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汲取些什么。直至本次大萧条开始,要求增加教育机会的呼声还非常高。任何以教育的名义出现的事情都是好事,就是因为它们借着教育的名义。我认为,教育的魔力已经失去,如果我们希望保持我们拥有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计划。正如过去几年的情况所表明的,我们的人民将在经济的压力下盲目前进;他们将破坏最好的东西,同时却将那些最坏的东西保留下来,除非我们使他们更清楚地对这两者作出甄别。

如果接下来的问题是讲清楚高等教育,那么就让我们考察一下高等教育之所以混乱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非常粗俗,就是追逐金钱。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这很可悲,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教育领域的资金有三个来源,即学生、捐赠者及立法机关。制定一项能吸引其中任何一类人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我曾提出的那样,这经常也是徒劳的。如果学校董事会能够拒绝那些仅仅反映富人们一时兴趣的捐赠,那么大学现有的混乱局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消除?一所大学所接受的有限捐赠,从来没能偿还为得到此捐赠所付出的代价。富人们如果提供了资助,他们可能就不会向大学提供相应的场所或所需的图书和设备;如果提供了场所,可能就不会提供这些场所的维护费用;如果提供了场所的维护费用,可能就不会为这些场所配备人员。仅仅从财政的角度看,与获得捐赠之前的情况相比,大学在获得捐赠之后的情况反而更糟。从教育和科学的角度看,大学可能会失去平衡,走向混乱。对捐赠者一时兴趣的依赖,意味着没有人能搞清大学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只要有人愿意出资,不管什么都会成为明年的政策。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大学不需要钱,或大学不应该尽力去争取资金。我只是想大学应该有一个教育政策,然后努力为之筹措经费,而不是让财政上的一些偶然事件决定其教育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学费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公正地说,美国大学应该尽量减少来自学生方面的收入。这是真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大多数有损自身声誉的事情都是为了维持或增加这方面的收入。为了维持和增加这方面的收入,公

众一时的兴趣也和那些百万富翁的一时兴趣同样受到关注。如果公众对都市报纸感兴趣,那么新闻学院就会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公众对大企业的发展怀有敬畏之心,那么同样受到尊重的商学院也会纷纷出现。如果一个行政当局由于扩大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导致公务员队伍的增加,那么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就会成为大学的首要责任。目前,公共行政、住房、林业以及航空是大学最具吸引力的学科,就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热衷于学习国际关系一样。犯罪、离婚、童工、公费医疗制度以及律师的腐败,随时都可能通过一些突发事件成为高等教育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无疑,对金钱的追逐以及相应的对公众要求的敏感,与将大学看做是服务站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这种观念,大学必须扩大自身在社区中的影响,必须使社区不断地和普遍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一所州立大学必须帮助农民照看他们的牛群;一所捐办大学必须通过在下午和晚上时间授课,帮助成年人得到更好的工作。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教授可能有别于那些致力于发展教育和增进知识的教授。既然一所大学不能有两类教授,与此同时仍然对自身的目标有明确的认识,那么推广工作只会造成学校的混乱。

大一和大二学生与那些从事研究生水平和专业性学习的人使用同样的教室及实际上同样师资队伍,很难说有什么合理的地方。除非我们在大学前两年将所有不可能成为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学生,或者应该在心智培养方面采取特别措施的学生排除在外,否则我们必定会使一所本应致力于学术、专业性教育和心智训练的高校产生混乱。至少,在大多数州立大学,并没有人主张大一和大二学生是大学应该提供的这类智

力工作的对象。在这里,他们的出现是出于民主的观念,对此我稍后再作叙述。不过,在那些捐办的高校,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的出现是出于对金钱的追逐。如果失去这些学生,大学的收入将受到损失。而且,因为学校在他们身上的开支比起他们的高年级同学要少得多,而他们支付的却是同样高的学费。学校在净收入方面的损失,相对于他们的人数和总的学费收入很不相称。没有这些学生,学校的运动、联谊和社交设施要作出重大的调整,留给校友们的将是痛苦的嚎叫。

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存在,造成下述两个必有其一的不良结果。一方面,大学可能会成为一所发展过快的畸形学院。在那里,一位教授的成功取决于他使学生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以及他在课外对学生道德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力。在这样一所高校,指导教育政策的是学生的意见,或者甚至是学生的书面意见。另一方面,大学可以从大一和大二学生那里赢得收入,将他们交给获得教学职位而不是研究员职位的研究生。在这种情况下,职位的升迁取决于研究。但是对本科生教学的兴趣也是一项明确的义务,因此一所试图招收大一和大二学生的大学最后既做不好大学工作,也做不好学院工作。这类情况目前几乎在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或多或少存在。

我只能想到一种方法使大学能够接纳大一和大二学生,做好他们的工作,同时又很好地履行大学的义务。这就是要认识到大学可以通过揭示什么是普通教育来对公共教育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普通教育应该在中学三年级至大二结束这段时间进行。我没有看到公立学校花费过时间和精力去发展适合于普通教育的组织方式和教学内容,我看到的

是一个大学系科是如何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希望和态度,要推动大一和大二的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几乎没有大学对公共教育感兴趣,或在其中发挥重大影响。对于这些大学,惟一的答案是取消大一和大二。其次,即使一所大学有能力发展公共教育项目,它是否应该这样做也是个疑问。一所大学在高等教育问题上的麻烦已经很多了,承担起慈善性工作的重担不管如何有价值,只会降低大学在履行本职工作方面的效率。

有一个方法也许能使这类慈善工作避免这种不良的结果——从事普通教育的系科必须独立于甚至脱离大学。它们要毗邻大学,以便利用大学的设施和大学的工作人员;又要与大学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使自己能在没有大学其他系科干预和控制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问题。这类机构是否曾经出现过,如果出现过,它能否取得成功,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从学院和大学工作目标的不同引起的混乱走向有序。

对金钱的追逐意味着一所大学必须吸引学生。要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有吸引力。在人们看来,这就意味着学校必须要作出超常的努力向年轻人提供食宿和娱乐条件。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和高等教育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会猜想学生是看重这些的。遍及所有学院和大学的对体育运动和社交生活的重视,已经成为导致学校混乱、削弱美国高等教育的罪魁祸首。

一般认为,学生总希望教育是有趣的,而家长总希望教育是安全的。因此,大学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精力保护学生的身体和道德福祉,家长一定会感到他们的子女是掌握在好人

手里。至于这些人是否已经没有精力,那没有关系。系科必须抛开本职工作,将精力转移到改进委托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行为和健康的这些不符合他们志趣的工作上来。

对金钱的追逐导致注重数量,注重数量造就了美国的教育评估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年轻人在智力上的进步取决于他们在校的出勤时间、所修的课时以及在授课老师主办的考试中重复上课内容的比例。诸如此类的标准,决定了学生从一个教育单位升到另一个教育单位,是专业性学院入学和毕业的依据。显然,这些标准实际上是诚实、顺从和记忆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它们应该被看做是智力的真正指标。这些标准之所以被采纳,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些武断的和机械的方法,以应付大量的学生,而这些方法是最简便的。任何其他的方法都会迫使我们考虑我们的课程,并制订出成绩测试的方法,而大量的学生使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方面的考虑。

在大学中,对金钱的追逐体现在一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可能会从校长和学校董事那里找到这一点,也可能会想他们最不可能听到此事的地方会是系科的会议室。但恰恰相反,许多教授在对任何改进教育的建议作出即时反应时,往往会流露出对大学收入的关切,因为他们在要求增加他们自身的研究经费时,大学这方面的收入严重不足。当这类建议被提出时,往往会得到两种回答:学生不能做这项工作,以及大学吓跑学生会减少收入。这些回答通常意味着作出这种回答的教授们不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既然这种事情不能作为公众认识问题处理,那么必须转而提出一些慈善的理由。

实际上,学生会对旨在改善他们教育状况的课程作出反

应。通常的情况是,在教授们对这类案例作出非常可怕的预测之后,反而有更多和更好的学生希望入学,他们就是冲着本应将他们吓跑的那些革新措施去的。在我的经验里,这种情况已发生在荣誉课程、普通课程、普通考试以及课程学分和出勤要求的废除上。

比追逐金钱更为重要的一个混乱因素,就是我们混乱的民主概念。这影响到了教育的年限、内容和控制。根据民主这一概念,一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接受公共教育的年限,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及获取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任何学位。根据民主这一概念,教育应该对公众的意见作出即时的反应;它的教材和方法可以由社区、社区代表甚至是社区那些比较不承担责任的成员详细加以调整。

是什么决定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答案是经济状况。当遇到劳工紧缺、工作机会很多的时候,免费教育就会限于很短的一个年限,甚至连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也提出免费教育应限于小学三年时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醒我们,在美洲殖民地,一位带着四个子女的寡妇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她的子女很早就开始对家庭经济作出贡献。这种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使青少年和退休人员离开劳工市场来解决成年人的失业问题。那些退休人员也许会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但是青少年却不能,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活动。



迄今为止,我们只发现了教育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sup>①</sup>(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我认为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教育制度混乱的一种延续,它是应付教育制度缺陷的一种尝试。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它几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能或不愿从书本上学习的学生,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却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它可以学着做得更好。作为教育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的主要弱点,是在选择对象方面缺乏明确的基础。如果目前学校是面向那些能够通过传统方法学习的人,而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面向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那么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应该将那些能够通过传统方法学习的人交给学校,而学校应将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交给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

当然,我希望学校在方法上能够有所改善,发现如何将教育传达给不能阅读的人的方法。随着他们在这方面的发现,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的数量可能会减少。不过应该明确的是,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必须在大约 20 岁之前向年轻人提供某种类型的教育或半教育活动。即使过了经济萧条期,我们也将处于同样的一个处境,因为近年来的技术进步表明,未来的工业界将比以往需要更少的工人。

---

<sup>①</sup> 设立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罗斯福的新政之一,始于 1933 年,为救济失业青年而设。1935 年,共有 52 万名失业青年在 2600 个营地从事土壤和森林保护以及国家公园等市政工程工作。该队营地受美国陆军部领导,除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外,对青年文盲进行读写教育,并开设正规的中小学水平的学术性和职业性课程。自 1940 年 5 月至 1941 年 11 月,有 66 万青年营员接受 4000 门左右与国防有关的职业训练课程,包括汽车机械学、金工、木工、电工、焊接、飞机制造等。虽然该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培训战时工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 1942 年后在国内受到批评,旋即停办。——译者注

因此,经济状况决定了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目前和今后的经济状况确定一般年轻人享受的公共教育的终点将会设在约大二结束时。这意味着公立的初级学院将成为美国特有的教育机构,正如迄今为止的公立中学(high school)那样。

我可能在这方面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初级学院成为美国特有的教育机构时,坚持从大一一开始开设四年制课程并最终导向学士学位的大学和学院将会感到一丝困惑。我们可以期望看到现在有中学的地方就有初级学院。在这个国家,初级学院已经有 450 所,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其中有 85% 的公立初级学院设在中学的校舍里。因此,人们会发现接管中学教学的最后两年,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四年制的普通教育不是件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一般的年轻人待在家里,并在学院完成大二的学业。如果他在初级阶段之后便完全结束学业,他也不必进大学。从招收大一学生开始的大学和学院将发现,它们的大一和大二学生仅限于当地学生,以及那些有钱在年龄相对较小的时候离家求学的学生。

这一过程已经走得很远。对几乎所有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大一学生的来源作的分析表明,其中至少有 75% 的学生来自距学校 100 英里以内的地区。拟议中的罗彻斯特大学奖学金和哈佛的国家奖学金,就是为了把这种情况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它们将不会成功,因为它们与美国教育的必然的和流行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可以期望在大一和大二阶段,本地学生占有绝对的多数;它们也可以期望大一和大二学生的数量相对于学生总数而言出现下降。去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中,有 64.3%,即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有在一所或一所以上其他学校就读的经历。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谈论学生的大一和大二的学习是为日后的工作作准备是非常愚蠢的；讨论起始于大一的一套四年制课程也是非常愚蠢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使我们自身得到发展，并鼓励初级学院制定一项明确的普通教育计划，使学生既可以在大二结束后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也可以继续进大学深造。

不过出于教育民主化的考虑，你会明白经济状况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强迫我们将大众免费教育的年限延长至大二之后。免费教育应该超越这一水平，而且应该更加全面和丰富，但是它应该仅仅面向那些有能力从中受益的人们。为繁荣学术、改进职业和培养心智提供机会，也许是各州的最高职责。如果它允许纳税人的子女随心所欲地接受高等教育，那它只会贬低这些目标并阻碍它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学位不再有任何意义，而且大学的确不应该继续存在。

我们的民主观使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同样数量和类型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全体国民对学位的热情，以致后来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希望通过一出生就向每个美国公民授予学士学位来减轻这种热情。我对此事的判断是，我们不能期望修完大二课程的学生平静地离开学校，除非那时他们被授予学位。

如果我们那时颁授了学位，那么它能代表什么呢？它应该代表一个良好的普通教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普通教育，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它传授给那些不能阅读的人。我们必须为这两个问题寻找答案。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发现什么是普通教育，一部分传授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因为一个明确的课程的第一个结果是人们有兴趣了解它，即使通过书本受些痛苦也在所不惜。民主应该意味着这类课程从

头至尾都要向所有人开放；应该允许学生按照他自己的速度学习以及在他看来已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考试，以适应个体不同能力的需要。然而，民主并不是要求高等教育向那些具备独立的智力工作所需的兴趣和能力的之外的人开放。在这个国家，确保一所大学的惟一希望是注意到大学是从事独立的智力工作之家。大学应该对民主作出贡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学独立的智力活动受到了由于我们对民主的混乱认识而造成的另一个后果的威胁，这一后果是我们对民主控制的混乱认识造成的。我承认美国教育的目标、方法和课程问题是如此的混乱，以致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尽管教育的情况最为千变万化，每个公民却都确信自己是一个教育专家。在公立院校，对社区进行财政控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一方面涉及社区能在教育方面投入多少，另一方面更涉及如何使用这笔钱。作为公众利益恰当的合法代表，他们可能会正确地决定必须削减一所州立大学的总体费用，但是具体应该削减哪些项目，必须由教育工作者决定。在捐办的院校，社区的利益在于确保该法人团体遵守法律。如果社区不喜欢该法人团体的行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手段要求它进行变革。但是一所捐办的大学不能修改其教育政策，因为报社的编辑们正想以牺牲大学为代价努力增加他们的发行量，政治家们也想以牺牲大学为代价来扩大他们的影响。

学术自由简而言之意味着，如果我们将教育和研究的管理交给那些懂行的人，我们就会获得最好的结果。以公众为名规定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决定研究的目标，这些行为是对学

术自由的侵犯。企图对教授的私人生活和当众发表意见进行控制,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属于企图干预公民的自由。州可以决定教育经费的数量,可以通过法律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进行管理,但是这类民主主义的观点与公民可以告诉教育工作者如何从事教育工作这类完全非民主主义的观念毫不相干,与公民可以告诉教育工作者如何生活、如何投票、如何思维以及如何说话这类谬论更扯不上边。

在这个国家,校友这一奇怪的现象发挥着不可思议的、时常又是非常可怕的作用。当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会觉得一所学校的受益者认为应该由他们控制学校,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理由,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如果你认为学校的毕业生们因为向学校交了钱就自认应该控制大学,那么就请恕我提醒你,他们所发出的噪音是与他们所支付的钱成反比的。校友们的热情是可取的,可以有助于保护母校免受公众侵害,并通过自身体现母校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幸的是,他们的能量往往被引导到别的方面。他们对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非常关心,而且他们的雄辩能力以及有一天可以促使他们慷慨解囊的希望强化了大学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兴趣。在那些已受惠于高等教育的人尚不能比任何别的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大学的情况下,指望那些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能理解什么是大学,那就要求太高了。任何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都会告诉你:在立法机构,没有什么比校友更危险。大多数捐办大学的校长会告诉你: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最反动的分子就是那些动辄大声叫嚷的毕业生。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我们的思维是如此的混乱,以致我们甚至不能使我们的学生明白我们正在尝试做些什么。

学校的董事与校友不同,他们至少无可置疑地拥有控制学校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越明智,就越不会去试图行使这种权利。他们在财产的管理和大学的解释方面比系科的教职员更加胜任,或者应该更加胜任。但是一所大学如果由学校董事负责运作,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那么怎样才能不发生这种情况呢?学校董事们一般都不是教育工作者,通常也不住在学校所在地。如果他们又是校友,他们必须克服这一利益集团所固有的一些恶习。如果他们出于自愿去着手处理一个教育问题,他们只能偶尔作出正确的决定。

因此,公众可能会适当地指望学校的董事对学校进行明智的管理,但是并不会强化董事会具体运作的职责。一所州立大学的董事们以根据法律董事对大学负责为借口,近来声称他们有权禁止系科的教职人员考虑某些问题。但是,学校董事的一般职责不能扩展到学科的内容、课程的内容或教职人员的资格方面,这些事情属于技术层面,是他们无法胜任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职责限于选择一个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行政班子。如果这个班子不称职,那么他们就应另选一个。试图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只会增加混乱。

除了追逐金钱和误解民主之外,我还想再加上一个重要原因,以解释我们目前的混乱状况,这就是对“进步”(progress)概念的错误认识。我将在本书剩下的三章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概念的各个方面。这里我可以通过迹象来谈论它们。我们的进步概念是指每件事情变得更好,而且必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信息在增加,我们的科学知识在扩充,我们的技术装备在范围和质量上都远胜我们父辈所了解的。

尽管经济萧条动摇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仍然坚持进步的

信念,仍然坚信这一信念的普遍适用性。政治、宗教甚至教育都在进步。因此,在知识上我们毫不犹豫地与过去决裂:古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他们从没有见过蒸汽发动机、飞机或收音机,而且似乎也很少意识到实施工厂制度的可能性。既然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中心事实,古人还有什么可以对我们说的呢?<sup>①</sup>

例如,笛卡尔(Descartes)、休谟(Hume)和罗素(Rousseau)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下述想法是荒谬的,即他们应开始思考,就好像以前别人从没有思考过。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过是很自然的事。人类已经进步到了有必要抛开以往的错误,开始发展一个真正明智的事业的阶段。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似乎是数据积累的结果。信息越多,发现也越多;发明越多,进步也越多。因此,推动进步的方法是获取更多的信息。各门学科一个接一个地脱离了哲学,然后又相互独立,而进步却依然在继续。终于,大学的整个结构崩溃了。当社会科学、法学甚至哲学和神学本身都变成经验性、实验性和进步性的时候,经验主义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进化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这些发展。它为经验主义提供了帮助和安慰,并特别乐于在教育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众所周知,进化证明年复一年都有稳定的进步,不过它也表明每个人的事业都要适应他的环境。显然,适应环境

---

<sup>①</sup> 参照英国利文斯顿爵士(Sir R. W. Livingstone)最近的谈话:“希腊人不能广播埃斯库罗斯(Aeschylon)的三部曲,但是他们能够写出这个三部曲。”

埃斯库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相传写了八十多个剧本,现存《被缚的普鲁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七部悲剧。——译者注

的方法是多了解它。因此,经验主义不但已取代思辨成为研究的基础,也取代后者成为教育的基础。通过一些轻易的步骤,它逐渐导向职业教育主义,因为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你自己未来环境的事实(特别是如果你喜欢金钱),应该尽可能直接和有用。

这样,我们从进步的概念开始,以一种反理性主义结束。后者实际上否认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是一种动物,而且也许比其他大多数动物都更加聪明。照此,一个人可以被训练成最聪明的动物。因此,认为教育应该是开发人的心智的想法当然是荒谬可笑的。教育必须包括有关当代工业、技术、财政、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或多或少详细的概括研究,以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这些情况,并将自己和同伴的不舒适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当代的时代潮流造就了当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反理性主义的大学。

从术语上看,一所反理性主义大学是一个矛盾结合体,难怪其理论依据也非常古怪。例如,有伟人的教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你不必注意你的教学内容或你的调查内容,你只需将伟人介绍给系科,只要他们在校园中存在就有激发和鼓励作用,他们的教学如何词不达意或他们的研究如何晦涩难懂就无关紧要了。正如谚语所说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这是有关处于一根原木两端的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和学生之间令人厌恶的传闻的一个翻版。

在这个国家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这根原木太长,霍普金斯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太大,而坐在原木两端的人又太多,无法使这一传闻合理化。当然,我们应该尽力将伟人引入教育。每个大学校长都应努力为他下面的系科争取尽可能多的伟人,



但是他永远不要期望能争取到很多,即使他见到一个熟悉一个。如果一位大学校长成功地发现了一些伟人,他不能期望使他们在一个束缚他们手脚的机构和一个同时包罗万象的课程中,特别是那些与这些伟人背道而驰的课程中,成为有用之材。事实上,伟人的理论是一个借口,一个托词,一个对有关我们没有明智的高等教育课程的指责的空洞回答。它等于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课程;如果我们想,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个。但是如果你只接受伟人理论,你会免去我们思考的麻烦。

我们设计的另一个理论是性格培养理论。情况可能是,我们不去教我们的学生任何东西,但是能教些什么呢?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造就在美国的环境下知道如何去做的完全融合的年轻的美国人。<sup>①</sup>在美国的校舍里相互交往,与文质彬彬的教授们来往,加上其他日常的活动,会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人。<sup>②</sup>既然性格是选择的结果,那么除非你为了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而训练心智,否则就很难看到你是如何发展性格的。学院式的生活表明,本科生的选择取决于思辨之外的其他考虑。无疑,良好的交往、美丽的校舍、如茵的绿草、可口的食物和良好的锻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好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就是每个假日酒店的广告上

---

① 见福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校长甘农教父的讲话,《纽约先驱论坛报》,1936年6月26日,第21页。“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广泛联系的人、社会生活与信息知识一样得到认真发展的人、带有明确和易辨的大学印记的人。”

② 对这一主题的其他说明,请见《耶鲁同学会周刊》的一篇文章,1936年5月1日,第7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课程是无足轻重的,学生的确最好是通过与其他学生和教授的非正规交往来进行自我教育。如果这是真的,就没有理由担心教什么。

所说的。每个高等院校之所以也在广告上这么说,惟一的原因是我們没有连贯的教育课程。

性格培养理论归根结底,就是信奉每个年轻人都应学会努力工作;他必须工作,做什么并不重要。根据这种理论,法学学习的教材可能包括植物学或鸟类学或任何在范围和难度方面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科目。未来的律师要学会工作;任何其他事情,他无论如何必须从实践中学习。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承认,学会如何工作也许是有用的人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似乎不幸的是,高等教育所能做到的,职业培训和唱诗班的训练同样能够做到,甚至做得更好。某些行业从14岁开始对年轻人进行学徒式训练可能会以较少的代价取得这里想要得到的结果。努力工作的信条似乎成了掩盖我们未能开发任何值得去做的工作的一个防御机制。

伟人理论和性格培养理论等于否认教育应该有内容。坚信教育存在内容的人几乎一致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效用,非常有限意义上的效用。他们写文章指出,受过教育的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他们也倡导进行教育改革,认为这将更加有效地为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和挣到更多的钱作准备。这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追逐金钱这个导致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因为追逐金钱使学校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也因为公众舆论认为如果教育有目标,那它就是经济的目标。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就此而论,一个被扭曲的民主概念就会使我们招收任何学生——难道所有我们的年轻人不应该有同样的就学机会?

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大学依靠人民;人民喜欢金钱,并且认为教育是获取金钱的一个途径。他们还认为,民

主意味着应该允许每个儿童获得有助于他们挣钱的教育徽章。他们不相信为开发智力而开发智力,而且令人悲伤的是,国家的状况决定教育的状况。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善国家的状况呢?只有通过教育。这样一个怪圈在折磨着我们。<sup>①</sup>国家的状况取决于教育的状况;但是教育的状况也取决于国家的状况。我们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最终对很早以来就期望我们实现的那种国家生活作出贡献?只有一些院校足够强大和目标足够明确到不为外界所动,并向我们的人民显示什么是高等教育,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教育,这就是真诚地追求知识;作为学术,这就是真诚地献身于知识的进步。高等院校只有献身于这些目标,我们才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

---

<sup>①</sup> 关于进行与社会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教育困难,见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并对照第四卷:“‘还有,’我说,‘国家如果一旦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就会在一个成长的循环中继续下去。我的意思是,一个完好的养育和教育如果得以保持,就会在国家中创造良好的天性,而依次接受这类教育的完好的天性会造就比他们的前人更好的人……’”

## 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两难困境

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就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作准备。这不是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教育之间的冲突。两种教育都可以在一所大学的各个部门找到。正如我稍后将要表明的,专业训练几乎每个系科都在开办,而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即使在一个专业学院也仅是偶尔为之。

我不需要告诉你现代大学的两个目标哪个在最近更为流行。只要看一看以往 35 年内新成立的自认属专业性质的那些学院,你就会确信我们的大学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适应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述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也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学院出现,但是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标准学科。

当然,这些新的学院吸引了学生、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很大程度的关注。老的专业学科中的新进展也发挥着同样的影响。1910 年以来,大学医学专业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在芝加哥大学,用于医学专业的教育和研究的总资产,超过了 4000 万美元,医学专业目前花费了 25% 的大学预算。当然,

在法学和工科方面的专任教授的开支比过去要高,因为兼职教授一般没有拿走任何直接工资。在工程学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设备变得更加精致,而且发展也遥无止境。与同样数量的工程师的要求相比,10位古典文学教授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就算不上什么了。

对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强调,由于大学在三年级以上越来越把工作指向专业学院的做法而进一步深化。当代的大学充满了法律、商科、牙科、工科、医科方面的预科学生,他们选读的课程取决于他们的专业志向。在一些院校,专业性的学院本身就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的。正如我将在稍后所表明的,这将是一定的条件下的一个完美的组织方式,可惜这些条件今天还不具备。

此外,我们发现除专业学院外,在艺术、文学和科学这些系科,学生的工作气氛也是非常专业性的。学生们在做有机化学的研究生作业,因为工业界每年都要雇用大量该领域的博士生。学生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是因为这是进中学工作的必要条件。在中西部地区,有45%的文理学院的毕业生进入教师行业。在有些学院,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0%。为了让学生能够在中学任教,这些学院被迫向他们提供硕士学位。它们还必须提供专业的教育课程,因为州法律和鉴定机构规定各级公立学校的未来教师必须接受过这种培训。在大学,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是因为如果没有它,要想确保在高等院校的职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中有75%的人对研究不感兴趣,至少在做完论文之后有这么多人不再参与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系科的存在是为了培养人们在大学系科任教。

10.15044

纯粹追求知识的目标在大学迅速变得模糊,并且不久就可能消失。社区中每个有组织表达自己心声的团体都希望,大学的存在使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培训自己的雇员,他们想从大学得到尽可能现成的产品,从毕业那一刻起就能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同时又非常廉价。这种愿望是可以原谅的,也许还有些可笑,但是它对大学的影响将是,很快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某种培训。

你可能会问,那又怎么样?你可能会很有道理地建议,一所大学的环境要比年轻的从业者其他的学习场所都要优越。你可能还会指出,坚持初学者必须通过的教育标准会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致性。你可能会说,也许我们不应将年轻律师的教育交给法律界。如果你这么说了,我想恐怕你是对的。我的回答是,这种安排对大学造成的负担对大学和各专业而言都是非常不好的,想通过大学参与使培训某个专业年轻人的工作做得更好的愿望是非常虚幻的。

我认为,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我不否认专业气氛对一些学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见过耶鲁的大人物、美式足球英雄和社会上的博学者在职业工作的激励和竞争的刺激下在法学院苏醒。法学院的成绩和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法学院学习成为一种时尚的事实,成就了许多这类奇迹的发生。本科学习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它和任何事情都没有明显的联系;而读本科也很难成为一种时尚。

另一方面,职业性的气氛对于引导学生理解学科是灾难性的。他是假设在学习专业的操作,因此你必须在每个阶段都要使他明白你正在讨论的问题对他今后的经验和成功解决

这些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你必须给他实际的忠告。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法学院向他的一个班级解释有关受同一雇主雇用的雇员的规则(fellow-servant rule)。在讨论结束时,一个学生问到:“这和法律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个男生的立场还可以说上许多:他到大学里来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印象,即大学可以为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作准备,并教会他这种游戏的规则。他感到被欺骗了。在这种情况下,将你从事律师工作时的逸闻趣事告诉你的学生,使他们摸清这项职业的门道,并避免由于要求他们考虑法庭之外的事情而混淆他们的思维,这些方面的诱惑是难以抵挡的。

这种学院的课程你可能预计得到,它限于那些被经验、传统和州的考试所认可的科目。学院的重心取决于职业性方面的压力。例如,如果关注的是大的工商企业,那么课程将围绕商业法展开。可以想见,如果作为一种职业的公共服务继续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公法就可能取代商法。犯罪法最具理论和实际意义,因而在法学院广为开设,否则就没有人会去学它,因为它一般没有经济上的好处。法理学应该成为法学课程核心,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学习它,它就像法学史一样,被认为是一门边缘科目或装饰性科目。

如果你想为一个男孩从事一项职业作准备,除非你的时间有限,否则事无巨细你都应考虑到。只要对年轻人从事某一职业有帮助,你几乎可以将任何事情合理化。如果你认为一所大学可以为男孩们从事各种职业作适当的准备,除非你的资源有限,否则应该尽可能多地扩展职业的数量。既然你将一所学院办得足够职业化通常会非常合算,那么完全不应有什么限制。任何希望获得尊严的职业都会说这是个专业,

并建议大学进行合作,提供相应的课程,为年轻人从事这项职业作准备。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向一所大学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要求这些建议被付诸实施。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富有影响和献身精神的大学教授之所以受到青睐,并不是由于他们智力方面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实际经验的长度、广度和深度。对某位教职人员而言,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兴趣可能是一种缺陷。尽管法学院的工资等级要高于那些非专业性的系科,但是它的学术标准却相对要低。在其他领域,教材、手册或教学材料的编写工作几乎不被看做是很有声誉的事情。此外,人们一开始就认为一位法学教师是一位好教师,这可能意味着他在专业学院是一位受欢迎的教师。如果学生们认为他通晓法律,他在学术上的失职就会得到原谅。我见过非律师人士在法学院担任教授,并知道他们被指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装得好像他们已经在律师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已违反了任命他们的初衷,即减少而不是增加职业性教学的数量。

学生和教师的这些态度,造成大学中专业学院和职业性不那么明显的部门相互隔离。不论其他系科实际上是否在纯粹追求真理,它们通常都认为自己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在美国没有一所法学院真正是它名义上所属的大学的一部分。的确,耶鲁大学法学院甚至已经挂靠到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们之间的合作方式耶鲁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其他系科从未尝试过,哈佛法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也从未想过。

耶鲁大学人文关系学院的设立,是为了将某些专业性的和非专业性的学科统一起来。然而,由于工作中离心力很强,



有些学科很早就脱离了学院；而且，尽管有大量的资源和精细的设备，要将剩下的学科聚在一起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从表面上看，法律至少与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历史及心理学有联系。但是即使在这些领域拥有比较强的系科的大学，法学院和它们之间还是很少有什么联系。工程学院因为在自身所依赖的自然科学方面所持的单一主义观点而臭名昭著，甚至在英文写作方面也是如此。我听说工程专业在这方面就和其他领域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在由于分临床和前临床阶段而对科学和技艺关系有着较为明确认识的医学院，你也可能听说过一位医学院以外的科学家很难对医学进步作出什么贡献的，对医学教育所能作出的贡献则更少。如果我们认为专业学科是大学其他部门应该了解的，而大学其他部门对专业学科也可能产生一些影响，我们必须同意孤立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确，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理由将专业学院纳入大学之中，除非它们和非专业系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会使它们得到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的一些东西。

而且，职业教育主义会导致浅薄和孤立。它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它剥夺了大学惟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我不需要告诉你这些年在这个国家要使大学的这项特有的活动保持生气是多么的困难。实际上，在美国对此没有什么明显的热情。想想要不是为获取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哈克尼斯(Harkness)的经费，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时代精神不利于对那些似乎远离日常生活的事情进行长远和平静的研究；它实际上也不利于对更接近日常生活的对象进行客观和公正的研究。大家都希望大学发

挥其特有的宣传功能,加入他自己的压力集团。人们不能想像大学对压力和宣传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大学不是站在他们一边,就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们开始认识到,纯粹追求真理实际上在那些神情紧张的出版商和忧心忡忡的商人看来是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欣然看着大学的基本活动为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不过,我认为职业教育主义不仅有害于大学,也有害于专业职业。请恕我放弃以下基本立场,即每项专门职业为了自身的不断发展都需要有创造性思维中心存在。当大学和下属的专业学院放弃创造性思维并蜕变成为初级职业学校时,专业也必定会蜕变成为一个初级职业。我将这个国家教堂数量的减少归咎于神学院数量的减少;将法律的不景气归咎于法学院的不景气;工程专业的情况则取决于工程学院的状况;而医学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相对比较好,也是因为191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医学院相对比较景气。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医学院,我们会发现,将它们作为大学的一部分是为了确保它们从大学出现的各种思想中受益。教授是考虑医学教育的主力军,因此要规定他们必须有时间做这项工作。学生的人数要少到使教职人员有机会鼓励和指导学生思考。工作的重点不应放在医院的病床或教室的设施方面,而应放在实验室上。不要寻求与大医院建立联系,而要寻求与基础科学方面一些实力强大的系科建立联系。这类学院经历了很多改革,它们和基础科学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它们优秀的学术质量也得到了维持。如果这些系科非常薄弱或者成了某一专业团体的奴隶,那么医学院就会每况愈

下。和实力强大的基础科学系科建立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强大的医学院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说并不过分。这样一种学院可以通过云集一批著名的临床专家和它所提供的优秀的临床材料暂时变得强大。然而,临床工作的压力是如此巨大,它会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如果医学院脱离一个创造性思维中心,它也会成为例行公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专业学院的校址问题比最初想像的要重要得多。将法学院设在法庭附近,将医学院设在医院附近,可能有一些好处;但是与将它们从大学中分离出来所产生的坏处相比,这些好处就微不足道了。强调实际知识并不是专业学院所需要的,它们时刻都在感受职业要求的压力。只有通过和大学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职业要求才能被减到最少,专业学院才能将重点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即专业的理性方面的问题。

不过除校址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为什么神职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我想,只要看一看任何一所神学院的课程设置,你就会找到答案。目前,神学院的课程由一些被认为将有助于牧师第一次履行职责的学科组成,学生学习建筑物的管理、社区圣歌的演唱、教堂交际以及被称做宗教教育的东西。有关这个专业理性方面问题的神学几乎从课程中消失了。

为什么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工程师不如英国的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以外的领域达到那样的高度?答案在于美国工程师必须修习的职业课程相对狭隘。如果英国律师业和美国律师业的水准存在令人遗憾的差异,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否就不可能是美国的法学院强调实际的训练,而英国的大学注重对法律的理解?

将专业学院变为职业学校贬低了大学,也不能提高专业的地位。我还认为,这种做法也不能实现其具有的惟一目标,即为学生从事其终身工作作准备。总之,它不光有害于大学和专业,也有害于学生。

我的论点是,行业上的诀窍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而且如果能够学到这些诀窍,也不应该去学。之所以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是因为这些诀窍容易过时,并为新的诀窍所取代;是因为大学中的教师知识容易陈旧,不能掌握新的诀窍;是因为这些诀窍只能在它们能够被使用的实际情景中才能学到。

我省略了这样一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即一位学生将他的整个大学时光花费在特定的职业准备上,但是又没有去从事这项职业,浪费了他的大学生涯。由于有 50% 的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会成为工程师,工程学院应该努力向他们提供对于任何职业而言都有用的教育,而不是教给他们仅仅是工程方面的有用的诀窍。

大学中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各个学科的一般原则、基本命题和理论。各个专业的实践变化很快,试图向学生反复灌输这些实践,只会使他们学到一些在毕业时对他们有害的习惯。努力跟上目前的事态发展,通常会导致总是落后一步。因此,当我了解到法学院刚开始教学生如何根据 N. R. A 处理案件,我不会感到奇怪。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方法使学生在经济开始转入萧条大约一年之后,仍在学习经济繁荣时期的案例。实际世界的很多做法天天在变化,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变化,从业者很难跟上这些变化,更不要说那些脱离实际世界的教授了。就是假设教授能够跟上这些变化,他也无法保

证这些做法在学生实际运用时仍然流行。实际上他明白,可能这些做法将会消失,并被他人未能提及的其他做法所取代。当一个教授在训练学生处理伊利诺伊习惯法的实际规则时,却发现这些规则已被实践法(Practice Act)改得面目全非。请想一想他的感受。

他应该教学生些什么呢?他应该努力使学生理解辩护的原则。如果他们做到了,他们就能为自己的各个司法判决找到合理的依据,他们甚至也能理解伊利诺伊的实践法。

你可能会说,大学的医学院表明一个专业的原则和实践都可以在大学中学到。医学方面的例子具有误导性。要使这个例子适合于其他专业,你必须具备医学已经具备的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有一支发展完备、和专业学院联系密切的前临床科学队伍;第二,在大学校园具备实际的实践环境。有些专业学科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是通常未能很好地利用。例如,工程学如想和物理学建立联系,就能在校园里找到它们。其他专业领域,如法学,则无处可求,因为即使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是法学的前临床学科,我们也不认为它们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实际上,社会科学发展如此不佳,以致目前对法学院来说,与其通过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给自身造成进一步混乱,还不如专注于法学。

医学院所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即可以从实际训练中获益,是其他任何专业都不具备的。只有在医学方面,我们可以在大学校园里找到实际的实践环境。在大学医学院,教授们正在从事医学活动,他们的病人患有和其他任何医生的诊所碰到的同样真实的疾病。学生以任何其他人学习其他领域操作的惟一方式,即实践的方式学习实际操作。在法学院、工程学

院、新闻学院、商学院及其他真的和假的专业学院,实践的环境并不存在,因此学生不能去学习实际操作。如果我们试图在法学方面获得与医学院在医学方面所取得的同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必须将法学院组织得像一个法律事务所:教授们正在执业,并收取适当的费用;而学生作为他们的助手学习。在目前的体制下,试图教给法学院学生执业的艺术是不会成功的;而且,这样做还绝对有害,因为它会使法学院学生不能集中注意力去学习他们在法学院可能学到的内容,也就是法学的理论、基本命题和一般原则。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专业学院里不应尝试“实际”的工作,即使这样做有机会取得成功,因为它干扰了学生的教育。一个有学问的专业的成员应该接受教育,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我猜想,不了解任何化学知识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厨师。因为,烹饪书仅仅是限于告诉你在特定的情况下如何去做,而你不必去推想为什么,你只要照着书上的指示去做。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烹饪从未被认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专业。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汽车驾驶员、砖瓦匠或挖沟工人,他需要知道的全部东西就是行业的规则,他不需要去理解它们。但是一个专业不可能真正成为有学问的专业,除非这个专业的成员理解它所涉及的论题。

一个有学问的专业的论题是属于理智方面的东西。尽管行业的规则可以在实践中学到,的确也只能在实践中学到,但是专业的理智方面的内容一般只能在大学中才能掌握,至少大学应该成为这类学习的一个理想场所。当学生的注意力从学科理智方面的内容转向职业兴趣,大学也就没能做到它惟

一能做的事情,而是在尝试一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

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光是非理智而且也是反理智的世界,甚至大学也是反理智的。我们可以说,学院是为了社会适应,而大学是为了职业调整。对于理智问题是值得大学关注的惟一问题的立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像在大学本身那样受到如此激烈的反对。我们试图通过向学生提供有关生活的信息,使他们适应生活,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在他们毕业时会变得陈旧。我们试图通过将专业人士的运行方式告诉学生,使他们适应日后的工作,而很少费心去告诉他们为什么。结果出现了彻头彻尾反理智主义的课程。

然而,一个学生可能在从未被促使进行思考,或简而言之从未受到教育的情况下,进入某一专业学院。他也可能在同样无知的条件下进入一个有学问的专业。难怪那些有学问的专业不比他更有学问。如果学生没有学会思考,如果学生学到的技术方面的程序没有多大价值,那么他在专业学院所学到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能更好地学到。正如我们一开始所看到的,他学会了工作,但非常糟糕的是他没有去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如果他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他可能会在专业实践中取得同样的成功;因为非常奇怪的是,对理论的掌握可能会有助于他去面对被他的指导教师所忽略或未能预见的一些实际问题。

从对大学的这些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首先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困境。我们的确对把专业教育交给专业人士并不感到安心。大学是非赢利性团体,也许能获得更多的信任。许多活动,如公共行政,对于公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办法能为人们

从事这些活动作准备。大学应该能够为此做一些事情。不过我们知道,目前对专业性的重视就意味着对职业性的重视,而这些重视对大学、专业和学生都是有害的。<sup>①</sup>

专业主义还引发了我们的第二个困境,即孤立主义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教授们关注的是为某一特定的职业(trade)作准备,那么他们就和关注其他特定职业的教授相互隔离开来,而且这两组人也和那些对任何具体职业根本不感兴趣,只致力于纯粹追求真理的人相互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所有大学系科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某种形式的专业训练,因此,和这些系科建立联系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大学的系科和专业学院目前没有共同的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它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会增加混乱。一所孤立的职业学校至少能确定它致力于为学生适应将来的职业作准备。

第三个困境是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困境。这里我们再次受到教育和国民生活循环性(circularity)的困扰。专业界和公众要求根据他们的培训观对人们进行培训。如何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呢?只有通过教育,而这种教育他们只能在大学中才能得到。一所大学能否用专业界并不认可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专业培训?一所大学能否不由自主地使该专业成为有学问的专业?一个大学系科,更不用说一所专业学院,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它的毕业生应该找到工作。这些系科和学院不大可能介入专业界尚不熟悉并抱有疑虑的

---

<sup>①</sup> 参照牛津大学武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院长威尔金森最近的观察,“专业化(Specialism)和它的孪生兄弟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教育的地位,并像大地上的凋枯病那样正在蔓延”。



那种教育。

我认为,这些困境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但是这需要另外一章去阐述。这里,我只是以建议和概要的方式,提出专业主义的困境部分可以通过彻底修改我们的专业观得到解决。从大学的角度看,一个专业学科要成为真正的专业学科必须要有理智方面的内容,而且这完全出于它本身的权利。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一切都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报业工作学到。对于教学专业而言,一切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一名教师学到。对公共行政专业而言,一切都可以通过获得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做一名公务员发现。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说的:“可以发现同样的教育和同样的习惯将造就一个优秀的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和国王。”如果大学能回复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它们的专业学院和专业课程仅限于那些拥有自身的理智方面内容的学院和系科,那么它们就在处理专业主义的困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他们能坚持剩下的专业学院和系科以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去处理它们的专业论题,那么它们将在解决专业主义的困境方面走得更远。每个有学问的专业都拥有伟大的理智遗产,而正是这些遗产,应该成为专业学院关注的主要对象。我相信这些学院将会发现,如果训练他们的学生学会思考专业的论题,会比用现成的方法教他们能更好地为他们将来的实际工作作准备。

以这种精神研究专业的论题,将造就更好的从业人员,也有助于解决孤立主义的困境。在我稍后论及的限制条件下,一所大学统一的原则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只要专业系科将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它们就能在大学的学者社区占有

一席之地。如果专业团体仅限于那些拥有理智内容的团体，如果它们和所有其他系科能以同样的精神开展它们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发展普通教育，使所有高层次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知识体系之上，我们可能会成功地使我们的大学成为真正的社区，真正的学者的社区。

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解决反理智主义的困境。如果一流大学能树立起他们可以理解的理想，如果他们即使在一段时间丧失学生和金钱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这些理想，那么有一天他们也会使我们的人民理解它们以及它们的理想。大学特权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它们能招纳富人的子弟并使它们无害于社会，或招纳穷人子弟并教会他们如何赚钱，而在于它们不断地在我们眼前呈现体现对人类最高能力持久的信任的教育机构时所体现出来的永久价值。整个世界以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这种象征。我衷心希望美国的大学能成为这种象征。

### 第三章 普通教育

我之所以在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讨论普通教育,是因为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有一所没有普通教育的大学。除非学生和教授们(特别是教授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智训练,否则一所大学必然仍是一系列不同的学院和系科,它们除了拥有同样的校长和董事会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把它们联系起来。教授们不能相互交谈,至少不谈任何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不希望相互理解。

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总将会有一些专家;然而,世界和有关世界的知识都不是像大学那样被任意地划分的。每个人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因此,除了他自己的领域,他必须和其他各个领域断绝联系,除非他受过和其他专家同样的基础教育。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对推进知识怀有同样的兴趣,还意味着他们具有共同的基本思想。随着经验科学的进步并积累越来越多的数据材料,这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一个狭隘领域的专家尽己所能去跟上该领域的最新发现。其他人即使与他同系科,也只是极力在追踪学科中他们自己那部分的最新发展,他们并不强求跟上这些最新发展。现在他们可能希望对同事的工作有一些总体的了解,因为他们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们是在同一个系

科。但是因为专业论题的无限分化,以及我们坚持将信息作为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思想的日渐淹没,即使这种程度的理解也将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一天即将到来。

通过行政方式纠正这种趋势的努力,只是治标不治本。哈佛大学的巡回教授职位、芝加哥大学的分部组织和耶鲁大学的人际关系研究所尽管高尚和值得称道,但是只能缓解而并不能消除我们教育制度所遭遇的不团结、不和谐和无序的状况。如果教授和学生们都有共同的基本思想,那么从事生理学研究的人和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就有可能相互沟通,甚至法学和神学也会开始发现相互之间值得联系。

在这一章,我想讨论内容,而不是方法。我承认把我喜爱的这种教育传达给那些不能或不愿从书本上接受教育的人,有很大困难。然而,我坚持认为,我将提出的教育是每个人都应接受的那种教育。对这种教育的回答不是有些人不应接受它,而是我们应该找到将这种教育提供给那些我们目前不知道如何施教的人的方法。你不能说我的内容是错误的,因为你不知道它的传授方法。如果可能,就让我们对内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相信美国的技术天赋将解决传授的问题。

经济状况要求我们为年轻人,为所有年轻人提供某种教育一直至 20 岁左右。也许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从书本上学习,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不努力去为另外三分之二的人设计更好的课程的理由。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继续开展试验,以找到如何将普通教育提供给那些喜欢动手的人和功能性文盲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普通教育,这些尝试可能会变得简单一些。

请不要告诉我,因为绝大多数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将不会

进大学深造,我所提出的普通教育不应被采纳。我的计划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普通教育是面向每个人的教育,不管他是否继续进大学深造。普通教育对大学生涯是有用的;但如果不进大学,普通教育同样有用。我承认,从流行的效用观点看,如果不进大学,普通教育对个人是无用的,它无助于赚钱或出人头地,也不能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帮助适应环境或当代的状况。但是,它有一个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培养人们理智方面的优点。

流行的效用观念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混淆了即时的目标和最终的目标。物质上的繁荣和对环境的适应总归是好事,但就其本身而言未必就是好事,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好事。然而,理智方面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件好事,作为通向幸福的手段,它也是好事。我所指的理智方面的优点,是理智方面的良好习惯。古人曾提出过五种理智方面的优点,包括三种推理的优点:直觉知识,即归纳的习惯;科学知识,即演示的习惯;哲学智慧,即科学知识和直觉推理的结合,它涉及最高层次的知识、首要原则和首要原因。在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两种实用智力方面的优点:艺术,即根据真正的推理过程进行创造的能力;审慎,它是行动的前提。<sup>①</sup>

总之,理智方面的优点是一些习惯,它们来源于智力的训练。经过适当训练并养成适当习惯的智力,在任何领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培养理智方面优点的教育是最有用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想请大家注意纽曼(Newman)曾说过:“如果在我们的素质当中,智力

---

① 参照《神学大全》第二部分“问题 57”,第 2—4 篇。

是如此美妙的一部分,智力的培养是如此美妙,它不仅本身美丽、完美、让人羡慕、高尚,而且应该在真正和高层次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低层次的、机械的和商业的意义上对于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及他们周围的所有人而言是有用的。它的好处非常广泛。它是一种祝福、一种才能或力量,也是一种财富。它首先使拥有者受益,然后又通过拥有者使全世界受益。”

你也许会说,我即将提出的普通教育计划远离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处于不停的流动和变化之中。对此我会充耳不闻。我不否认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之中,有开始,有中间阶段,也有结束的时候。我也不否认人种的发展历史体现了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科学知识的重大发展。但是,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我们相信在每个领域都会取得类似的进步。我们抛弃了我们的理智方面的遗产,只读最近的一些书籍,只讨论当前的事情,努力使学校紧跟或超越时代的发展,撰写有关教育和社会变迁的详细的演讲词。

保罗·肖雷(Paul Shorey)说:“如果文学和历史是一种赫拉克利特式(Heraclitean)的事实流动,如果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同样重要,书与书之间、观念与观念之间也相互等同……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勇敢地沿着经院式的成规前进,但是最后,灵魂会屈服于无尽的疲惫和困惑。但是,如果……流动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真善美是真实的和可以被认识的,如果在那些超级天才富有想像力的眼光中,在世界最优秀的书籍所体现出的持久的理性和睿智中,这些永恒的理念年复一年始终不变,那么我们的阅读和研究就可以从时代的局限及量化研究和机械方法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我们对进步的错误认识,使我们将经典著作和文科排除

在课程之外,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把教育作为当前社会运动的奴仆。近年来,这种态度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影响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所有这类事情困扰着我们。我们感到,我们有责任教育年轻人,使他们为政治、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变革作好准备。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应搞清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并设计出体现这些社会变革的课程。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应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变革,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期待这些变革,而且要参与其中,促使这些变革成为现实。

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发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和地方生活,或调整他们适应特定的环境的观念,是有悖于真正的教育理念的。

教育意味着教,教意味着知识,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sup>①</sup>因此,教育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不否认在组织机构、行政机构、地方习惯和风俗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些都是细节。我认为,如果正确地理解教育,那么面向全体人民的课程的核心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下都将一样。具体行政机构也有可能是类似的,因为所有社会都有普遍的相似性。

要正确地理解教育,就应将它理解为智力的培养。智力的培养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人都同样是件好事。此外,相对智

---

<sup>①</sup> 见《神学大全》第二部分“问题 94”,第 4 篇:“因此,很明显,对于一般原则而言,不论是思辨性的还是实用性的,真理或正直完全是一样的,所有人对此有同样的了解。”

力的培养而言,其他所有的好事都只是手段。物质的繁荣、和平和社会秩序、公正和道德品行都是智力培养的手段。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现在,对于人而言,理性和心智是大自然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应该从公民的角度出发进行公民的培养和道德训练。”只服务于手段而不是服务于目的的教育,是一种被误导的教育。

当然,我赞同任何普通教育必须是教育学生进行理智的活动。因此,它必须启发学生走上实际智慧之路。但是问题在于,对于教育而言,启发学生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这种途径能伴学生走多远?谨慎或实际智慧决定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的途径,它一方面来源于理智活动,另一方面也来源于经验,但主要的条件是思维的正确性。既然教育不能复制学生在毕业时将会获得的经验,那么它就应该致力于发展思维的正确性,并将它看做是通向实际智慧,也就是理智活动的途径。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指出的:“……当年轻人成为几何学家和数学家,并在此类事情方面非常聪慧,可以想见,具有实用智慧的年轻人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这种智慧不仅和普遍性有关,而且也 and 特殊性有关。而年轻人没有经验,因为经验需要时间。”既然实际智慧是“在人类的好事或坏事方面的真正和合理的行为能力”,那么似乎通过对实际智慧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推理的重视,教育就能够为实际智慧的发展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有些人以为,所有教育都是正规教育,而正规教育必须担负起个人充分发展的全部责任。希腊有关城市教育人的观念被遗忘了。城市里教育人的任何东西不得引入我们的学校、学院和大学。我们开始时的一些举动,仿佛家庭、教会、



州、报纸、广播、电影、街道俱乐部和邻家男孩并不存在。所有从这些来源获得的日常经验和即时经验都被忽视,而我们却开始在教育机构中提供这类经验的仿制品。此类机构曾经提供的经验至今可能会有所削弱;不过如果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比起昨天的年轻人,生活并不那么充满经验,他就会是一个勇敢的人。和昨天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将经验交给其他机构和势力,在教育中强调那些它最适合作出的贡献,即年轻人的理智训练。他们毕业后的生活将给予他们足够的经验。我们不能试图将这些经验教给他们,同时又承担仅仅属于我们的任务。

年轻人并不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校中。他们的前辈通常在学校里没花什么时间。然而,我们希望他们的前辈是在实用的智慧中不断成长的,因而至少拥有经验。如果我们在他们接受教育时能教他们如何思考,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和消化他们的经验。学院和大学应该不去做其他机构也能做的事情,这是教育行政的一个好的原则。之所以是一个好的原则,是因为如果学院和大学做只有它们才能做的事情,那么它们要做大量而复杂的工作。因此,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我们可以明智地将经验交给生活,并着手进行我们的理智训练工作。

如果存在每个希望自己是有教养的人都应该掌握的那种永恒的学习,如果这些学习包含了我们的理智遗产,那么这些学习应该是普通教育的中心。它们不应该因为有难度或令人厌恶,或是因为它们几乎完全从我们目前的课程中消失而受到忽视。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可能对儿童有吸引力,而且无疑也是有用的地方,因为小孩子们在学校得到放松,回到家里就有更好的行为表现。但是教育者不能允许学生支配学习内

容,除非他们准备承认自己只是个陪伴的角色,监督一种毫无目的的、从尝试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这种过程的主要价值在于可以避免使年轻人做得更糟。艾利奥特(Eliot)先生在哈佛推行、进步主义教育在低年龄段实施的那种自由选课制,等于否认教育是有内容的。既然教育没有内容,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凭自己的爱好学习,至少他们有兴趣并感到愉快,同时也像修习了规定的课程那样受到了教育。不过这种想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与人、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目的,那么就不能将教育屈从于儿童甚至大学本科生零星的和自发的兴趣。<sup>①</sup>

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先生曾指出,在年轻人学习的海市蜃楼中分辨出事物的真正面目是困难的。即使在普通教育之后的阶段,当学生受完了普通教育以及变得更加成熟,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方面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这种自由也应是有限的。例如,如果在法学方面存在着一种理智的传统和理智的遗产,那么法学院必须确保将这些传统和遗产传授给法学专业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对如何躲避舍曼反垄断法的最新策略更感兴趣。

不能以为在任何年龄,学生总能选择教育所要求的科目。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回避这些科目,我们就不能给予他们一种标识,使公众确信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在任何

---

<sup>①</sup> 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九卷:“‘这很明白’,我说,‘这就是法律的目的,它是国家所有阶层的盟友,而且,这也是我们对儿童进行控制,在我们和他们中间建立起可以说是一个立宪政府之前、在通过在我们这些人帮助之下培养他们最好的品质,为儿童建立一种类似的监护制度和规则之前,不让他们自由的目的,然后,我们就让它自由。’”

领域,如果学生要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就必须掌握科目的整体发展所依据的那些永恒的学习。

应该鼓励的是方法的变化,而不是内容的变化。应该考虑到个体的差异,废除除考试外的所有要求,允许学生在他认为有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这些考试。这样的话,目前完全从我们的课程中消失的独立思考和学习的培养,就会得到一些推动,同时又不会因着迷于当前或年轻人的异想天开而牺牲教育的内容。

如果我们是教育者,我们必须有一种教学内容,一种合理的、可靠的内容。如果这个教学内容是教育,那么我们不能改变它,使它迎合家长、学生或公众一时的想法。100年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William Whewell, 1794—1866)曾说到:“在使用和对待年轻人时,应该注意唤起和发展他们的突发奇想、他们的自我意志、他们的个人喜好和倾向;但是这不是教育,这不是人的教育;因为所唤起的不是人本身的东西,也不能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这不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性的教育,而是对他的个体性的纵容。”

在普通教育中,我们的兴趣在于发掘我们共同的人性要素,在于种族的品质,而不是个体的偶然性。

如果今天我们的课程反映了对个体偶然性的兴趣,如果永恒的学习由于在课程中的缺乏而受人注目,我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课程是不好的课程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的课程在教育组织、教授和学生的质量和活动以及在国民的培养方面,导致了最为不幸的结果。这确实不是对永恒学习的批判,因为它们没有参与制造这些结果。

我坚持认为,永恒的学习应该是普通教育的核心,但这并

不意味着永恒的学习就是普通教育的全部。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去了解,例如特定的技术工作在普通教育中对一些学生而言是否没有一定的补充价值。我也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既然普通教育假设是大多数学生的终点站,它必须既要将他们与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也要将他们与过去联系起来。对他们而言,懂得思考仍在继续和懂得以往进行了什么思考同样重要。

是否应该允许一定的技术工作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方法问题,而不是内容问题;是如何教的问题,而不是教什么的问题。技术本身在普通教育中没有藏身之地。如果要把它完全合理化,也只能是因为我们发现一定的原则通过技术工作能得到最好的传达。很难想像,一位教师只是满足于解释过去的思考而不说明这些想法有它们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当前思考的问题大多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回答的。

主张将当前的事件作为学习内容的人,很难从坚持当前思考的重要性中获得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对任何性质的思考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只是在当前的思考被看做普通教育的核心,而不是以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和斯宾诺沙(Spinoza)为中心时不那么感到惊讶罢了。他们从休厄尔有关他所称的进步主义学习的谈话中几乎不会得到什么安慰。这种进步主义学习最初出现的教育阶段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晚。休厄尔说:“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去接受当前人类精神活动的任何表现是不够的。进步主义学习也必须是一般形式上的人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必须表达一种属于人本身的活动。尽管在形式上不是永恒的,但是它们必须在原则上具有普遍性。它们必须是人类理性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的异想天开或想像

的结果。它们必须将目标放在追求真理之上,而不仅仅是寻求变革或新奇。而且,既然人类精神方面的进步是从真理到真理,那么新的真理的发现必须建立在以往真理的基础之上。教育所包含的进步主义学习必须建立在教育必须涵盖的那些永恒学习的基础之上,前者必须是教育的上层建筑,而后者是教育的基础。”休厄尔又说:“一个真正参与科学进步的人必须在结束受教育阶段后继续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应该将现代科学和哲学引入教育,直至搞清它们的性质和原则;但是它们不一定成为教育的任何重要的或明确的组成部分。理智方面的文化如果排除了现代科学和哲学,尽管会不甚完善,仍是将学生与过去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为现在作准备的一种文化;但是一种取消了古典文学或数学推理的教育,不管使一个人如何熟悉现代文学和哲学的术语,都会肯定使他无法理解文学和哲学的真谛,因为他没有理智方面的文化,而这正是文学和哲学领域最伟大的作家通常所具备的。”<sup>①</sup>

让我们绕开所有的行政和方法方面的问题。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种明智的教育机构,其中包括一种四年制的单位,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直至学院二年级结束。让我们假定我们正努力在这一单位教每个人从书本中学习。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他们结束这一单位的学习,将标志着大多数学生结束正规的教育,他们将不会进大学继续深造。然而,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课程,不论是否继续深造,对于他们同样有用。那么这应该是

---

<sup>①</sup> 想想亚里士多德有关不幸、错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和一个不公正的人的不公正行为的区分对英国法律的重要性。也想想洛克的《文职政府(第二篇)》对英国法理学的影响。

种什么样的课程？

我们已将身体的锻炼和性格的培养排除在外。我们已将社交规范和商业技巧排除在外。我们已经建议课程应主要由那些永恒的学习组成。我们提出永恒的学习，因为这些学习会发掘出我们共同的人性要素，因为它们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将我们与人类以往的最佳思维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为进一步学习和理解世界的基础。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学习？

首先，它们是那些多个世纪以来的经典名著。其中恐怕有许多出自古代和中世纪，但是即使这样也具有现实意义。一本经典名著在任何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其经典之所在。苏格拉底的对话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和柏拉图写这些对话的时代同样急迫，实际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比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更需要关注这些问题，而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重要性。

因此，这些名著是永恒学习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重要部分。首先它们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著作。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的任何名著，我们如何能称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然而在今天，一个美国最著名的学院的毕业生完全有可能没有阅读过这些名著，莎士比亚的著作可能是一个例外。当然，学生可能听说过这些名著，或者至少听说过他们的作者。但是这些知识一般来源于教科书，而教科书也许和任何单独的力量一样做了许多败坏美国智慧的事情。如果一个学生应该了解西塞罗(Cicero)、弥尔顿(Milton)、伽利略(Galileo)或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什么他不去阅读他们的原著？他们对他们的了解一般来源于课本，而这些只是有关他们思想的二手资料。

其次,这些名著是普通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它们,就不可能了解任何学科,不可能理解当今世界。如果我们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则》,我们就会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天才,就会了解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简朴和优雅,还可以了解近代科学的基础。错误的起点、野蛮、歇斯底里、现代思维和当今世界的混乱,都是来源于以往思维和实践的失落。工业革命开始了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哲学起始于笛卡尔(Descartes)和洛克(Locke);心理学起始于冯特(Wundt)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自然科学发端于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实验。如果之前的任何事情被提及,它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目前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当然在早先那些黑暗的世纪里有一些原始的起源。

然而,我们可以从巴特勒的一段话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只有学者才能认识到,现代世界所说所想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新鲜。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巨像似的胜利,也是中世纪伟大思想家的重大胜利,他们探测了人性必须提供的几乎每个问题的深度,并以令人吃惊的深度和洞察力解释了人类思想和志向。不幸的是,这些本应在具有历史背景的文明人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埋藏很深的事实,只为少数人熟知,而许多人时而抓住一个源自古代的和显而易见的谬误,时而抓住一个旧的和业已证明的真理,好像每个都具有非常新奇的魅力。”

你会注意到,巴特勒先生说只有学者才能认识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只有学者才有这种洞察力?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了解希腊人、罗马人和中世纪伟大思想家的重大胜利。如果每个人都受过教育——为什么不应是这样?——我们的人

民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成为经济和政治,我可能还要加上教育方面最新的那些灵丹妙药的牺牲品。

你会发现西方的名著涵盖了知识的所有领域。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理解法学的基础;在教育方面对于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重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探讨的是自然的变化和运动,它是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基础;对于所有面对自然的变化和运动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人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在四年里花一部分时间用于阅读、讨论和消化这类名著,同样有利于为专业学习作准备,有利于各种终结性的普通教育。对于这种经历而言,四年时间的确太短了。我说过,这种经历是为进一步学习作准备,是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世界的普通教育。它还将培养人们阅读的习惯、个人的品位和批判精神,使成年人在他的正规教育结束后,能够对当前生活中的思想和各种运动进行明智的思考,并作出明智的行动。它会有助于人们参与到他的时代的理智活动中去。

为了读书,人们必须知道读书的方法。英语语法教学的退化不会使我们意识不到这样的事实,即只有通过语法学习才能理解书面的作品。语法是对语言的科学分析,我们通过它来了解书面语言的含义和说服力。文法锻炼心智,发展逻辑能力,无论从它本身出发,还是作为阅读经典名著的一种手段,它都是很好的东西。无论从经典名著角度,还是抛开经典名著,它都应在普通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那些即将从事书本学习的人而言,学习阅读的艺术似乎是不可缺少的。

我不是说学习古代经典名著所使用的语言或文法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是必须的。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名著现在都有极好的译本。除非能证明学习希腊和拉丁文法是学习英语文法



必不可少的,或掌握希腊和拉丁语言是掌握我们自己语言必不可少的,我看没有理由坚持将这些语言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当然,现代语言也不是普通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学生应该有时间去掌握它们,但反映普通教育的考试不应将它们包括在内。它们是课程以外的一种技能,或是进行高深学习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普通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除文法或阅读的规则之外,我还想加上修辞和逻辑,或写作、语言和推理的规则。经典名著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文法、修辞和逻辑就是确定它们优秀程度的手段。我们忘记了语言也是有规则的。而且,正如通常所教的,英语写作是对经典的写作规则的一种软弱和低劣的模仿,它或者强调那些最细微的琐事,或者强调所谓自我表达。这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当然恰好是迄今为止所惯用的修辞训练的反面。逻辑是对推理的严格指向条件的一种技术层面的陈述。如果普通教育的目标是训练人们的心智有明智的行为,那么逻辑就必不可少。

逻辑是学习推理的一个关键部分,此外还要加上一种学习,这种学习以其最清楚的和最确切的形式作为推理的榜样。这种学习当然就是数学,而在数学方面的学习主要是欧几里德定理的运用。在这种学习中,纯粹运用推理是显而易见的。学习内容取决于普遍和必要的人类思维过程,而不受喜好、意向和成见的影响。它证明那些迎合时尚、希望接受原则而又否认结果的学生们的共同答案是错误的。数学可能比其他任

何途径都更能直接和深刻地培养人们思维的正确性。<sup>①</sup>令人沮丧的是,在中学和初级学院,数学教学的方式和目标通常都不是这样。算术和几何教给学生的通常是它们应有的非常实用的一面。<sup>②</sup>但是,有的大一学生从未听说它们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而且在实用性得到解释之前,他们也极不愿意考虑数学方面的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我们的功利主义观念。

因而,我们的普通教育课程应由西方名著以阅读、写作、思维和说话的艺术组成,再加上数学,它是人类推理过程的最佳范例。如果我们希望所制订的课程能挖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要素,那么这种课程就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如果我们希望为年轻人选择明智的行为作准备,这种课程就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将会了解到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以及那些伟人们的思想。他们将学会如何进行独立思考。如果我们希望为高深的学习打下一个基础,这种课程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如果我们希望保卫真正的大学,我们可以指望这种课程,因为通过这种课程,学生和教授们就可以掌握共同的思想储备及其处理方法。这种课程似乎满足了美国普通教育的所有需求。

那么,对于这种课程还有哪些异议呢?这些异议不可能来自教育方面,因为这种课程似乎实现了普通教育的目标。其中的一个异议可能是,学生会不喜欢这种课程。但是正如

---

① “‘那么你看,我的朋友,’我说,‘这种学习真的好像对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明确地迫使灵魂着眼于真理本身去运用纯粹的思维。’”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② 柏拉图论几何学家:“他们的语言是最为荒谬的。尽管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讲的好像他们正在做一些事情,好像他们所有的词语都指向行动;因为他们的所有讲话都是求平方、应用和做加法等等,而整个学习的真正对象是纯粹的思维。”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异议是不相干的。不过即使它切中主题,它也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既然我们提出的课程是连贯的和易于理解的,既然它摆脱了目前影响我们课程的那些细微琐事,那么如果教师给予他们尝试的机会,学生是会对此作出响应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课程难度太大。对于有阅读能力或有机会学习这种课程的学生而言,它的难度并不是太大。在阅读的舒适性及其他方面,《联邦文件》这部美国经典名著比当前有关政府和公共行政的一些著述都要优越;希罗多德(Herodotus)比大多数当代的历史学家更加充满活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当代的哲学家一样睿智。

这种课程的难度不是太大,如果教师给他们机会,学生是能够做到的。教师会给他们机会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今天的教授有着不同的成长道路,他们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阅读过他们要教的所有书籍,也不是所有人都准备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依照他们自己的成长方式培养他们的后继者,使后一批人养成与他们一样的生活习惯。所有这些所造成的金钱崇拜、对民主的误解、错误的进步观、扭曲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反理智主义,一起强化了他们拒绝那些烦人的改革的信念。时代呼唤建立一种新型的学院,呼唤在一些旧的学院开展一场福音运动,其目标是将每个人,最终乃至整个教师队伍转向真正的普通教育观念上来。除非一些此类的示范或福音运动得以开展,否则我们的混乱状况仍会继续;我们既不会有普通教育,也不会有大学,而且我们会继续使我们的人民失望。

## 第四章 高等教育

我们已经考察了美国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了解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以及可以通过普通教育部分解决这些困境,还有什么普通教育。现在我们的主题是在普通教育的背景下探讨什么是高等教育。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将大学看做是一种教育机构。我对积累资料、收集事实和推进经验科学的赞赏和信任之情不亚于任何人。这些工作加在一起,成为当代的重要活动之一,必须得以继续并加以鼓励。我只想指出,这种活动的开展,决不能混淆和阻碍理智的训练和发展。在我看来,后者就是教育。如何做到这一点,我希望稍后再回答。

当然,我知道思维不能脱离事实和经验。然而,所有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我强调教育的理智方面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贬低收集资料的重要性。<sup>①</sup>我的意思是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它在任何明智的高等教育计划中都处于一种从属的位置。

---

<sup>①</sup> 德·托奎维尔(De 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第二集第一卷第十章:“当前必须将人类的心智强制转移到理论学习上来;它会自动地走到实际的运用;而且,不要总是使人类的心智依赖于对从属性影响的详细考察,有时抛开这些会显得更好,以便使之上升到对主要原因的考察。”

在这方面,我请求大家注意“研究”这个词的两方面含义。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为收集资料而收集资料的研究在大学中不应有它的位置。对原则进行发展、详尽阐述和精练提纯的科学研究,以及收集和运用经验性资料以帮助这种研究工作的进行,是大学的最高活动之一,也是所有的大学教授应该从事的那种研究。

我还要说,某些领域在年轻人被允许独立从事某一专业的工作之前,我承认可能有必要让他们接受实际的训练。既然根据定义这种训练不可能属于理智的范畴,既然根据定义大学必须是理智性的,这种为特定职业作特定的准备就不能作为大学工作的一部分。如何开展这种活动,又不干扰到大学教育,我将在下文逐步提出。

在一项明白易懂的普通教育计划之下,学生将在大二结束时牢固掌握各个理智方面学科的基础知识。他将能够辨别和思考学习内容,能运用语言和推理,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理解,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慧。

如果跳出普通教育,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大量的系科和专业学院都急于向他传授大量学科的最新信息,其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非常琐碎,有些则无关紧要。他会发现民主、自由主义和学术自由意味着所有这些学科和学科分支必须被视为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暗示斯堪的纳维亚语无法与法学相提并论,或伐木的方法不如天文学重要,那就是不民主。他会发现一种完全和彻底的无序状态。

他还会发现,我们对这种无序状态感到自豪,并以不民主

和权力主义为由拒绝对此作出改正。<sup>①</sup>正如自由选课制否认教育有特定的内容一样,现代大学的组织机构也否认高等教育有理性的东西。自由选课制对教授而言,意味着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最终产生各种课程。和其他类型的课程一样,这类课程学分的积累也必然导致学生获得最高层次的学位。课程间的歧视是不民主的。这样,学生将面对多得让人可怕的领域中的那些主要夹杂着当前和历史的调查的一种大杂烩。

他会发现向他提供这类大杂烩是基于两个假设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是。一是它们本身就是好的,二是它们会使他得到某种训练。它们本身就是好的,是因为它们是为真理而研究真理的结果。它们会使他得到某种训练,是因为它们是他将来得以谋生的领域的最新报告。他会意外地发现,为他进入有学问的专业作准备的学院和系科与其余的相比显得不那么有学问,而且他们的课程并没有指明体现专业有学问的学习究竟在哪儿,或究竟是什么。他会发现其他想培训他的系科想将他培训成为一个技术员、从业者,或一个知道如何进行科学或历史观察的人,它们自身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他会发现所谓的生产性艺术领域存在着一种特别奇怪的混合体。他会发现在自然科学中制作一种精密仪器用于精密测量和发展一种新的宇宙理论同样重要。他会发现音乐、雕塑或绘画和神学一样是大学的一个学科。但是他会发现在经

---

<sup>①</sup> 参照勒尼德·汉德法官 1936 年 6 月 18 日在哈佛同学会上的致辞:“不管每个人怎样要求平等的投票权,在人类的价值观中没有民主。它是在心灵上将它自己的秩序强加给令人抗议的失败;并建立符合它自己天性的等级制度……”

验科学和流行的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观念的影响下,美术也成了一种经验性的、历史性的和“科学的”学科。对拜占廷拼花艺术品进行显微镜研究,通过观察磨损情况确定它们的年代和渊源,可以说和理解这些拼花艺术品同样重要;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调查是“科学研究”,而理解却不是。

这就是这个年轻人透过高等教育的门槛所能看到的。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混乱。经过一番观察,他决定选择相对较为有序和明智的商界生活。谁会去埋怨他呢?

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无序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那里没有有序化的原则。的确,当代意义上的自由原则不会使高等教育成为一体。当前提及自由,是将它本身作为一种目标。但必须明确,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作出和实现自己的选择,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解体。我们也不能指望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会使高等教育统一起来。没有教养的人还在问,什么是真理?而且所有的真理不可能同样重要。一个有限的整体大于其中的任何部分,这是真的。纽黑文的电话簿比芝加哥的电话簿要小,在日常的措辞中,这也是真的。但是第一个真理比第二个真理要丰富和重要得多。大学各部门的共同目标可能是,也应该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但光凭这一点不足以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时将大学团结在一起。真正的团结只有通过真理的分层才能实现,它使我们了解什么是基本的东西,什么是辅助的东西;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现代大学好似一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包含许多真理,别无其他,但是它的整体性只是体现在其基于字母顺序的编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大学也一样,它拥有从艺术到动物学

的各类系科；但是学生和教授都不知道系科间真理究竟有什么关系，或可能是什么关系。

中世纪大学有一个统一的原则，那就是神学。中世纪的神学家对有关人与上帝、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真理应有的比例和重要性已经作出了精妙陈述。这是从真理到真理的一种循序渐进。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他所能想像的最高层次的关系；因为他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上帝，他的所有真理——涉及上帝与人的真理——使得他的知识有了意义和次序。神学安排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理；人文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们以上帝的名义热爱他们的兄弟。<sup>①</sup>神学安排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真理，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他创造人生活在世界上，并使他和其他动物结成一定的关系。左右中世纪神学家理论体系的见解是，正如首要的原则依照理论的次序安排所有的真理，最终的目标依照实践的次序安排所有的手段和行动。上帝是首要的真理和最终的目标。中世纪的大学是通过理性安排的，也是通过实践安排的。

但是也有其他的时代。我们正努力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寻找一个理性的和实践的次序。神学在有些大学受到了法律的禁止，而且也可能在其余的大学受到禁止。神学建立在天启的真理和信仰条款的基础之上。我们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不相信天启。神学产生了正统的信仰和一种正统的宗教，而我们两者都没有。指望以神学统一现代大学是徒劳的。

如果我们从神学中略去了信仰和启示，我们就会在很大

---

<sup>①</sup> 《神学大全》第二部分“问题2”，第7篇：“但是人不是因为他自己而被热爱，无论如何，他都是由于上帝而被热爱。”



程度上处于和希腊人一样的位置,他们因此比中世纪离我们更近。这很奇怪。现在希腊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它是统一于对首要原则的探究。柏拉图提出的辩证法是探究首要原则的一种方法;亚里士多德则将首要原则运用于形而上学。因此,对希腊人而言,排次序的和成比例的学科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神学。根据形而上学,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和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科学开始成型并相互启发。在形而上学中,我们探究的是事物的起因,它是最高层次的科学、首要的科学,是首要的和具有普遍性的。它探究存在的本质,以及存在本身的属性。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智慧意味着了解事物的原则和起因。形而上学探究的是事物的最高原则和起因。因此,形而上学是最高层次的智慧,以致亚里士多德觉得有必要指出这种知识一定只属于上帝。他说:“但是不能嫉妒神的力量,也不应把其他科学想像得比任何神的力量更值得尊敬。最神圣的科学也是最值得尊敬的,它本身在两方面一定是最神圣的。因为最适合上帝拥有的科学是一种神圣的科学,其他以神为对象的科学也是如此。这种科学本身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特性,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切事物的起因和首要原则,只有上帝才能拥有这种科学。”

这是一种神圣的科学,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其他地方断定幸福是神圣的:它没有超越自然和理性;它广泛地散布和体现在一切有德行的人中间。

因此,作为最高形式的科学,形而上学决定了希腊人的思想,正如神学决定了中世纪的思想一样。我们必须寻找决定当代思想的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求助于神学,

那么就转向形而上学吧。没有神学或形而上学,统一的大学就不会存在。

今天这两者几乎都完全消失了,学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明确基础也随之消失。例如,伦理学方面的真理现在只是有关人际关系的一些常识性教义。除非道德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吸取更高层次的意义,否则它们将蜕化成传统习俗。<sup>①</sup>

一种类似的蜕化不幸降临到了自然科学领域。如果世界没有意义,如果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数据资料,那么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就成了对数据资料不加选择的堆积。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去尝试。可是不管我们能否理解世界,我们都寻求去把握它。这是一件有益的和大家喜爱的事情,但是其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后果是职业教育化、经验主义和混乱;其道德后果是邪恶的道德。正如一位当代人士曾指出的:“为了像一位创造世界者支配自然,人实际上在他的智力和生活中必须要服从于那些非人道的和技术的需要,服从于最初由他引发、现在正侵入人的大脑的那些自然次序的力量。……不管从另外的角度看能获得什么好处,人类的生活状况因此正变得越来越不人道。……把人看做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世界各个部分都是非人道的和压迫人的。……在这样一种道德背景下,不光同样的人和人的生活,就是人的外部力量、物质力量和人的生活手段也屈从于理性。……这种道德背景不能使人得到解放,相反会使人受到削弱、剥夺,

---

<sup>①</sup> 康德:《伦理学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第5页。“因此,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是绝对必要的,不仅是因为思辨的原因,以探究作为我们推理的一项前提的实用原则的来源,也是因为道德本身容易出现所有的各种腐败,如果我们没有这类线索和最高的武器对道德作出正确的估计。”

使他成为世间万物的奴隶,尤其是成为他自己的不幸和利己主义的奴隶。人还剩下什么?一个带着科学王冠的消费者。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礼物,20世纪笛卡尔式改革的礼物。”

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收集到有关世界的足够信息,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既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样的事实是有益的,我们就将它们全部收集起来,抱着乐观的希望。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这一观念已经从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扩展到对人与人关系的探究。权力成了政治学的大话;预测法庭将要采取的行动取代公正,成为律师和法学学者的目标。科学精神导致我们在寻求所谓的社会控制时收集大量有关犯罪、贫困、失业、政治腐败、税收和国际联盟的数据资料。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类未经消化的、无关的和毫无意义的数据资料的堆积。

因此,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究,已经蜕化为一波又一波的经验主义和职业教育主义浪潮。最为可悲的是神学本身所遭受的命运。由于神学不再被看做是科学之王,它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其他科学的一个虚弱的模仿者。它的学生通常只是名义上的神学学生,他们实际上学的是历史,或语言、实验心理学、经验性社会科学甚至是经验性自然科学,以求在一个没有神学基础的教会和宗教中谋得一席之地。他们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是出于职业的目的——希望这有助于使他们适应专业的环境。有组织的教会、宗教教育以及培养各种宗教、半宗教和非宗教组织的领导人,越来越引起神学院的重视。如何举办一次有关公共事务的商人论坛,不久就可能成为比神学更为重要的一项课程活动。目前神学已经沦落至教

育等级中的最低层。其名义上的追随者,面对科学精神不知所措,已经将神学抛诸脑后,并将热情转向那些衣着讲究、顽皮吵闹的女孩,即现代版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身上。

随神学一起消失的是形而上学。现在的形而上学只是其本来面目的一个萎缩的影子,在一个叫哲学的系科中苦苦挣扎。我们设立哲学系,显然是想要表明,哲学和大学其他系科的学习内容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任何学科完全不考虑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sup>①</sup>例如,正如纽曼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物理学想超越的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假设,它就需要借助特定的一些形而上学原理:昨天发生的事会在明天重演,物质的东西是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是可信的,归纳的逻辑是存在的,等等。因此,形而上学重归校园但变得支离破碎。例如,学习《浮士德》的学生将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但是由于教师和学生没有能力参与,由于未能把《浮士德》看做是一首诗、一出戏剧和一种艺术品,这种讨论变得使人讨厌。如果教师和学生形而上学方面具备一定的训练,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理智地讨论歌德的形而上学。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学首要原则的了解会有助于他们思考该剧的艺术价值。你还会注意到,对一位自然科学家而言,在业已成名和学有闲暇之后再去考虑运用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一些原理,在这个国家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由于在这些学科缺乏特别的训练,以及对具备这种训练的人的轻视,它继续在人类面临的

---

<sup>①</sup> 参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困境:“你说一个人必须像哲学家那样思考,那么你必须像哲学家那样思考。你说一个人不必像哲学家那样思考,那么(为了证明你的观点)你必须像哲学家那样思考。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像哲学家那样思考。”

最重大的问题上进一步混淆公众视听。

这些绅士们的表现所造成的影响表明,我们是多么需要一种正统的神学或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经常发现非文学类的年度最佳畅销作品成了一种当代的“圣经”。卡雷尔(Carrel)的《人的奥秘》(*Man the Unknown*)眼下就扮演了这种角色,就像杜兰特(Durant)的《哲学的故事》在几年前那样。

我不是在这里提倡任何具体的神学或形而上学体系。我认为我们通常有意或无意地在努力寻求一种体系。如果我们明确承认有必要建立一种体系,并努力寻求一种最合理的体系,我们就将找到一种更好的体系。实际上,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种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些偶然出现并不断变化的残余之中,我们坚守着它们,因为我们必须坚守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使形而上学重新焕发生机,并恢复它在高等教育中应有的地位,我们就能够在大学及当今世界建立起合理的秩序。

如果能出现这种奇迹,那么高等教育的内容将会是什么?一所大学又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将学习形而上学,即有关首要原则的科学。他将学习社会科学,它是一些实用的科学,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将学习自然科学,即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他将学习所有这三类课程,同时可以突出其中的一个作为学习的重点。他将在学习中将它们联系起来。显然,它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命题和事实,只是最终的标准不同。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将没有任何职业性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们无论是否准备投身于一个有学问的专业,学习的内容将是相同的。学生的学习将不是从最近的观察开始,再回到那些首要的原则,而是从首要原

则开始,再到那些有益于理解这些首要原则的观察。我要提醒各位,我们在讨论普通教育时,对永恒学习和进步主义的学习作出了区分。高等教育主要是考虑那些基本的问题。一个真正参与科学进步的人在其教育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必须这么做。在大学,学生必须掌握那些基本的问题,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后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追踪当前的事态发展。

因此,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是高等教育恰当的学习内容。这种分类是彻底的。我所使用的“形而上学”一词,不仅包括首要原则的学习,也包括由此引发的所有问题,如物质世界的变化原则,即自然哲学,以及对人及其美术作品(包括文学)的分析。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这类实用的科学,以及可能有助于它们指导人类行为的那些历史性的和经验性的材料。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当然是那些思辨哲学的原则。从理论上讲,伦理学原则可以从形而上学中找到。对伦理学本身而言,人们根据实际的次序看待同样的知识。将伦理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看做实用哲学,就是要表明它们是出于行为的考虑而组织起来的哲学知识。在法学方面,我们就有这类实用性原则的实际运用。我所说的自然科学,当然是指对自然的探究。自然科学的原则来源于自然哲学,而后者又依赖于形而上学。在学习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凡是近来能说明、例证和证实这些原则的观察都必须包括在内。医学和工程学就是这些整体知识的实际运用。

通过这种方式构筑大学,可以使大学变得明智。探究首要原则的形而上学无所不在,与此密不可分的是对世界的属

性和人的属性的那些最为普遍的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并服从于它。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学的下属层面,我们还吸纳了那些历史的和当前的经验性材料。这些材料不再是大学学习的那些科学的全部,而是成为理解那些科学的原则的一种辅助性的东西。在这样的大学,学生才有可能受到教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其他方法都不能使思辨的世界作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呈现出来。

我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那种信息的收集,不论历史的还是当代的,都不应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除非那些数据资料说明或证实一些原则,或有助于这些原则的发展。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纯粹的信息收集非常重要,必须要有地方去做。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在大学支持和保护下并与它们共同进行,是有用的、经济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此外,在探讨社会问题时,为那些具有独立、客观和公平的研究能力和意愿的人士提供一个庇护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越是尖锐和具有争议性,提供一个讨论的场所就越重要。然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能在我们所考虑的教育各个层面占据中心地位,它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例证和说明社会科学的原则。

因此,对公众重要的一些领域的信息应该收集、分析和公布。公共行政、公共教育、社会服务、税收、通货膨胀等都是如此,它们属于研究层面,而不是教育层面。它们应该研究,可以和大学一起研究。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将它们列入大学课程除了使大学更加混乱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贡献。

同样,收集自然科学方面的信息非常重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士尽管在大学本身没有地位,但他们应该在和大学合作

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天堂。目前工业界并不准备,也许永远也不会准备充分地开展或资助此类工作。因此,我认为在大学应设立研究性研究所,开展目前由教授及更多的人承担的所有当前的和历史的事实资料的收集工作。研究性研究所的成员将不会是大学系科的成员,除非他们也在研究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只有研究这类问题的人士才能对影响大学运作和教学内容的事务拥有发言权。

如果不相信有学问的专业能将它们的专业实践传授给年轻人,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在大学附设同样的技术性研究所,使学生熟悉这些常规。即使这样,当然还应注意确保这些常规是值得和能够传授的。

研究性研究所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技术性研究所,因为它们训练人们从事它们自身也在从事的那种研究。可以想像,有些技术性研究所将自然而然地从事一些被认为有助于技术训练的那种研究。

已经极大地阻碍了教育和知识进步的那种系科制度将会消失,大学的全部机构将由三个学院组成。现有系科中那些专门从事数据资料收集工作和职业训练的成员将会被转移到研究性和职业性的学院,只有在这三个学院中从事基本问题研究的人才会继续担任大学的教授。

大学的专业学院会因此消失。有学问专业的教育将在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学院进行。未来的牧师将毕业于形而上学学院,律师将毕业于社会科学学院,医生和工程师将毕业于自然科学学院。我们还应该期望在形而上学学院发现未来的哲学家,在社会科学学院发现未来的行政官员、法官、立法人员、政治家和公共事务专家,在自然科学学院发



现那些将毕生致力于科学探索的人。那些本身没有理智方面内容的专业学院会一同消失,除非它们的工作值得研究性和技术性研究所予以保留。

为了说明这种教育的可能性,我将对有学问专业的教育作出更为具体的阐述。未来的牧师在大二结束时将具备源于经典名著和文科的一种良好的普通教育训练。在大学里他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形而上学学院。但是他还将学习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尽管学习方式和内容与未来的律师工作不尽一致。尽管他将掌握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主要思想,但是他不需要在超越了形而上学本身内容的这个领域掌握太多的东西。如果在担当一个教区的工作之前学习一定的宗教习俗对他非常重要和必要,那么他可以通过学徒制或在大学附近专门设立的技术性研究所去掌握它们。

未来的医生来到大学,也要具备和牧师一样的普通教育训练,他将学习形而上学和自学哲学,但是这种学习不会使他在闲暇时间里沉湎于一知半解式的哲学猜想。他还将从中了解所有实验性自然科学背后的那些主要原则。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将放在作为前临床科学的物理学和生物学上。尽管他还将对社会科学和法学有一定的了解,但不会详细去学。大学和医院的附属机构应该在他上岗面对病人之前确保他具备一些必要的经验。

未来的律师应该具备和牧师及医生一样的普通教育训练。他将学习形而上学,因为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会毫无意义。为了他所从事的这一重要职业,他将接受这种哲学训练,掌握法理学,而法理学是由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建立在上述学科基础之上的法哲学组成的。他

还将学习有关社会的一些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知识、法学史和法律机构、经济学和经济史。他将对物质世界有一些了解,但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给他带来的那些东西。从事职业工作时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如熟悉某个司法管辖区的规则、案例摘要和报告的使用方法、法律文件的起草、简报的撰写及行业的诀窍, he 可以从大学附属的法学院获得。

未来的教师的普通教育训练将和律师、医生及牧师一样。有了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方面的良好教育,他就了解了教育学的基本规则。文科毕竟是使智力从可能性转化为行为的学科,而这正是教学之所在。文科训练教师如何教学,也就是如何组织、表达和传授知识。在大学他应该学习教什么。他应该在所有三个学院学习,特别是形而上学学院。如果接下来他准备去调查或接受职业训练,他可以在一所研究性研究所或技术性研究所学习调查或实践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他有可能成为一所学校的管理者,如果一位学校的管理者应该知道每立方米需要多少校舍维护人员,如果一位学校管理者在具备这类知识之前不应担负起一所学校的管理职责,那么这类知识应该从技术性研究所获得。

只有以这种方式教育教师,我们才会打破我已多次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即不好的制度造就了该制度的执行者,从而又使该制度永久化。如果我们能从一些教师的教育着手,我们就可以期望,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种普通教育和大学会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大学将由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学院组成。教授将是考虑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的人士。教学将面向对这些领域思想的理解,而且将不带任何职业性的目的。

学生将同时学习所有这三方面的内容,但专攻一个方面;他将在低年级就学习这种课程,并持续约三年时间。

既然需要在大学的附近进行历史的和当前的数据资料的收集工作,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可以与大学共建,但是它们不是大学的组成部分。如果需要为那些要求有特别知识和技能背景的职业提供实际的训练,也可以与大学共建类似的技术性研究所。学生在完成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前,不应进入技术性和研究性研究所。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通过消除目前的那些导致高等教育混乱的因素,即职业教育主义和无限制的经验主义,我们可以使高等教育恢复秩序。如果这些因素得以消除,我们根据一些秩序原则,如根据形而上学去纯粹追求真理,那么我们将拥有一种合理的大学发展计划;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中心;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

我们还会看到,高等教育的困境在这样一所大学会迎刃而解。职业教育主义的困境不能阻碍我们,因为专业和非专业的科学不再泾渭分明。它们都在三个学院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学习。职业技能的训练是职业界的事,如有必要,也可交由以不会使大学产生混乱的方式成立的技术性研究所进行。

由于同样的理由,孤立主义的困境也将不再制造麻烦。学科间将不再相互割裂,而是通过一种合理的原则相互融合在一起。教授和学生将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他们将知道追求什么真理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既然所有学生都将在所有学院学习,他们所获得的教育将不再是琐碎的或混杂的教育,而是与大学本身一样的统一的教育。

这样,反理智主义的困境也会变得更容易处理。反理智主义的时尚色彩是如此强烈,以致很难像其他两类困境那样坚定地或令人满意地加以解决。我所描述的大学是理智性的,它完全是这样的。同样,这也是惟一值得拥有的那种大学。我相信,它将比那些致力于当前的事态或职业训练的大学在政治和专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如果这个国家不准备相信这些东西,它可以从我提出的技术性和研究性研究所得到的东西。建立这种研究所的构想,有助于消除一直困扰大学的经验主义和职业教育主义倾向,使大学可以自由地开展它们的理智性工作。

如果在这个国家我们能拥有一种真正的大学和能够得到大学信赖的真正的普通教育课程,也许我们的文明特色会逐渐发生变化。也许我们会对追逐金钱感到厌倦<sup>①</sup>,对民主的认识会更加健全,甚至还会加深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也许我们会放弃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和效用观,我们会更喜欢易于理解的组织方式,而不是我们误以为自由的那种混乱局面。这是因为这类事情也许表明教育是重要的。我们的国家必须将真正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其中包括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过,这应以理性为指导;以实现真正的繁荣为指导,其中包括一些外在的东西,但是也不能忽视灵魂的东西;以真正的自由为指导,这种自由只存在于社会,一种具有合理秩序的社会。

---

<sup>①</sup>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二部分第七章:“因为需要均等的不是人的财富,而是人的愿望,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提供足够的教育。”

## 附录一

# 赫钦斯与名著阅读运动<sup>①</sup>

弥尔顿·梅耶

## 名著工程

对成年立法者的失望,使赫钦斯开始强调人们在改革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斗争中基本上忽视的一个议题:“经验性的学科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学习,这一教学法的原则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即教育最重要的分支是成人教育。我们有时似乎将教育视为麻疹、腮腺炎、水痘、百日咳之类的东西——得过一次,就不需要、的确也不能再得。”

“人只应在儿童期开始学习的说法,意味着他们只在儿童期时才是人,也意味着他们不配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和发展公正、和

---

<sup>①</sup> 选自弥尔顿·梅耶:《罗伯特·M·赫钦斯传》,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平、自由和秩序不懈努力。“理想的共和国是一个学习的共和国,这是评价所有现实的共和国的一种乌托邦。”<sup>①</sup>

教育不是儿童的事。赫钦斯指出:“除了数学、形而上学、逻辑学、天文学和类似的理论性学科,理解显然只来源于经验。一个博学的希腊人”——即亚里士多德——“指出年轻人不应该去听有关道德哲学的讲座,他是对的。道德哲学、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只有成年人才能完全理解。我在一所预备学校教过学生《麦克白》,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喧闹的故事,非常优秀,值得去教,但它仍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喧闹的作品。只有读者对婚姻有了足够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并渴望理解一些问题及其含义,《麦克白》才会展现出莎士比亚的原意。”

“一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或音乐家,我认识几个在13岁时就在国际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天文学家。但是我从没见过这个年纪的孩子能说出很多人生的目的、有组织的社会的目标以及调和自由与秩序的方法,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最感困惑。如果我们的文明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作某些澄清。”<sup>②</sup>

这如实地反映了青年人的教育,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成人教育——如与丹麦成人的国学学校(Folk School)制度相比——基本上属于一种职业教育。它假定学生将在他学习时的地理和技术环境中工作:“学生在达斯特堡接受农业职业培

---

① 赫钦斯:“教育的基础”,载《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哈珀出版社,1953年版,第75—76页。

② 赫钦斯:“教育何去何从”,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讲话,1947年5月12日。

训,但他们毕业后到了芝加哥。学生在芝加哥报废的机器上接受机械方面的训练,而工作后会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sup>①</sup> 培养产业工人的场所是产业,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培训飞机机械师所证明的那样——飞机制造厂短短的几个星期的强化训练,比学校几年的教育更能培养出好的机械师。

成人教育中对职业主义的厌恶,是大学中由于很难吸引年轻人对“学术性学科”的兴趣而蔓延的职业主义的必然结果:“足球、联谊会和娱乐方面的机构,都是想使那些缺乏兴趣的人的教育变得愉快的一种手段。”<sup>②</sup> 每个男孩和女孩都有责任使自己接受尽可能多的真正的教育,而不管经济能力如何——有趣的教育是通过使用名著而非课本、讨论而非讲座来进行的。

“实际的情况是,最好的实用性教育是最具理论性的教育。现在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所有领域都在发生迅速变化的时代,以至于一代人在政治学、工业、商业和工艺学领域所掌握的实际知识对于下一代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父亲学到的生活知识对于他的儿子几乎毫无用处。如果新的一代要想找到走出明天的迷宫之路,他们需要的是原则,永恒的原则,而不是资料、事实和有用的小常识。”<sup>③</sup> ——如果现在的一代人想要找到走出今天的迷宫之路,他们需要的是将原则

---

① 赫钦斯:《我们需要的教育》。

② 赫钦斯:“教育何去何从”,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讲话,1947年5月12日。

③ 赫钦斯:“教育何去何从”,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讲话,1947年5月12日。

应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去。

在 20 世纪前的三十几年里,城市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成人教育机构几乎完全是补习性和娱乐性的。它们在人们闲暇时或退休后为他们提供工艺美术方面的教学,或为移民或在儿童期失去教育权利的本国人提供语言方面的训练。但还有另外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成人教育的传统,以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 Movement)及各个分散的有关通才学习的公共论坛为标志,其中之一是 20 年代艾威特·迪恩·马丁(Everett Dean Martin)领导下的纽约人民协会(People's Institute of New York),他们为那些对非职业性的自我提高感兴趣的听众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免费讲座,其中一个只收取微薄报酬的演讲人,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年轻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

1926 年,马丁在艾德勒、斯科特·布坎南(Scott Buchanan)和其他演讲人的鼓励下,从卡耐基公司得到了为期两年的资助,用于在城里建立名著讨论小组。小组的成员包括处于上升期的哥伦比亚年轻学者,如克里夫顿·费德曼(Clifton Fadiman)、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理查德·麦克恩(Richard McKeon)、马克·范·杜雷恩(Mark Van Doren)和韦太克·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其中两人作为每个讨论小组的共同负责人——都是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在哥伦比亚开设的普通荣誉学位课程时的学生,这个课程上采用的教材是经典名著,而不是教科书。

人民协会的试验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资助。十多年后,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作为大学一年级荣誉学位课程的名著课的阿勒德和赫钦斯,又在该大学位于市内的成



人教学点开设了类似的课程。由年轻教师讲授的这类课程，在和传统的夜校科目的竞争中并未受到特别的欢迎。后来阿德勒策划了在芝加哥大学建立讨论小组的计划，与15年前人民协会的方式颇为相似，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下属各分馆也对外开放。问题是如何找到足够的小组负责人。阿德勒向大学各部门的负责人建议由大学对非专业人士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各个小组的负责人。由于苏格拉底法涉及问题的问而不是答，并反对讲座，聪明的非专业人士经过培训显然可以做这件事，或许还可能比专业的学者做得更好，因为专业的学者习惯以专家自居，利用讲座大发宏论。

1944年所作的努力立即获得了成功。其他图书馆系统，首先在中西部，然后扩大至全国，也加入了此项活动。芝加哥大学不得不派出各部门的教师对非专业的小组负责人进行培训，以应付讨论小组的迅速增加。这些讨论小组不仅在图书馆聚会，在教堂、工厂、服务性和老兵的组织以及夜校，也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这项迅速发展的活动面临着两个困难。公共图书馆没有足够数量的但丁、柏拉图或吉本(Gibbon)的著作来同时满足一个25或30人的小组的需要。其他为活动提供资助的机构和院校甚至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活动的资助者要求小组成员去购买图书而不是去借阅，因为赫钦斯和阿德勒认为一本经过认真阅读(或反复阅读)的书应该是一本做满了记号的书。为了开展小组讨论，每个参与者都应该有指定内容的统一译本，可能的话，他们应该有同一版本的书以便讨论时统一翻阅，这十分重要。与图书馆一样，书店也没有足够的库存同时满足25或30个消费者对某一指定的书籍的需要——或

者,通常的情况是,同一个社团有几个讨论小组,他们可能同时需要 50 本、75 本甚至是 100 本同样的书。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必须为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多至十年——的小组讨论制定阅读书目,加上高中和初中的读物。大学各分部不久就听到了许多关于开展一项全国性事业的呼声,但直到战争结束,名著基金会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成立,并由赫钦斯任董事会主席。这时林·A·威廉姆斯(Lynn A Williams)出现了。威廉姆斯曾经接受过律师和工程师的培训,表面上是一个强硬的工业管理人员,但是他非常热心于成年人的自由教育,而不论他们先前的教育如何。作为斯图尔特·华纳(Stewart Warner)公司的副经理,经营着印第安娜波利斯(Indianapolis)的工厂,他请求得到大学的帮助,在工作时间为他的工人开设名著讨论活动,并由艾德勒和其他一些芝加哥大学的教师来印第安娜波利斯实施这些讨论。

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包括赫钦斯,立即对威廉姆斯和他不拘一格的形象产生了兴趣。(一则:“你想给竞争对手一个痛击吗?那你就雇用他们最好的推销员,将他派到缅因州,然后将他解雇。”又一则:“不要解雇那些不优秀的人,要解雇的是那些雇用他的人。”)赫钦斯请威廉姆斯担任名著基金会主席——后来担任大学的副校长——于是威廉姆斯离开了工业界,成了一名学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以及战争结束后最初的几年中,全国范围的名著讨论活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对志愿性的小组负责人进行为期六至八个单元的培训几乎总是十分成功,非专业人士总能很快掌握获取知识的技巧。由于要求小组成员结合自己的常识和经验对名著本身发表意见,消

除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那种高人一等的思想,于是各讨论小组不久就具备了极为宽广的社会基础。以前从来没有社会交往经历的人,发现智力上的交往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两个小时讨论中间的休息时间里,走廊里总是极为热烈;各个小组经常在年末的社交聚会上自娱自乐。这个年复一年将参与者维系在一起的活动,进一步证明了赫钦斯的观点:背景最为不利的以及从事平凡工作的人和那些受过更多自由教育的公民一样,也很容易动情于那种令人激动的自我教育。

在赫钦斯漫长的预言家般的一生中,他作出了两个可能会得到已故的费尔雷洛·拉·瓜第(Fiorello La Guardia)称赞的预言。1920年,他的两个耶鲁大学的本科同学带给他一份拟议中的周刊的样本或复制品;他告诉他们,这个周刊永远也不会发行,并建议他们忘掉它(这两个朋友是亨利·R·卢斯和布律顿·海顿)。他们没有放弃;这份拟议中的周刊就是《时代》杂志。第二个预言是在1947年,当时赫钦斯是刚成立的名著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几年,面向成人的名著讨论活动已成为席卷全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由于它被认为是有助于消除整个美国教育的职业主义和“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一种工具,赫钦斯和阿德勒对此进行了过分的(两代人之后会用这个措辞)宣扬(一代人之后会用这个措辞)。相关的文章不仅出现在高层次出版物中,同时也出现在像《生活》这样的出版物中,主要的城市都掀起了公共的讨论。赫钦斯和阿德勒吸引了3000人涌入芝加哥交响乐厅讨论柏拉图的《论辩篇》;知识贫乏的市长则宣布将举行名著周的活动,赫钦斯在喧闹的气氛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预言五年内将会有1500万人参与名著讨论活动。

他错了,参与者只有 1495.7 万人。这项运动在战后激动的第一年达到了顶峰,有 43000 人参加,分布在将近 300 个社区——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成就;然后趋于稳定,也许是正好遇到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反理智主义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t),它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辉煌,赫钦斯和阿德勒也逐渐退出。30 年之后,这项运动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而威廉姆斯成了董事会的主席),它仍是这个国家最接近于成人自由教育的活动。

由于 1947 年后大学脱离了这项活动,独立的名著基金会只能从其他渠道寻求经费支持。保罗·梅隆(Paul Mellon)的旧领地基金会(Old Dominion Fund)提供了资助,后来短命的成人教育基金(Fund for Adult Education)(赫钦斯在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设立的福特基金的一个分支机构,他是该机构的副主任)也提供了资助。

但对书的大量需求为解决经费问题提供了方法。基金会为每年的活动印制八至十套平装的读物,并以适中的价格卖给活动的参与者(没有学费;非专业的小组讨论负责人没有报酬;会场免费;用书的利润以及持续的资助支付两至三名参加培训的小组讨论负责人和一名办公室职员旅费和薪水)。

在图书馆和教堂里向社区提供廉价的平装重印本是一回事;向“胖子”(Fat Man)提供书又是另一回事。“胖子”是副校长威尔·马耐克(Will Munnecke)以及后来的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独创。1943 年春——噢,是的,当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马耐克想到了一个小的计划,并试探了一些关系密切的董事和芝加哥名流的想法,他们的反应是令人兴奋的。他找到赫钦斯,建议建立仅由特邀的芝加哥的重要人

物(如经济上富裕或肥的)及他们的夫人组成的名著讨论小组,在市内漂亮的大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由赫钦斯和阿德勒担任共同的负责人,弥尔顿·梅耶(Milton Mayer)则负责提供茶水。尽管参加者肯定会有些变化,但是这一活动一直持续了将近30年。(当赫钦斯离开大学时,阿德勒乐于独立主持这项活动的继续开展,轻易打破了每个讨论小组由两名负责人的这一不变的传统。随后,他在旧金山建立了自己的讨论小组,并在亚斯本人文学院(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建立了另一个“行政人员”的研讨班。在印第安那波利斯,也有一个类似的精英研讨班,由阿德勒和梅耶负责。正是由于参加了这个研讨班,使威廉姆斯从此走进了名著的领域。)

随着“一般性的事务”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赫钦斯更加急迫地感到,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他所关心的以及他在大学中必须做的事情上面。他关心名著讨论运动,为此发表演说,并和阿德勒(有时是梅耶)一起参加在全国各地拥挤的大礼堂里举行的经典著作如《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公共讨论会。但是他不得不将行政事务交给阿德勒和分支机构的人。没有一般性事务在身的阿德勒也急于加入这一不断发展的运动,并成为这一运动有力的推动者。

赫钦斯极力在“胖子”班上露面,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董事会中有三分之一的董事参加这个讨论班,其中包括他的几个有影响的朋友;他在董事会中的那些固执的敌人则一个也没有参加,尽管也受到了邀请。除了董事之外,参加这个讨论班的还包括一些大学的捐赠者和几个著名的律师。聚会的气氛是活泼和清新的,黄金海岸的精英们就政治、经济、

宗教等议题,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他们这个体面的圈子里很少提及更不要说讨论的个人恐惧症和狂躁症进行了友善的讨论。假如这个聚会媒体开放,麦考密克(McCormick)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就可能会报道其中的一些颠覆性的讨论,如那些被认为是好人的人(城市中最好的好人)在那里大谈特谈马克思、自由恋爱、无神论甚至共和党。赫钦斯的嘲讽算不了什么,它仅仅限于富人的圈子里,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一种永恒的乐趣和一些真正的启发。“胖子”研讨班是一个不错的班,而且从战术上看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给这个研讨班寻找书籍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绅士们不喜欢在二手书店中淘书;他们喜欢得到他们最近想要的书,并在想要的时候就能得到它们。这意味着芝加哥的书店随时能拿出 35 或 40 本柏罗丁(Plotinus)、休谟(Hume)或法拉第(Faraday)的著作(阿德勒为这个特殊的小组所开出的书目与常规活动的书目是无关的)。

书的问题似乎很快变得无法解决。但是,有一个“胖子”专门尝试去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并尽可能从中获得利润或获得巨额利润,他就是威廉·伯奈特·本顿(William Burnett Benton)。为了节约时间,他先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威廉·B,然后又缩写成简单的威廉——他是赫钦斯耶鲁的同学,曾经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做过出版商,并拥有过《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三分之一的股份(他将另外三分之二的股份赠给了大学)。本顿向赫钦斯和阿德勒建议由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一套大型的名著丛书。

## 广告人

名著丛书源源不断地出版——包括带来滚滚财源的埃利奥特(Eliot)的《五呎丛书》(*Five-Foot Shelf*)。

自从本顿在珍珠港事件后从西尔斯(Sears)手中接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至1943年中期,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开始从事那些不久就能带来巨额回报的工作。本顿在寻找新的投机机会,主要在出版业,并接手了《康普顿的图解百科全书》(*Compton's Picture Encyclopaedia*)和以出版词典见长的梅里厄姆—韦伯斯(Merriam—Webster)公司。但是出版业还不足以完全使他安心。他与他的朋友比尔·乔伊斯(Bill Joyce)打赌5000美元,因为后者断定可以在洛杉矶生产鞋子,并终止了与乔伊斯鞋业公司每年500万美元的合作。他酷爱艺术,保存了大量的美国绘画作品,并发起过雷金纳德·马什(Reginald Marsh)的作品展。作为一个年轻的广告人,他发明了一种令人厌恶的音乐,即电台的音乐广告;作为一个历经商海的企业家,他断断续续地从事莫扎克(Muzak)“音乐墙纸”(Musical Wallpaper)的制作(并获得巨大的利润)。(在一个非正式场合介绍他时,赫钦斯说他应该为他所发明的东西道歉。)他说服了他在劳德和托马斯(Lord and Thomas)广告公司的老板——芝加哥大学董事会的阿尔伯特·D·拉斯克(Albert D. Lasker)也一样——向派索登(Pepsodent)建议由他们资助当地NBC电台的阿摩斯·安迪(Amos'n' Andy)节目。十年后,他又说服了

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资助芝加哥大学的圆桌广播,这两个节目成了所有娱乐和教育广播节目中收听率最高的节目。

并非每件事都是毫无价值的。作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在20世纪40年代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引入到教育影片这一全新的领域,从西方电气公司购买了埃皮(Epi)教学电影制作部并将它与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教学影片部(这是伊斯曼赠送给他的,就像西尔斯将《不列颠百科全书》赠送给他一样,赠送比出售在税收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合并。他预期不列颠百科全书制片公司的运作会出现几年的赤字,但是由于他的办事风格,结果出乎他本人的预料,短短几年内,该公司每年为大学带来了30万美元的收入,本顿每年的获利也超过了10万美元。

作为芝加哥大学副校长,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参与各种有关审查、卡特尔、飞机制造、英美关系、公众、和平环境等方面的圆桌会议,很快就基本掌握了这些大的议题。他利用自己的这些背景,担任了杜鲁门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策划了美国之音对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广播。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政治家,以至于他的老搭档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州长任命他为代表康纳狄克州的美国参议院议员,为期两年。1951年,他独自提出了驱逐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议案。

尽管1952年他在康纳狄克州的竞选中被麦卡锡势力击败,但和其他所有参议员一样,他从未放弃过成为“参议员”的努力。10年后,他成了美国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位大使,他也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竞选最大的赞助人之一,并



徒劳地宣布愿意接受圣詹姆斯法院高级职位的任命(他喜欢说美国驻外人员应该讲驻在国的语言;而他自己说的却是一种口味非常重的英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时(及之后)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组织,去那里任职主要是荣誉性的,包括每年三次或四次的横跨大西洋旅行。

他死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与莫德·赫钦斯(Maude Hutchins)谈到了他。这个朋友说:“听说比尔在睡梦中去世了。”赫钦斯说:“如果他醒着,他就不会死。”他对时间的珍惜超过其他任何东西(包括人),他永远都在与时间赛跑。他会说,“我想睡 20 分钟”——就睡 20 分钟。他到芝加哥大学与赫钦斯共事后不久,就听说有两个分秒必争的人,立即引以为范。听说生理学家内森尼尔·科雷特曼(Nathaniel Kleitman)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希望将正常的夜间睡眠时间减少两个小时,本顿就匆匆跑到科雷特曼的实验室说:“想想看,两个小时,我省下了两个小时。”

有一天,赫钦斯走进本顿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口述一封给母亲的信,开头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妈妈,冒号。你好吗,问号。”于是赫钦斯问候道:“你好吗,问号。”本顿对每件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如果他能立刻在简短的备忘录中找到的话。如果不带口述录音机,他从不走动或坐下。他很少关掉口述录音机,更难得写点什么。作为最早一批定期在芝加哥和纽约间来回飞行的美国商人,他对节省时间的飞机旅行总是显得犹豫不决。在 20 世纪有限公司(Twentieth Century Limited)有一张经典的照片,记录了他坐在理发椅上,一只手拿着饮料和口述录音机,另一只手一位指甲师正在工作,一名助手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在作记录。

当赫钦斯得知他辞去本顿和鲍尔斯公司的职务后,即任命他为芝加哥大学副校长,以加强大学的公共关系。为取悦学校的董事,本顿口述了整整一本材料,其中的建议之一是大学应该改名,以免被误认为是一所公立的学校。赫钦斯将这本材料分发给董事们,绝大多数董事对本顿能如此迅速地掌握学校事务表示惊讶。但是其中一位董事,首要的保守分子、蒙哥马利·华德公司(Montgomery Ward and Company)董事会主席塞威尔·艾弗里(Sewell Avery)却在“重复过去的老调”。赫钦斯在给本顿的信中写道:“从艾弗里先生的发言中,我艰难地体会到,他认为学校过于激进,在当局清除那些激进分子之前,我们的公共关系是无法得到改善的。斯威夫特先生”——董事会的主席——“对艾弗里先生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结果艾弗里先生说,如果学校未被赤化,那么你的任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sup>①</sup> 本顿十年里每年都要花六个月时间呆在大学,他最后去了国务院任职。

他不是一个人外表狂热的人。在一贯狂热的气氛中,他只是——一路坚持,并不断推动他人前进。他不是一个人爱发号施令的人,但他的一生都在发号施令,并全身而退。他粗暴,甚至残酷,但决非无情。他是在智力、体力和情感上,而不是经济上利用每个与他相处的人。秘书们半夜还在整理本顿口述录音机中的备忘录和信件。如果这意味着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家人和爱慕者,那么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和爱慕者因为加班而得到可观的补偿,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他的私人助理、芝加哥小伙子约翰·豪曾经被问道,当办公室的工作压力

---

<sup>①</sup> 赫钦斯:《致本顿的信》,1937年2月11日。

特别大的时候,他的老板是否考虑过再雇用一个小女孩来帮忙。豪解释说:“比尔不会雇用一个小女孩,他会雇用一个小女孩去雇用一个小女孩。”

一个长期的同事解释说:“比尔认为他得到了‘权力’,他得到的是金钱。”他不是一个天生有权势的人,他只是一个无耻固执之徒,非常富有,雇用了世界各地最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无法拒绝他的慷慨。他习惯说,“想法并不稀罕”。那些有想法并为本顿所用的人更加值钱。(“如果我让鲍伯·赫钦斯一次离开我的视线超过60天,我会发疯的,他的每个主意都给我带来了财富。”)他的传记作家曾描述了他是如何雇用艾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州长——他在总统竞选中失败后,即将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重新投入私人律师工作以偿还他部分的债务。这位本顿热情的传记作家记录了本顿对这位著名的朋友和旅行伙伴提出的一个新建议:“你年纪大了,不应再为委托人和他们的琐事操心。如果你愿意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工作,我会每年给你10万美元,及每年10万美元的费用账户。”

“那么”,斯蒂文森说,“我能做些什么呢?”

“你会成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历史上最伟大的雇员”,本顿说,“你会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计划作出重大的贡献,并有助于使我们的电影公司扩展成为基础广泛的教育公司……鼓舞我们年轻的行政和业务人员……帮助我们在出版界和教育界成为一支世界性的力量……你对公司的参与会引起所有国家对新的教育技术——教学仪器、新的教学、教学影片的使用以及视听教材——的兴趣,而且你仍有时间作为一个国际人物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因为我不奢望占用你甚至

40%的时间。”<sup>①</sup>

本顿,或者他的金钱,对于像斯蒂文森这样的人而言通常是不可抗拒的。在斯蒂文森去世及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竞选总统失败之后,本顿以7.5万美元年薪聘请后者担任顾问。他为斯蒂文森和汉弗莱的总统竞选捐赠了大笔资金,并于1968年直言不讳地要求其董事会的每个成员为总统候选人汉弗莱捐款1万美元——除两个人外其他人都照办了。斯蒂文森和汉弗莱都是平常得近乎出色的人,他们的想法来源于他们自己及本顿的中西部民粹主义的背景(他与参议员鲍伯及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尔·拉·弗莱特关系密切)。与本顿一样,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来自原始大草原的激进主义。他们是新的社会改革之前、期间及之后的新的社会改革者。他们都比他举止文雅,在大部分层面更加聪明——而且他们一生都热爱金钱。他们与本顿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他们没有失败,他也赢了。

本顿终归是一个买卖人,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以及后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名著丛书”)中,他得到了他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不列颠百科全书》做了大量的广告,主要通过直接邮递。它没有销售办公室,也没有在书店出售图书;它的购书协议从不公开或在电话里告诉人家。根据装帧及分期付款的协议,它有很多不同的价格。它惟一的销售方法是销售员直接上门向潜在的消费者极力推销。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质量再也没有达到过其著名的1911年版本的顶峰;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质量出现了下

---

<sup>①</sup> 海曼:《本顿》,第556—557页。

降,在本顿领导时期,质量更是出现了明显持续的下降。本顿认为(他自己也并未完全意识到)书的内容并不比封面的卖相更重要。这位新的出版商对任何开支都非常节省,但在销售推广方面却从不吝啬。他减少了编辑在换版时对书的校正和更新,成书低劣的质量招致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用了厚厚一本书的篇幅,逐字逐句地控诉新的改进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种种糟糕的缺陷。<sup>①</sup> 本顿对这些批评毫不理会,并加快了销售的进度。

这个全球性企业的中心在芝加哥的图书收发部。“《不列颠百科全书》完全依靠分期付款生存”,本顿说,“这是我们全部的生意。”)在成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之后不久,他即开始发行另外一本配套的年册,售价为 12.5 美元,并称之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年册》(*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十年之后,也就是《西方经典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问世之前,由于这本区区 12.5 美元的书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他又让莫蒂默·阿德勒策划另一个 12.5 美元的配套书,名为《当代伟大的思想》(*Great Ideas Today*),出售给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西方经典名著》的顾客——这又是一个小小的金矿。本顿对这两次动作的解释是,那些分期付款的购书者会一直购买到没有书可购为止;他们也会在正常的订购之外再花费 12.5 美元。

《不列颠百科全书》臭名昭著的销售方法和推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董事会拒绝提供运行资金,不愿接受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将《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为礼物赠送给

---

<sup>①</sup> 哈维·艾因宾德:《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神话》,格罗夫出版社,1964 版。

大学的建议(据赫钦斯说)。在本顿接手出版公司大约 15 年后,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他停止“招募销售员到顾客家中推销其百科全书、其他书籍及相关服务并收取欠款这种欺诈行为。”<sup>①</sup>(本顿的传记作家并未提及这件轰动一时的事件。)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位教授有意购买一套 54 卷本的名著并写信到公司询问价格,得到的回应是来了一个上门的名著推销员,发表了一大通关于阅读以及购买名著的好处的演说。教授试图打断他,说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些优点,写信只是想知道这套丛书的价格,但是这无济于事。在将销售员打发出家门仍然不知道价格后,他愤怒地写信给本顿,但是却收到了本顿助手的一封有礼貌的回信,告之这种销售方法以及演说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因此公司不允许其销售人员放弃这一方法。

本顿建议通过出版一套书来解决“胖子”班的用书问题,但是这一建议在各地遭到冷落;但仍有一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莫蒂默·阿德勒。正如赫钦斯羡慕地说过,本顿和阿德勒两人都是为对方而生,他们分别是两种热卖产品——保摩利夫肥皂和托马斯主义——精明的推广人。随着他们与赫钦斯的关系渐渐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当赫钦斯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席这一高薪职位退下来之后,同时与本顿谈判合同的阿德勒接替了他。

1943 年春,本顿和阿德勒带着西方名著计划找到了赫钦斯,赫钦斯并不看好这一计划。1943 年,战争仍在继续,没有人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也的确不知道战争如何结束。成熟的市场也许还不存在,本顿和阿德勒计划出版的从荷马(Homer)

---

<sup>①</sup> 《不列颠百科全书记事》,1961 版。

到弗洛伊德各个领域的“西方名著丛书”，甚至连印刷的纸张也非常缺乏。

此外，与往常一样，赫钦斯被推上了这项计划的最前沿，担任丛书的主编；他不知道如何在本顿和阿德勒提出的这项计划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不是问题；阿德勒将担任副主编，并在需要时临时代替鲍伯的工作，这在每个方面都被证明是必要的。丛书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由赫钦斯确定，他们将负责从74名作者的443部著作中确定丛书的人选书目，这些人包括巴尔(Barr)、布坎南(Buchanan)、厄斯金(Erskine)、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亚历山大·米克尔江(Alexander Meiklejohn)、迪恩·克拉伦斯·H·浮士德(Dean Clarence H. Faust)(赫钦斯下属一个学院的院长)，以及生物学家约瑟·J·萧伯(Joseph J. Schwab)(支持赫钦斯的年轻的芝加哥科学家之一)。选择书目的工作花费了两年时间，期间召开了几十次周末会议，顾问们还要进行没完没了的阅读及通信。赫钦斯没有参加大部分会议，会议大多由阿德勒主持，尽管如此，赫钦斯还是坚持尽量去阅读(以他通常的那种惊人的速度)那些最具争议的著作。四分之一入选的作者是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另外四分之一是社会科学家(包括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余的作者分别包括富有想像力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最后四个世纪的作者所占的比例少于总数的六分之一，只有梅尔维尔(Melvill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联邦文件》(*The 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是美国人。(除圣奥古斯丁外，几乎没有非白人作者，而且均为男性。)

除了1952年轰轰烈烈的发行宣传之外，这套丛书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人士的批评，包括相信世界在上星期四才刚刚

开始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从美国开始的文化侵略主义者,(当时的)少数东方著作、女性著作和黑人著作的崇拜者,以及没有人选的名著作家,如西塞罗(Cicero)、加尔文(Calvin)、尼采(Nietzsche)、莱布尼茨(Leibniz)、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勃朗特(Brontes)的推崇者。

这是一个经典的事业,九年的出版工作众所周知,它也是文学、教育和商业并重的观念的胜利。除了有些人出于特殊的利益吹毛求疵之外,这项工作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曾在《纽约时报》上欢呼“这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伟大纪念碑”。它也是作为推广者的本顿和阿德勒力量的纪念碑。特别是本顿,是他发现了阿德勒在提出和策划与丛书配套的两本辛托皮孔(Syntopicon)上的天才。

在这项伟大的冒险工作开始时,本顿要求能够为可能的购书者提供一些阅读性较强的东西。阿德勒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最后提出一本思想索引,使读者接触到所有名著作者在某个主题方面的一些最精彩论述,以实现购书者的最大梦想。

辛托皮孔——是阿德勒发明的名词,指的是“是一份主题汇编”——起初计划花费6万美元,为期2年,但是它实际上花费了100万美元,历时8年(期间先后发生了美国与德国、日本和朝鲜的战争)。阿德勒在中途岛路(Midway)与校园相望的地方租用了一个灰石大宅,招募了约50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包括当时还未成名的索尔·贝洛),再加上75名文书方面的帮手,每月的薪水开支高达26000美元。他们通读了443本名著——加上并未收入丛书但出现在索引中的《圣经》。索引中包括阿德勒所列的102个伟大思想的大量参考条目,从



天使(Angel)一直到世界(World),以及这 102 个思想包含的 3000 个主题;总之,在著作段落的筛选方面作出了近 90 万个决定。阿德勒放弃了大部分的教学和讲座活动,坐镇索引部为他的员工打气,就像本顿鼓励《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销售人员那样。“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做得不错,但康德、笛卡尔、柏罗丁必须加油……在主题 2b 中,我发现只有三条提到亚里士多德,三条提到洛克。这肯定不是全部,必须再做些工作……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不能依靠随意的收集。我相信我是对的,不要放弃。”)

辛托皮孔的编辑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卷的工作量看上去就令人害怕,严肃的学者也不可能对参考条目进行核对。因而流言四起,认为赫钦斯和阿德勒一直坚持只选择 100 本名著,将一些重要的思想无情地排除在 102 个伟大思想之外(或包括在内)也没有严肃的依据。他们的选择最终肯定有某种武断的成分,不过每个人选的思想前面都有阿德勒撰写的一个冗长的引言,将这些思想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此外,还有 1800 条术语的详细目录,包含了所有非技术性论文中一般容易想到的主题,并将每个主题与 102 个思想中大写的 I 的思想索引部分联系起来。然而,对于辛托皮孔的做法,在学术上还存在许多争议,其虚张声势的做法令人可笑,肯定会招致中途岛路对面的学者愤怒的蔑视。

在这项计划整整 9 年的酝酿过程中,本顿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止境的其他各种大型活动中。他是贸易部组建的战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席——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宣传国家战后在转向民用生产和分配的过渡时期的商业需求和机会;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旅途上,很少

关心名著工程的进展。赫钦斯也忙于大学战时的发展,除了劝说匹兹堡梅隆公司的保罗·梅隆(Paul Mellons)的旧领地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为公共图书馆购置1600套名著丛书,基本上无暇顾及这份工作。由阿德勒执笔、赫钦斯和阿德勒共同署名的一封求助信带来了500份订单,每份订单价值500美元,包括一套特制的皮质封面的名著丛书,共54卷。

整个工作,包括财务和销售,都由阿德勒负责。当本顿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员工由于索引部每月26000美元的薪水开支没有着落而消极犹豫时,阿德勒厚着脸皮在全国各地到处游说,积极寻求资金,并成功地说服了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康拉德·希尔顿(Conrad Hilton)、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主席哈罗德·H·斯威夫特(Harold H. Swift)等人,但得克萨斯的H·L·亨特对此却不那么认同(他问董事会主席伍德·西尔斯,阿德勒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也被列为丛书的作者之一)。

辛托皮孔最终完成了,其摇摆不定的工作人员被遣散,索引部也被撤消。1952年4月15日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举行的丛书首发晚餐会上——招待每人花费500美元订购了特制版的500名读者——“西方名著丛书”终于与大家见面,凡德比尔特斯(Vanderbilts)和洛克菲勒家族也出席了这次晚餐会。

在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名著丛书卖出了近100万册,早期最高的单季销量达到了49000册,有两三年时间它的实际销量超过了《不列颠百科全书》本身。但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费用猛涨,这个项目的利润也被蒸发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因而致富。

作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三分之二股权的受益人,通过可耻的出版许可交易,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巨额财富。1943至1980年间,它的版税收入就高达6000万美元;而威廉·本顿,芝加哥大学威廉·本顿奖(他鼓励设立的)的第一个获得者,成了机构的最大的受益人,甚至超过该机构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同时变得富有(尽管还不够)的还有公司的哲学家和做事的天才莫蒂默·阿德勒,他在《不列颠百科全书》250万美元的总投资中花费了100万用于“西方名著丛书”,阿德勒后来伤心地证实了他在这个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件中卑躬屈膝的经历:

“有时候,我以为为丛书和辛托皮孔所做的工作会带来回报,它可以使我和我的家庭在今后的岁月里衣食无忧。在热情慷慨的时候,比尔·本顿曾提到版税报酬,即使它低于书价的1%,也会在过去的25年里累积成一笔可观的财富。在几个场合我曾向他提醒过他说过的话,结果只是知道了一时的言论与严肃的诺言是不同的。9年的丛书和辛托皮孔工作最后又回到了起点——一项爱心工作。”

爱心工作当然不会引起主编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的注意(他总是将自己的额外收入赠给芝加哥大学)。他对这项事业的贡献只是零星的和附带性的,在每个方面都是由阿德勒出面代劳。当54卷的丛书真正问世的时候,其中的第一卷比较薄,题为《伟大的对话》(*The Great Conversation*),是赫钦斯所作的一篇介绍性文章,里面充斥着赫钦斯早期作品中拼接而成的内容,显然是由一个无聊的人代笔的,也许这是在赫钦斯多产的生涯中第一次将名字签到其他人的作品上。他没有时间,当他的同伴盘算着出版历代的智慧这个有利可图的事情

时,他正在经营一个战时的工厂。战争还在继续,他在尽全力协助进行战争的调查,尽管历代的智慧告诉我们,同样的学习是不可能同时赢得战争和智慧的。在战争开始时,他说:“提供自由教育不是武装力量的责任。对陆军和海军所开展的任何培训计划的考验是这是否培养一个人去打仗,而不是是否培养一个人成为自由人。”<sup>①</sup>

## 吃饭,雪莉

在战争开始之前,赫钦斯就意识到他必须停止为新生开设荣誉学位课程,尽管他和阿德勒一起开设这门课程已有十年。他再也没有接近过年轻一代——再也没有拥有过美好的时光。他不认为年轻一代是世界的希望,而是有待扑灭的一堆燃烧的木头。当他难得有机会在教室外面看到他们时——有一次,为了他所说的“澄清我不再存在的谣言”,他去校园为一次会议致辞——他又恢复了活力。

1942年,在洛克菲勒教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500名学生从校长手中接过了他们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当叫到威尔伯·杰格(Wilbur Jerger)的名字时,身穿制服的杰格上前去领他的法学学位。他是赫钦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最喜欢争辩的学生之一。当他伸手去拿学位证书时,校长却拽着

---

<sup>①</sup> 赫钦斯:“自由教育导引”,芝加哥大学圆桌广播讨论,全国广播公司,1943年3月21日。

证书不放,于是杰格说“给我”,并用力来夺。这时赫钦斯说:“你要这个干什么,无论你去哪里,你都用不着它的。”杰格回答说:“给我,这是我挣来的。”“是吗?”赫钦斯边说边松开了手。杰格踉跄地后退时撞到了国旗,国旗在三脚架上摇摇欲坠,整个教堂为之哗然。所有当时在场的人和杰格一样,都能在40年之后回忆起这件事。克拉丽莎·赫钦斯·布朗森(Clarissa Hutchins Bronson)律师仍能回忆起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情形及毕业典礼主持人的开场白:“我从充满茉莉花香的圣巴巴拉来到这里,因为我想在我的女儿不会打断我的时候与她谈话。”

年复一年,他筋疲力尽地送走毕业生;年复一年,他又不那么热情地迎来新生:“请注意这样一个你们可能忽略的事实:这是一所教育机构。”在各学院和研究生院的院长就“这些神圣的大学殿堂”大发宏论之后,他站起身来告诫那些困惑的新生,“我希望你们不要玷污这神圣的大学殿堂”,然后坐下。

在赫钦斯的荣誉学位课中,有个聪明的新生一度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但当赫钦斯说:“你已经为我们作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演说,你能否告诉我们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没有在胁迫你,史密斯先生。”他呆住了。

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不会对赫钦斯清高傲慢和后青春期的莽撞并存的个性感到畏惧。他和他们一样,爱开玩笑和搞恶作剧。“如果在本课的期末考试中我问你们,在一个荒岛上如果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童子军手册》可供你选择,你要哪一本?为什么你选择《政治学》?”他藐视他们藐视的东西,重视他们重视的东西,一心想促使他们走(他引用了沃德罗·威尔逊的话)“尽可能不同于他们父辈”的路。

赫钦斯和他们平等交流,努力教会他们开展严肃的辩论,用实例证明特别的言论和行为。一位院长——不是赫钦斯任命的——在全国性的一次反赤化运动中命令一个共产主义小团体退出校园,主要是出于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即该团体没有达到最低的大学社团成员的要求;但赫钦斯武断地恢复了这个组织。他以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即规范的和“公正的”。他貌似冷静,但内心却非常关心个人和社会的痛苦,对此年轻人知道,也感受得到,他们知道这所大学是复杂的。

“情况就是这样”,48届校友、曾任美国总检察长的鲍伯·博克(Bob Bork)说,“在寝室里,大家一直在闲聊,但我记不起有任何一次是有关女孩子、性和运动的。当然其中有人追女孩子,有人喝酒,但谈话是严肃的。在学生身上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思想是非常严肃的,这些思想可能对日后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这取决于你如何迅速地推销你的想法。这种生活容易使你更加排斥他人,当你认为他们的想法不如你自己的时候。”<sup>①</sup>

41届校友、伊利诺斯大学教授伯纳德·R·科根(Bernard R. Kogan)说:“大学里的气氛是狂热的,学生们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弗洛伊德和荣格展开了无休止的、激烈的辩论,赫钦斯和他的观点也得到了自由和详尽的讨论。人们的表达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也是赫钦斯计划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sup>①</sup> 引自唐·赛德:“米德威和波托曼克”,《芝加哥大学杂志》,1976年夏季版,第13页。

为了激发学生的生活热情,大学在较短或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连续将一批资深的和非资深的学者请到校园,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阿特·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托马斯·曼(Thomas Mann)、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亚历山大·沃尔考特(Alexander Woolcott)、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和共产主义者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赫钦斯总是在四处寻找令人激动的教学人才,他从意大利请来G·A·伯杰斯(G. A. Borgese),从德国请来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从前捷克斯洛伐克请来了流亡总统艾杜亚德·贝尼斯(Eduard Benes)。他极力让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Conant)离开哈佛来芝加哥大学掌管自然科学。他要求格特鲁德·斯特恩(Gertrude Stein)遵守承诺回校接手新生的荣誉学位班。斯特恩回忆说:“接着我就与他们讨论接手他们班的问题,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我开始讲话,赫钦斯和阿德勒之外的其他人也开始讲话。不久,我们都开始谈论什么是史诗。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有了很多的发现,其中有一些内容被我在我回校开课准备的四个讲座中的其中一个讲座上……聚会结束后,他们非常高兴,我也一样。在路上,赫钦斯对我说,你使他们都变得更加健谈了,许多以前从不发言的人现在也发言了,他们能谈这些真是太好了……接着我说,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和我说话,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赫钦斯说,你说你不知道答案,事实上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答案,那你就不会毕生从事教学工作了。我接着说,但是我确实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某个问题,更不要说它的答案了。对我而言,真正有趣的事就是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若有的话,

那就不有趣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事情如果有了答案就没有意思,这就是政府、乌托邦和教学的麻烦所在。那些不能学只能教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无论如何我们只有逃避。”<sup>①</sup>

这是整个学校甚至一些研究生部门如法学院的想法。《马龙日报》(*Daily Maroon*)也许是全国惟一的一份每天在头版讨论课程设置问题的学生报纸。詹姆士·雷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副教授(54届文学士)在20年后回忆说:“我惟一一次参加学生示威活动是为了学院的课程,这是我们那段时间在芝加哥大学所极力抗争的东西,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地活跃。”

一群学生多年维持着一个“阿奎那之家”,其中心任务是在托马斯·阿奎那和卡尔·马克思之间作理智的调和。(这项通常属于天主教的工作引发了一种恶作剧般的谣传,即芝加哥大学是“一个浸礼教的机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在那里为犹太学生开设天主教哲学课”)。对半数学生而言,芝加哥大学是大城市里的一所“有轨电车学校”。在赫钦斯时期,它以对宗教(和种族)的宽容著称。它的入学要求非常严格,入学新生的平均成绩超过了90分。大部分本科生是不分学院的,他们大力支持赫钦斯取消劳民伤财的足球运动,约65%的学生在校园内外兼职,这不是什么苦差事,而是令人激动的工作。

雪莉·夏皮罗(Shirley Shapiro)是一个坐有轨电车上学的孩子,居住在西郊犹太区的父母不想送她上大学接受他们从

---

<sup>①</sup> 施泰因:《每个人的自传》,第212—213页。



来没有接受过的高等教育。夏皮罗夫妇是犹太移民,他们话语不多,更多的是唉声叹气。但是他们的雪莉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周二下午赫钦斯和阿德勒的荣誉学位课程结束后,回家途中她还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事情的四个起因(首要的、正式的、有效的和最终的)、主权的可分割性(一个世界或没有)、激情的本质(巨石觊觎成为地球的中心),以至于她有时会忘记换乘有轨电车。最后她会蹦蹦跳跳地沿着楼梯跑上他们位于夏皮罗裁缝店楼上的小房间,与父母分享她刚刚出炉的观点。她到家的时候,父母肯定已经吃好了晚饭,但是他们仍然坐在饭桌旁等她。她吻过父亲——她的母亲听到她上楼的声音,就去厨房为她热汤——开始谈起一段趣事。当母亲送来汤时,雪莉亲吻了母亲,然后继续说那段趣事。她的一个朋友曾问雪莉:“你的父母都跟你说些什么?”雪莉回答道:“他们总是说,‘吃饭,雪莉’。”

赫钦斯在 25 年之后说,“整个大学教育可以概括为这个机构有活力吗?有在做任何事吗?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吗?只有年轻人知道。他们知道某位老师是否只是在赚取一份工资,他们知道他是否将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或是努力为他们的教育作出贡献。在芝加哥大学,学生的确意识到,我们正在努力为他们的教育做些什么,正在为一个基本的问题而努力奋斗。”

“这种意识弥漫了整个校园,每个人,甚至是刚入学的新生都参与其中。我认为最近高等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正处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学生骚乱时期——“的原因是学生觉得尽管他们是立法的正当性和学费的主要来源,而大学并非是为他们而存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和董事会并不重视

为他们服务。我不认为芝加哥大学学生的态度与我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当时在美国没有其他地方你可以得到同样的教育经验。”<sup>①</sup>

年轻的教师决定课程内容的编排。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的《自由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一书中指出:“既然学院庞大的教师队伍使不同背景和训练的人聚集在一起,正如我的个人经验所证明的,课程对于教师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智力冒险;也许这是一种意外的奖励和好处,因为教师可以将自己的一些令人激动的发现与学生进行最好的交流,至于最后课程是否具备应有的理智上的协调性或理论上的清晰性,尚有待讨论。”<sup>②</sup>

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种智力的冒险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搁置。但是赫钦斯在放弃新生的荣誉学位课程之后越来越喜欢开玩笑。他的性格决定了,在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之外,他需要另一种战争。1944年初发生的事件促使他领导了一场通向胜利的运动,他赢得了57街大战的胜利。

这次大战发生在校园乔治亚大楼的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它是一个教师组织,不用向大学交纳租金,可以免费使用大学的设施,但它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多达四分之一的成员是邻近地区与大学无关的人士(多数是大学的校友)。有一半教师——大部分资深教授——通常在那里吃午饭,不

① 赫钦斯:“与凯利的谈话”,第21—22页。

② 丹尼尔·贝尔:《普通教育的改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页。

管是不是本校教师都可以使用那里的网球场、图书馆、台球室和棋牌室,私人餐厅供教师委员会开会和午餐使用。该俱乐部是办公室外的一个休闲之处,总之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1943年,一个曾担任过俱乐部领班的名叫戈登·杜皮(Gordon Dupee)的高个子年轻人辞去了这里的工作,转到大学的广播室任职。杜皮没有参军,他有一个极力想对征兵委员会隐瞒但没有成功的心病——他出于道德原因拒绝服兵役,并且希望别人也这样看他。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在校园和教师中间是清楚的,这并不是他在俱乐部里受到排挤的全部原因。作为一名学生雇员,人们并不希望他唯唯诺诺,而是希望他能给人一些尊重。但是杜皮——你爸爸不能用手指着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处世方式非常强硬和冷漠,令人讨厌。现在,作为一名新的大学雇员,他有资格成为俱乐部的会员。他申请了,但遭到了拒绝。

杜皮被拒绝的消息在俱乐部和校园里很快传开了。到处有年轻人(很少有年长的人)出于良知或至少是学术自由的原则对他表示同情。杜皮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所持的悲观态度,使人们想起了赫钦斯对未来的世界大战的悲观情绪。当然方庭俱乐部是一个社交俱乐部,不过它是一个教师的俱乐部,大学里惟一的教师俱乐部。但全体俱乐部成员都不知道俱乐部有投票否决的权力,一般以为只要教职工提出申请,就一定会被接受,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

杜皮的人会申请是由社会科学学院的执行院长拉尔夫·W·泰勒(Ralph W. Tyler)和教育学教授斯蒂芬·N·科雷(Stephen N. Corey)提交的。他的名字在俱乐部的告示板上公示了两个星期之后,交由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后来的结

果是 5 票对 1 票,反对他加入俱乐部。6 位会员集体拜访赫钦斯,向他请教应该对方庭俱乐部采取什么行动。赫钦斯指出他们的来访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他说他已经写信给俱乐部主席汤姆·皮特·克罗斯(Tom Peete Cross)教授,询问是否杜皮被拒绝是因为他是一名反战主义者。克罗斯教授回答说:“这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原因。”随后,赫钦斯又写信给克罗斯,说他刚刚听说俱乐部只是在 3 年前才开始实行投票否决制度,当时赫钦斯任命的一位叫阿里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的黑人教育学教授提出过入会申请,但随后就撤回了他的申请。他还说他刚刚听说物理学教授亨利·戈登·盖尔(Henry Gordon Gale)特别回来要求退出俱乐部,因为著名的印度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Chandrasekar)加入了俱乐部。他说他又听说方庭俱乐部不接纳女会员。他还说随着这些情况的曝光,他认为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士只能要么选择战斗,并赢得胜利;要么选择战斗,失败了,然后离开。

“我是方庭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因为在那里,我和我的同事能够很方便地见面并处理大学的事务。我不是出于信念加入俱乐部,我也不会出于信念退出俱乐部。然而,如果我的任何同事因为信念退出使我不能在俱乐部里与他们见面共同处理大学的事务,那么我就不得不另觅地方,你们听懂了吗?”

他们认为他是这样做的。他们问他,有多少他的同事退出他就不会加入俱乐部。他请他们看看圣经《创世纪》的第 18 章(只要那里有 10 位正义之士,上帝也会宽恕所多玛<sup>①</sup>)。

于是,7 位正义之士动员反对的力量,要求召开会员大会

---

<sup>①</sup> 所多玛(Sodom),罪恶之地,源自基督教《圣经》。——译者注

重新审查俱乐部的规章制度。1945年6月11日晚,500名会员中有300名会员参加了这次封闭性的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关于拒绝那名黑人教授入会的问题,有人心平气和地指出是因为他自己撤回了申请。拒绝女会员的问题——那里总是有许多女教师——则没有受到挑战。那个“纯粹出于个人原因”的事件被判定为违反规则。一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说,反对派的头目是赫钦斯的一个朋友,他们都有午餐时在自助餐台上拿两份甜点的习惯。但是辩护的重点在于,该俱乐部属于社交性质,它对会员有惟一的裁决权。据说最终的投票结果是182比85,继续维持俱乐部现有的规章制度。

《芝加哥太阳报》引用未透露姓名的教师的话说,整个事件“由于支持和反对赫钦斯校长的观点激烈交锋而变得非常混乱”。无论在六月会议期间或是会后,人们都没有就“赫钦斯问题”发表评论,但《芝加哥太阳报》对此作了正确的报道。

10位正义之士(有一半与大学无关)立刻宣布退出。第二天,赫钦斯就没有出现在俱乐部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因为他的一些同事不是俱乐部会员。这个会议以及后来每次类似的会议被移至最近的宾馆举行,与会者只有通过统一坐车才能从校园到达会议地点(赫钦斯有穿着特殊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专车)。滴水可以穿石,但是这仅仅是一滴水。汹涌的大水不是来自于10位正义之士,而是来自于那些对不会参加俱乐部的校长推崇有加的学生们。

就在会员大会的第二天,17位俱乐部的学生雇员举行了罢工,反对他们所称的“对教职工的种族、性别和政治信仰的歧视”。他们举行了一场学生大会并邀请俱乐部的官员参加(但他们没有人参加)。大会通报了前一天晚上俱乐部会员大

会的结果——那次会议的记录被当时参加会议的罢工者完全泄露出来。随后他们在俱乐部前设立了纠察线,50名学生举着诸如“看看谁编写了我们的教科书”之类的标语。当赫钦斯的专车驶过这条纠察线时,他不屑于抬头看一眼。

三个月后,一群教师“出于教育和专业方面的目的”,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俱乐部,“使每个大学的成员都能加入进来,不管他的经济能力、肤色、宗教、种族和观点”。它将取名为“教师俱乐部”,并向大学行政当局申请支持。大学行政当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公务专车继续在一旁驶过,车后跟着想见校长的教师委员会成员。三个月还是太长了,方庭俱乐部召开了另一次会员大会,讨论放宽入会政策,确定以俱乐部理事会多数决定的方式招纳新会员(反对杜皮入会的是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样,投票否决的程序得到了修正,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大学行政当局仍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但是来俱乐部的教师越来越少,而要求退会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要招学生来帮助工作也越来越难。

1946年3月,陷入困境的大学方庭俱乐部又有一批新的官员去拜访赫钦斯。他们告诉他,俱乐部遇到了一些困难,赫钦斯表达了他的遗憾。大学行政当局会考虑提供财政上的帮助吗?赫钦斯说很乐意,并将他们介绍给副校长W·C·芒内克(W. C. Munnecke)。经过五分钟的协商,芒内克先生告诉俱乐部,如果俱乐部向包括低收入成员在内的所有教职工开放,学校将很乐意恢复对俱乐部的财政资助。

这是方庭俱乐部的卡诺萨<sup>①</sup>,是校长默许和学生反对的结果。罢工的学生们知道校长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他经过纠察线时不愿意抬头看他们一眼。这就是赫钦斯的自娱方式,仅仅是偶尔再次与年轻人疯狂一次。

方庭俱乐部事件使所有赫钦斯教过的——以及所有他没有教过的——新生又可以为赫钦斯传奇的一生增添新的篇章,描写他的神奇不需要许多神奇的故事,任何细小的事情就足够了。

一天下午,赫钦斯在回家的路上——校长办公室和他的住所间哈珀图书馆附近的街区——遇见一小群学生在人行道上为他让路。当他走近他们时,他们不声不响地偷偷看着他。当他走过他们身边,看也不看地对他们说:“当校长经过时,请脱下你们的帽子。”第二天,这个故事就在校园里传开了,并一直流传了很长的时间。

很久以后,小说家诺埃尔·格尔森(Noel Gerson)在纽约的“21”吃午饭,芝加哥大学年轻人的偶像也在那里,“赫钦斯和许多人一起站在吧台边,他的外表和举止像一个普通人,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个伟大的希腊之神。我第一次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人高大的人。使我诧异的是,人们进进出出,几乎都没有看到他”。

被他带上生活之路的学生给他带来了活力。当他决定放弃教学工作的时候,他预感到他再也不会给年轻人上课了。但是,57街大战又使他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重操旧业,但仅

---

<sup>①</sup> 卡诺萨(Canossa),意大利北部一城堡。根据历史典故,德皇亨利四世1077年被迫去卡诺萨向教皇格雷高里七世忏悔认错。——译者注

仅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他曾说当他沮丧和愤怒的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在芝加哥当校长的那段时光。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战争当中。在长达3个月的悲惨时期,他很少说话,他的敌人也得意地认为他不会再有什么举动。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他发现可怕的预想都变成了现实,胜利在成功之前就已成泡影;随着战争的继续,他的行政工作离自由教育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是与军事有关;随着战争的继续,他的工作与培养自由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关系,越来越多的是培养他们去战斗。他变得越来越愤怒了。

## 扰乱战争

1938年,赫钦斯强烈谴责了芝加哥大学混乱和无效的行政机构,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校长。根据大学的规章,校长既无权力又无责任,没有人有过先例。在芝加哥大学(其他地方也一样)没有人会问:“我们正在努力做什么?”

他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是在1938年的大学评议会的一次投票后表明的。鉴于地区大学教授联合会抱怨赫钦斯和他的院长们在人事任命、职位升迁和教师工资方面权力过大,当时200名大学评议会成员中的76人以42票对34票表决通过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该联合会要求被调查者领导调查委员会,但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应。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指出,大多数教师“认为他有无尽的权力欲望”<sup>①</sup>。

自那时起,校长的权力问题一直温而不火,尽管他时常说他仍然关心这个问题。然而在战争的年代,任何有关大学长远发展的激进想法显然都不会得到推动。直到1942年7月中旬,赫钦斯才向大学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6页的备忘录——他没有将它提交给教职工,而是董事会,建议修改大学的章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sup>②</sup>。

他的目标是彻底改革大学的组织机构。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模糊学院的界限,有得也有失,他正在努力作最后一搏。修改大学的章程是董事会的职责,他放下架子——根据规章他不需要——建议董事会将他的建议转交给教师评议会,并要求教师评议会任命一个委员会与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协商此事(董事会这么做了;评议会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但两年后他无奈地发现什么都没有做)。

赫钦斯的建议用另外一种方式正式被提了出来。现代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结构由于承袭(仅有小的变化)19世纪的小规模的学院而变得“混乱而低效”。“如果民主的管理需要责任,那么大学的管理是不民主的,因为没有—一个学者对他在大学管理中的行为负责……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章程,教育政策由系科决定……但是校长可以拒绝任命或提拔系科的成员——并根据大学的财政状况决定学校活动的范围和种类。”

---

① 《新闻周刊》,1938年6月20日。

② 赫钦斯:“在校董和教职工晚宴上的讲话”,南海岸乡村俱乐部,1944年1月12日,载《芝加哥大学杂志》1944年第4期。

因此,系科“只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不是限制校长的这些营造一种教育氛围的权力,如果系科有机会投票,他们是永远不会赞同校长的这种权力的。尽管他们参与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选举,但在他上任之后,他们就拿他没办法了”。另一方面,“系科在教育上的权力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对教育负责。系科的权力使校长不能对系科的行为负责。系科也一样,不能因为系科的成员不能正确认识本职工作,或是由于专注于一项局部工作而拒绝接纳整体工作的改进建议而将他们遣散”。

是否可能做一些根本性的工作?是否可能使芝加哥大学变得有序和民主?赫钦斯认为是可能的——有两个办法。计划1:“放弃将责任和效率作为大学管理的标准”。我们只能说这些观念并不适合大学,我们应该坚信对大学而言有其他更重要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会随着学者社区即大学的自治而日益显现。根据这一理论,大学的所有事务,包括开支、公共关系、设备、教育和科研项目,都应由系科控制。在这个计划中,校长将是系科的主席,仅仅是活动的主持者,并在公共活动中代表大学;与德国大学的校长一样,任期只有一年,没有权力不承担教育方面的工作,并享受未必可能的“校长阁下”的称呼。但是采用这种模式的德国和其他欧洲大学最终是对政府部门负责。

在接下来两年的争论中,赫钦斯继续倡导将计划1作为一种选择——“它比我们现在在运作的制度优越”。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中是不诚实的,不仅支持这样一种“民主”结构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哲学,而且芝加哥或其他任何大学的系科也不会接受计划1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赫钦斯在他提交给董事会

的备忘录中尽量缩短这项计划的篇幅：“美国的教授所具有的知识背景、所接受的培训和他们的职责决定了，不能过多地指望他们能从大学整体利益出发去管理整个大学的事务。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或希望他们成为某个特殊领域的专家，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成为他们各自领域的专家。特殊领域著名专家的投票不一定就是对大学整体政策的最佳判断。”

他在这里并没有侮辱别人的意思，不过也是意有所指的（正如他在备忘录的其他地方所说的）。这就是，“校长的惟一责任是对整个大学负责，而不是对系科负责。大学庞大的规模和学术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一个教授几乎不可能了解他所在学科或大学的全部工作。”

由于遇到他所描述的那种“致命的反对”（尽管他还坚持该计划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赫钦斯放弃了计划 1。出于上面的考虑，他又提出计划 2，它是“一个行政责任的简明计划”。这个计划将意味着，只要校长得到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的信任，就会被授权制定教育政策。除了参与校长选举，评议会可以在任何时候对校长提出不信任案，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还可以迫使校长下台。

“如果不征求评议会及重组的评议会政策委员的意见，校长是不可能开展工作的。但是当他听取——或者像他的反对者们所说的假装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就必须作出决定，并为此承担后果。少数评议会成员可以因此向董事会要求校长辞职、强迫校长辞职（董事会可能接受，可能不接受）或强迫撤消校长职务。既然由于惰性和怯懦，系科不会采用这些方法表达他们对校长的不信任，校长应该每 7 年选举一次（许多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这些变革将使系科有了免受校长损害的保护伞,而这种保护伞现在并不存在。这些变革将确保系科对大学所有事务的意见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并促使校长对系科负责,对董事会负起实际和理论上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些变革还将给得到系科信任的校长一个做事的机会。”

一个做事的机会。直到那时,由于大多数系科、少数受到多数人纵容的活跃分子以及董事会中多数成员的牵制,赫钦斯一直没有得到做“事”的机会。董事会是合法的大学拥有者,赫钦斯只有说服的权力。在备忘录的结尾,赫钦斯对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包括在芝加哥大学当前的形势下不太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即校长会极力避免四处树敌,或不去做任何事,以免在7年后新的一次校长选举中落败。备忘录的结尾指出,如果计划2——或者假设计划1——被采纳,他和他的院长们将提交辞呈,以便根据新的规章产生新的大学管理人员。

他想得到什么呢?他想得到巨大的权力——同时又有巨大的责任。他认为责任的最坏结果是自己被解职;而权力的最坏结果是在自己被赶下台之前,他一系列欺骗性的和不合理的管理行为可能对大学产生了伤害甚至是破坏。至少他的反对者们是这么想的。根据12年来的经验,他们认为如果赫钦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就会推行比已有的措施更为激进的改革。曾几何时,当他第一次控制了自己的学院,他曾说——他的敌人也一直记得——“现在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去教错误的事情”。而他的系科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

一个更为温和的人,或者没有私心的强人会得到他的系

科对计划 2 的某些支持,也会得到董事会中了解责任与风险、权力与机会含义的商界成员的大力支持。赫钦斯本人就是这样,因为当时他还有比较高的热情,而他的反对者也不那么强硬。但 1942 年之后,赫钦斯就变了个人,这点他自己也很难理解。他是一个痛苦的现实主义者。他寻求的是仁慈的专制主义和负责的独裁的结合,就信任投票而言,就像议会的首相,不受他领导的党派的约束。他将是无党派的独立人士。董事会——他在那里有很强的游说力——可以拒绝接受他的辞呈,就像在内阁制的国家,君主有时会这么做。他的一个朋友说赫钦斯想成为一名本笃会教派修道院的院长,其工作需要与修道士们协商,但不需要他们的批准。

没有人会祈祷他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赫钦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董事会也一样,包括莱尔德·贝尔(Laird Bell),他也许是董事会中最有势力的人。贝尔不仅是赫钦斯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他的私人律师。作为董事会教学和科研委员会主席,贝尔对赫钦斯的备忘录作出了回应,不过是非正式的回应(这是他的习惯)。

校长日怎么会行得通呢——不管这个锡拉丘兹的老顽固是谁?

如果系科连一定程度的自治都享受不到,你能得到和留住最出色的教师吗?

系科会认为他们有机会让你接受你所任命的院长的辞呈吗?

系科是否不会相信……如果没有确实的丑闻,董事会一定会支持你?

你不会去煽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激进分子吗?

有没有不那么激进的方式,表明你并非想要“独裁”权力?

我承认这份不太确定的权威蓝图存在缺陷,需要检验和修正,上天保佑!最终你已经从董事会得到大多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我看来,对教育和教育者的所有判断都是主观的。这些事情可以由一个人判断吗?

最终你已经得到大多数你想得到的东西。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你将不再会得到这些东西,或者你将不会得到更多。这是赫钦斯所遇到的最严厉的官方指责,而且这一指责来自他的一个朋友。如果贝尔对计划2不表认同——计划1甚至不在讨论范围——那么整个董事会肯定也不会认同,但是贝尔和董事会知道赫钦斯骑虎难下。赫钦斯认为自己的行政生涯充满了无耻的妥协,为了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教学,他容忍了“错误的内容”;人文学科和名著在本科生的课程中实际上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组织机构的划分和学院的自治,但是大学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他利用战争的非常时刻设立了“两年制”的学士学位(当战争结束时,这种学位也许会被取消)。他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如取消了院校足球联赛,将拉什医学院从芝加哥大学分离出去,将芝加哥大学的医学院并入新的生命科学学院。但是12年过去了,他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为高等教育的重建作出表率。也许在珍珠港事件后,他打算收敛自己的锋芒,像别人一样成为一个斯文的管理者——这也是战时政府所需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他曾经说过,在他的印象中,他的祖先大体上都是性格倔强的人,因此他们的后代大体上

也一样。

赫钦斯(1942年7月18日)的备忘录被列为机密文件,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董事会成员在系科有亲密的朋友,即使像贝尔这样特别能干的人,而且还是最忙碌的律师,也不可能在回应赫钦斯之前不去征求系科朋友的意见。根据系科中一些资深教师有带着某些“赫钦斯问题”直接找到董事会成员的习惯,尽管其中有些人会有一些影响力,但是这样做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事实通常是这样);大学董事会的成员一般是各自领域的管理者,他们更喜欢与能干的管理者共事,而不是与教授们打交道。赫钦斯的备忘录上交之后,董事会在长达六个月的的时间里保持沉默。在十二月底,董事会给学科评议会发去了一封信,介绍了赫钦斯的主张,并建议评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贝尔的教学和科研委员会一起对此进行讨论。

于是评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当然是由教授组成,因为只有具有教授职称的人才资格成为评议会成员。如果认为这些人会作出什么决定,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赫钦斯计划2中的建议之一是大幅削减评议会的规模,以提高办事效率,评议会的成员资格应该按比例对各种职称教师开放(记住,他的支持者主要是低职位的教师)。两个委员会举行过好几次联席会议,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943年3月10日,赫钦斯进行了最后的尝试,他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没有被列为机密文件——煞费苦心重申了他的建议,并且指出计划1“不甚完善”而不应再予以考虑。接着在谈到计划2时,他说:“我个人并没有卷入此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所著名大学适当的

行政结构,而不是赫钦斯先生应该有多少权力。大学应该尽可能按照最佳的方式组织起来,然后再去寻求这种组织架构最佳的执行者。”

他强作镇定,又提出了一个显然属于比较狡诈的观点:“当前的大学组织结构已经崩溃,并正在导致校长的独裁。”——狼在叫“狼来了,狼来了”——校长不与系科协商,通常也不与董事会协商,就独自对重要的教育问题作出决定,因为快速和保密方面的考虑使协商变得不可能。我不相信这种情况在战后会得到实际的改变。政府在战后重建时期会利用大学的力量,就像它在战争的非常时刻开始后一直所做的那样。芝加哥大学现在的校长是个善良的人;但是我认为,不论多么仁慈的人,都不应该在不具备计划 2 提出的检查和保证措施的情况下,被允许对重大的教育问题作出决策(当然,战时的决策需要快速和保密,它和重大的教育问题没有关系,仅仅是临时性的)。

计划 2 无人祈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淡出人们的视线。1944 年初,饱尝了失败和愤怒的赫钦斯决定放下他那支变钝的长矛,力图东山再起。

## 大 炮

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九三年》(*Ninety-Three*)中有这样的描述:“在一艘全速航行的法国护卫船上,一门大炮从炮台上挣脱出来,突然变成某种超级怪物,它左右翻



滚,上下跳动,前后徘徊,然后稍静片刻,似乎若有所思。恢复原来位置后,又像一支利箭,从船的一端冲向另一端,在空中盘旋,在一边跳跃、闪躲、咆哮、破坏、杀人、灭绝……我们怎样才能应付这个怪物呢?你可以驯服一条烈犬,惊吓一头公牛,刺激一条蟒蛇,恐吓一只老虎,甚至使雄狮变得温顺,但是对这个怪物却无能为力,任凭它大发淫威,不断破坏这条船。”<sup>①</sup>(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主席哈罗德·斯威夫特在1944年写给牢骚满腹的校友们的信中说:“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学校董事的责任。我们正在拼命地为大学工作,为大学的持续发展兢兢业业。我相信我们不会毁灭大学——也不会让它受到毁灭……我不能肯定我能对你说那么多令人信服的话。一般而言,人们或许喜欢赫钦斯的教育哲学,或许不喜欢……我太了解赫钦斯先生了,当他有强烈的观点时,我相信他的愿望是使大学在每个方面都尽可能强大。至于说他在牺牲大学的下属任何部门,我还看不出一点迹象。”)

在1944年1月12日一个短暂的冬日傍晚,南海岸乡村俱乐部(South Shore Country Club)显得金碧辉煌。大学一年一次的联欢晚会在此召开,俱乐部的大舞厅总是在此时被租用。大学董事会正在招待学校教职工。旁边的酒吧里摆着上乘的自助酒水,主食是钱(或配给票)所能买到的最上乘的牛排。董事会主席斯威夫特通常主持这个由大学董事会主办的招待会,并向大学介绍晚会的发言人,他通常是大学的校长。当介绍大学校长时,教职工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校长的

---

<sup>①</sup>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约翰·格兰特出版公司,1903年版,第54—59页。

发言结束时,教职工们并不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校长的发言有时会令人感到困惑。的确,校长习惯于将宴会变成激烈攻击别人的舞台,因为他认为,当他将攻击的目标对准学校评议会时,他的听众不会对此感到吃惊。

当晚人们也没有料到会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情。校园的论战工厂正在每个方面顺利和成功地运行着,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赫钦斯说什么,他都说得简洁机智。在这个盛大的晚会,赫钦斯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欢乐,大家根本没有理由进行任何的批评。

赫钦斯足足给大家带来了五分钟的欢乐。我们注意到,他是第15次参加这种年度庆典,而且他把自己比做旗手,不在于他曾经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长期坚持做一件事。然后,他通常会自嘲说:“实际的情况是,在一所大学当了15年校长后,他会失去知识,同时失去健康、头发、牙齿、胃口、性格、身材和朋友,所有这一切令人伤感。今晚,在15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之后,我仅想谈谈我的一个观点,非常小的一个观点。”<sup>①</sup>

然后,他突然停止搞笑了:“我想说的这个小的观点是,过去15年来我在这里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做了一些顺水推舟的事情,因为其中有些事情非常大,也是老问题,因此,不做这些事情已引发巨大的反响……我们抛弃学术上最为陈腐的和不相干的东西,取消学院之间的足球赛,并对封杀这个庞然大物沾沾自喜,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在我推倒它之前就死了。尽管15年来没有人敢对教育中的学分制度或加分制(adding

---

<sup>①</sup> 赫钦斯,“在校董和教职工晚宴上的讲话”,南海岸乡村俱乐部,1944年1月12日,载《芝加哥大学杂志》1944年第4期。

machine)说句好话,我们认为我们还是率先采取了行动,作出一些尝试来取消这些制度。大学系科体系过于臃肿,已招致一代人的口诛笔伐,我们为此在1930年的重组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且取得了以前无可比拟的成功。我们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35年当学术自由受到攻击时,我们曾捍卫过它,对此我们没有多少可以自豪。至于最近我们采取的那个‘令人激动的行动’,即在传统的大二结束后颁发学士文凭,30年前就有一个先辈在倡导了。

“那么,芝加哥大学在开拓教育与科研的前沿方面的崇高声望来自何处?它主要是来自美国教育的可怕状况。对于一只乌龟来说,如果它在全速地向前爬行,对于静止不动的东西来说它的速度是极快的。如果静止不动的东西不再静止不动,而是开始慢慢地向山下坠落,那么这只乌龟的向上爬行速度似乎更快了。我们与其他美国教育的区别不在于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创新,而在于传统上的细小差别。其他地方的传统是承认应该做这些事情,可什么也做不了。这里的传统是,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所有有教养的人的共识是应该做些事,也许我们应为此努力一下。

“但是仅仅做一些事是不够的。学分制或‘加分制’在许多大学系科和学校中仍很流行;只有学院和社会科学系科完全废除了这种制度。课程制度由于与学分制有密切联系,情况也是这样。阅读书目、导师制、一般性的考试组成了惟一合理的教育联合体……对课程的偏爱正如对教科书的偏爱一样,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即你不能在一个美国的教育机构中进行教育活动……我们被告知,(年轻人)在教室之外不会学到任何东西,尤其不能从好的书籍中去学习。在

那些仍在阻碍我们的举手之劳中,我希望课程制度和依附于它的加分制度是首先要被废除的。”

宴会前和宴会时的欢乐已被与以往相同的责备、贬低、讥笑与苛求所取代。他的听众在观察他 15 年之后,仍低估他的沮丧与愤怒。经历了 15 年粗野的任期后,他不愿只在伤口上撒把盐;他要致力于增加新的伤口,他已开始战斗了。

“我们仍然在受到学术职位高低这一闹剧的束缚,这种学术职位除了导致教职工不断的分化和失望外别无它用。任职期限毫无意义,新的教职工在服务 10 年后便可得到永久性的职位。薪水却有点意义,我会稍后再谈。职位除了增加麻烦之外毫无用处,我们应废除它。”

“废除职位的建议步履蹒跚,人人应当得到平等的对待,学者之间这种惟一明显的区分应被废除。这就是社会主义,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人人都是博士的伟大的大学里,人人都被称为先生,没有人被称为(或自称)教授。但人人知道谁是教授——基于这个独特的事实,人人都知道谁是评议会的成员。这些头衔虽不起眼,但是却难以抹去。”

至于薪水我稍后再谈。现在晚宴的灯光全部熄灭了。职位——和薪水都重要,那些教授级的宴客们突然来了精神(大学的董事们也是如此),他们都知道曾经有句风凉话这样说道:“一个商人可以有理想,但一个教授为了金钱什么事都会干。”

现在这句话可以这样概括:“正如学术职位将导致学术界的分化,我们往往把在大学之外花费精力最多的教授看成最成功的人士,其后果也是如此。大学的教职工应该是全日制

的；他们应该得到体面的薪水；他们应该自由地参与自己喜爱的外部活动。为了确保他们喜爱的活动对他们有益，应该要求他们把他们的校外所得上交大学。（在此，专制的面纱终于被揭露了：为了确保他们喜欢的活动的确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应该要求他们……）

“我们应当通过重新考虑整个薪水问题来提高大学内部的社区精神。在一个真正的社区里，补偿的惟一尺度是需要。学术社区应谨慎地选择它的成员。当吸纳一个教师进入大学社区中时，应当付给他足够的薪水，以便使他能过上一名教授的生活。（谁能说教授应怎样生活呢？平淡又平淡，专制的面目显露出来了。）

“这意味着一个拥有三个子女的年轻人比一个没有子女的系主任所获得的生活费补贴要多。在目前的体制下，领取补贴的教师在最不需要的时候获得补贴，他们忍饥挨饿，损害自己身体和学术的发展，因为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得不到生活的依靠。”

“这些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也是举手之劳。”

在一个真正的社区里，补偿的惟一基础是需要（“在缺少这种基础的社会里也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许多人是出售土地和房产的拥有者，他们带来了出售物品的价格，在当着传道者的面将它们放弃，实行按需分配。”）——布尔什维克主义。

校长接着又谈了十或十五分钟，但他的听众们已有些心不在焉。他又提到机构的问题，（又）说所有必须要做（“该是我们作出一些行动的时候了”）的是推选一个短期的校长，要求他听取教职员工的建议，强迫他作出决定并承担后果。对于那些心不在焉的听众来说，这个校长作出的决定会沦为社会

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还有什么可说呢？“大学校长是一个没有赞助和党派的政治领导者，他两者都不该拥有。他应该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民主社会的负责的官员。”——高度紧张的民主社会。

“一个学术社区本身不是目的，学术民主也是如此，它们本身都是预备阶段。”——那目标又如何呢？

“它们都是实现大学目的的手段。”——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大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全世界道德上的、智力上的和精神上的革命……如果社会要继续发展，它赖以生存的整个价值体系要得到彻底的转变。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的学术社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了它，我们就能加强大学创造人的品格、智力和精神的力量。在为此奋斗的机构中，大学的特定任务就是发展、传播和指导人类理智……大学的全部资源必须集中在提高为之服务的社会的理智水平上面。”——整个价值体系……加强力量……人的精神……为此奋斗……失控的大炮。

“我们拥有美国惟一组织合理的学院……既然这是惟一能够做事的机构，就有责任去改革，去引导这个国家的自由教育。这要求教职工要明确什么是自由教育，自己要接受自由教育、然后再传播自由教育。”——自己要接受自由教育。

“如果我们要揭示通向全民自由教育之路，我们必须准备对将要承担这一任务的教师进行教育，为此，我们得建立一种新的机构。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高级学位，并再次考虑我们是否不该授予通过一个新的自由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Liberal Studies）准备献身教学事业的人博士学位。”

自 15 年前他发表就职演说以来,他不时呼吁为研究和教学设立单独的博士学位,他以前从没提出过要建立一种新的机构。

“总之,芝加哥大学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所大学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就连与七百年前的巴黎大学相媲美的那些大学也望尘莫及。正如巴黎大学铸造了中世纪的文明一样,希望芝加哥大学也能铸就 20 世纪的文明。这种希望也许有点过高,但它可努力一下。”

那些将要丧失头衔和工资的教师们惊恐万分,在大厅的宴会桌旁散坐在他们中间的校董事会成员们,在赫钦斯谈到把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推广到他们的合法财产和责任中去时,也惊慌不止。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了,所有参加晚宴的人都被这门活人大炮的肆意妄为所震慑了。

“我必须承认,”他吸了一口气,“我必须承认我从来不欣赏大学的校训——发展知识丰富生活。首先,让那些粗俗而天真的 19 世纪 90 年代先驱者们为他们新办的大学设计一个拉丁语口号是不适当的和不自然的;其次,‘丰富’这一词意思含糊,我不喜欢对它作物质主义的解释。因此,我为大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校训,它将表达大学在引导人类和平共存所需要的革命时所体现的精神和目的。我提出的新的大学校训出自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一句话,就是:‘我独自在西边放歌,为新的世界而歌唱。’”

他坐下来了。像雨果小说中的大炮一样纹丝不动。下面的掌声可能是他所遇到的最不激烈的一次,但还是有一部分听众完全是喜不自禁,其中包括“有三个子女的年轻人”,以及位于图腾柱底端的教师。在他们看来,全日制上班、将补偿建

立在需要的基础之上,听起来确实很悦耳。

## 布鲁克斯的布尔什维克兄弟

1944年1月12日晚,在大学的教职工和董事们从南海岸乡村俱乐部出来的时候,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校长这次惟一提到的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区里,补偿的惟一尺度是需要”。他的话已使所有人——不论朋友还是敌人——感到诧异。15年来他只谈论教育(除1941年他拿起麦克风谈论战争与和平之外),这次他却出乎意料地给他们上了一堂道德和社会哲学课。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说教家要求把社会正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机构中去。他原先不可能认为芝加哥大学是他所说的那种真正的社区;一定是他想要将它变成那样的社区。但它不是他的大学,而且他在大学赖以运行的经济层面也没有法定的权力。这是大学的董事独有的特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们什么也不是。赫钦斯的建议、那个被传说的夜晚,有点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关于家庭补贴的那种随意的计划和废除职位的提议显示,一所著名大学的教职工,从最著名的到最不出名的和最没前途的,可能都会从董事会那里拿到同样的薪水,但没有一个董事会成员想这样经营大学。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什么时候行得通过。为什么它不会成功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只会把最好的



教授赶走,并阻止其他大学最好的教授来芝加哥大学。“我相信我们不会毁灭它——也不会让它遭到毁灭”)如果有机会去别处,除了那些没有能力的、不那么有能力的、碌碌无为的人以及对乌托邦主义的兴趣胜于本职工作的少数年轻人之外,谁还会留下来呢?谁还想来呢?还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和没有前途的人,他们会尽力争取自己被大学接纳并获得任期,为的只是想继续过《雷利教授的生活》中所描写的那样的生活。

简而言之,赫钦斯终于脱离了人类本性与人类社会的残酷现实。在大学里确实有一批人更看重金钱之外的东西。但是到哪里去找那些不要金钱或是不想要那么多钱,过赫钦斯或他的手下确定的那种生活的人呢?到哪里去找那些在自己原来的车和房子虽不满意但尚可使用的情况下,不想换新车子和大房子的人呢?到哪里去找最终不会沦为独断和专制的这样一个社会的 management 方式呢?

人类在忙些什么呢?

这个联欢晚会过去 25 年之后,赫钦斯在接受麦克唐纳德(Donald McDonald)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口传历史项目的访谈时,经历了由于他的那次讲话对他的最后一次攻击。他坚持认为(也许不是真诚的),当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议“引起许多教师内心的恐慌”时,实际上他感到很惊讶。感到恐慌的当然是那些年长的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输家。伟大的人要么创造大学,要么毁灭大学,他们看到赫钦斯向年轻人求助来反对他们。

最伟大的伟人可以在社交上接触到这个或那个大学的董事。他们去找董事会中的朋友并“要他们不要再听我的话,他

他们没有建议我退休或辞职,但是他们想,如果董事会对我不那么在意,那就再好不过了”<sup>①</sup>。赫钦斯的建议是双重的,它强调教授要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借助董事会实现他多年的愿望——为职位低下的教职工增加薪水。(为了平息高职位教师的反对,他已要求董事会加薪 25%。)一个公司的主席要求董事会为那些不可替代的职工加薪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是不论加薪如何不合理,只要按比例递增,就不会威胁到区别补偿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可以肯定的是,赫钦斯一生都在不时发出激进的声音,而且是在公共场合。早在 1937 年对青年民主党人发表演讲时,他就极力主张推行比联邦议会更激进的社会立法,并声明他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Norman Thomas)<sup>②</sup>。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充满不平等和邪恶的国家之船开火,但他总是高谈阔论,不考虑实际的情况,他从未把对社会秩序的责任带进自己的后院。

他的敌人和朋友都不认为他会这么做,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因为如此,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对他而言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对此根本就没有意识。他的需要和家庭花费又是怎样的呢?是的,他在大萧条时期削减了自己的薪水,并经常把他的校外收入上缴给大学(此事他没有宣扬过);但是,他在三个子女、夫人、夫人的公寓、全家在康纳狄克(Connecticut)海滨或欧洲暑期度假,以及大学校长办公室侍从的开支需要由谁决定?依据是什么?他怎么能定

---

① 赫钦斯:“与麦克唐纳的谈话”,抄本,第 76—78 页。

② 赫钦斯:“在芝加哥的讲话”,1932 年 6 月 27 日。

出这样一个消灭补偿方面的明显差距、消除挣钱谋生者们的反感计划呢？开始他好像在谈论(后来说他是)挣到的收入。现在教授 A 和教授 B 都各自在竭尽全力从事生物学和历史学工作,可以说他们的薪水减少至他们在副教授时拿过的最高水平。可是他们住的是奢侈的大房子,而名教授们却生活在简朴的公寓里。教授 A 和教授 B 是金钱至上者,他们拿到什么样的家庭生活费才能维持三个子女的费用？本身是继承人的教授 C 和教授 D 又是如何呢？这些人挣来的钱是他们收入中最不起眼的部分。在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教师会上,有人问赫钦斯,如果他赢得 4.6 万美元(当时的奖额)的诺贝尔奖,他希望如何处置这笔奖金？赫钦斯快活地说,“那就拿着吧”,好像这一例外不会使整个计划无效,同样滥用的事例数不胜数。

很久之后,在反思他的这个历史性的演讲的直接结果时,赫钦斯承认,那天晚上他的听众可能会感到自己受到了这样一种随意的和隐含性的建议的威胁。难道去削减一个没有家小的系领导,而让一个没有特别希望的教师薪水翻倍以供养其三个甚至六个子女吗？不过这是威胁大学组织的丑闻中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赫钦斯已经成就了最大的丑闻——医学院事件。美国的规划是把独立的医学院附属于一所大学。就芝加哥大学而言,有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School),那里穿白大褂的富人医治过许多富裕的大学董事和大学的捐助者。赫钦斯发起了一场建立一所新的医学院的运动,将新的医学院与大学的生理科学学部融为一体。在那几年,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董事会顶住拉什医学院那些自由散漫的员工及一般医学专业人士

的愤怒抗议,接受他的建议。<sup>①</sup>

新的医学院证明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它代表了赫钦斯的成就,并将芝加哥大学的医学研究提升到学科的最前沿。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采用全日制薪水合同、禁止私人行医,构成了对神圣的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医药服务领域的粗暴侵犯,被医生们指责为是最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赫钦斯后来说,反对者“非常有远见,他们能预见到最终会发生什么事。他们预料到由于新的医学院的建立,他们自己的学院最终将被废除”。那个医学机构从来没有原谅过他,而芝加哥大学也失去了许多在捐赠方面听信自己家庭医生的人的财政支持。

但是私人行医只是分散教职工科研和教学精力的那些外部收入的最明显的形式,真正的丑闻是在私立部门进行学术兼职。如果你碰巧从事一个通过服务可为某个工商企业带来财富的领域——一个生理学家可以在药厂兼职,一个地质学家可以在石油公司兼职,一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可以在钢铁或化学企业兼职,这是学术行业的一种外快。看看那些为大的教科书出版商撰写教科书的教授们,他们轻易地拿走大笔的版税。就系科而言,干这些事情最多的是在商学院(在芝加哥大学称为工商管理学院),不过这种事情在任何地方都随处可见。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点是很荒唐的,它不会成功,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是资本主义的芝加哥大学董事会采纳了推进全日制合同的改革。在一封写给问及此事的校友的信中,董事会主席

---

<sup>①</sup> 赫钦斯:“与麦克唐纳的谈话”,抄本,第115—120页。

斯威夫特说,董事们对此开始普遍持反对的意见,但是后来经过考虑,董事会改变了立场。他特别列举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一改革得到了所有 14 个院长和 8 个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斯威夫特没有提到的是教职工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纯粹与财政有关的管理问题,董事们认为没有理由去过分在意那些资深教授们的牢骚,正是许多资深教授认为这项改革危及他们在经济上的特权。

在这个事件中,资深教授的特权随着这项建议上交到大学董事会(并被董事会采纳)而受到损害。除了四年实习期结束后确定是升入助理教授还是被淘汰的那些教师外,这项计划对于其他教师没有强制性,对于具有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来说是自愿的。总之,它不是在推行毫无保留的社会主义,而是只适用于低职位的教师和职位升迁要求。至于废除职位的问题,斯威夫特主席告诉校友说,这个问题还处于探索的阶段,不会仓促实施。他写道,“我猜想它是不会被执行的”。他是对的,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执行。

斯威夫特说他本不奢望会有多达 50 人来申请全日制工作,但是他惊讶地发现 115 人写了申请并被接受。(有些人遭到了拒绝,“他们都是一些几乎没有什么校外合同、可能认为因此会影响自己持久加薪的人”。)他接着说,这个想法是面向“许多年轻人和能力最强的人,给他们足够的薪水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样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外面挣钱”。另一方面,如果参与这一计划的教授觉得校外的活动对他们的专业发展或大学是有价值的,只要经费交给大学,就不应反对他们继续从事这类活动。“这个想法不是对个人的控制,而是对工作条件的控制,以便教授们能将他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必因为生计问题而分心。”

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在报刊有关这项建议的评论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广泛的使用,许多保守的校友到董事会表达他们的关注。董事会主席向他们保证,这个计划只是实验性的,将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仔细的观察,包括“其他机构理想的人在加入我们的队伍时是否会犹豫不决”。

这个实验只成功了一半。短短几年,绝大多数低职位的教师参与了该计划,但也证明了老教师的怀疑,即这项计划是赫钦斯用年轻教师反对老教师的另一个举动。甚至一些高职位的教师也参与了该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没有迹象显示有能力的年轻教师对于来芝加哥执教显得犹豫不决,因为如果四年后他们想留下来,要面临参加该计划的问题。

但这项计划并没有改变芝加哥大学的特征,也没有流行到其他大学。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自由创业的堡垒,随着在外兼职活动的机会和报酬不断地增加,随着随后几十年生活开支和生活观念的向上攀升,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忙于去外面挣钱,对于选择脑力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适中的薪水失去了兴趣。因此,出于竞争,教授们的薪水在不断地上涨,再也听不到更多关于需要是一个真正社区补偿的基础的言论,更别说谈论什么是真正的社区。

赫钦斯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实行的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他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即遭到废除。这一制度前后存在了七年之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其意义超越了胜利本身。这是他作为大学校长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30年之后,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一个艳阳天,我

走进他的办公室,和他提到1944年1月芝加哥一个冰冷的夜晚,当时他提出芝加哥大学的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全日制的,并要求他们把校外的兼职所得上交大学。“在一个真正社区中。补偿的惟一基础是需要。”他的话有多少变态(如果是的话)的成分呢?如果他的建议不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然而他一生都过着资本家一样的生活。我告诉他,在我们俩的有生之年里,我想知道他在理论上对自由创业的制度有何看法,“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所作所为实质上却不同于将社会主义作为整个社会适当的组织方式?”

“我所做的就是组织和经营最好的大学……你提到的具体措施与我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一般观念毫不相关。”

“告诉我你对社会、政治、经济的一般看法。”

“好的,我对公正有非常强烈的信仰,我强烈地感到目前美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是不公正的。”

“为什么是不公正的?”

“它是不公正的,因为人类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建立的制度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遵循的程序是不公正的……你可以说只要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还存在着,就无希望可言,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你有严肃的答案吗?”

“我的严肃的答案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看到在某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另一些方面又有很多失败。一方面我们做得很好,另一方面我们又做得很差。我不能确定如果我们进行一场重要的革命,比起我们不断努力去实现公正,或通过现有的制度去实现公正,我们是否会变得更好。例如美国宪

法的第十四修正案……也有许多其他的東西……只要我们集聚了太多私人的力量,我们就不会有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类型的国家”。

“但实际情况是,宪法对经济秩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实现公正吗?”

“我不知道。公正在每个地方都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的制度中也不是必然的。我认为在我们的制度下实现公正的可能性远远没有山穷水尽。同时,我们不能假定只要人类生活在向下沉沦的环境中,我们就永远也无法完全消除不公正的现象。我认为沉沦的环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使我们的制度尽可能公正。”

“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中是否存在任何固有的公正或不公正?”

“哦,我有所怀疑。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不喜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我不知道你是如何鉴别现有的那些国家。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们是;从另一些角度来看,它们又不是。问题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时间里,能够做些什么?我只是说人们不可以将我们的制度笼统地称为自由创业制度,它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论我们如何定义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还美国以本来的面目——不要再说他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说说它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对于不好的东西能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使好的东西得到巩固,你如何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好的制度……我认为我不可以原原本本地推荐任何现存的经济制度。”



就这样,他没有说那些会招致富人强烈愤慨的话语,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怪人,但仍然还是他们的一部分,制度中的反制度者。如果起作用的不是制度,如果起作用的是人;如果人生活在沉沦的环境中,如果环境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如何期望人去改善这个制度?如何期望天生不公正的人会“不断努力去实现公正”?

对他而言,这种恶性循环是明显的。在痛苦中,这位喜欢用抽象的概念探讨真正社会的爱好者放弃了它的抽象性。

## 最后的较量

赫钦斯 1944 年 1 月在董事会的晚宴上的演讲所引发的混乱并没有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后消退,而是持续了整整一年,人们本来可以在这一年中思考更多的关于世界大战的悲剧。翻阅当年中途岛——芝加哥的中途岛——战役的记录,里面充斥着越来越粗鲁的指责与反指责的激烈交锋,就会忘记欧洲、亚洲和非洲正在遭受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赫钦斯在董事会晚宴上的演讲中就职位和工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即使没有引起教师中的反对者内心的恐慌,也肯定会引发他们的争议。但是在该演讲引发的争论中,这两个建议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注意,争论主要集中在演讲者提出的大学的结构、学位的性质和校长的权力这些更高层次的问题上。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也许是长期对战争的厌倦和不安,也许是人们对校长在校园中的激烈言辞普遍感到厌烦。

不过这个演讲有助于强化那些敌对的阵营,因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热爱或憎恨赫钦斯。

人们“爱”与“恨”的情感极其强烈。正如赫钦斯本人回顾的那样,即使在反对者最为投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教师中涌动着一股去除他的逆流。几乎没有同事绝对不喜欢他,一位对赫钦斯的中世纪遗风持谴责态度的同事称赞他为维护学术自由所作的坚决斗争;一位对他战前的孤立主义态度不满的同事赞美他作为一个战时工厂管理者的热情;一位不喜欢他贬低科学的同事称赞他科学的任命;一位不喜欢他的教学哲学的同事喜欢他的行政当局提高了学生的水平。1944年,他的坚定的反对者想要做的——至少决心要做的——就是阻止他。

他们的确做到了。

董事会为了回应他的敌人的不断抗议,终于在董事会晚宴过去一年之后被迫介入,通过向双方颁发所罗门奖终止了最后的战斗。这样,历时20年的中途岛战役结束了。这个奖实际上是坚定的革命者的一个失败,也是赫钦斯试图将芝加哥大学改造成为模范大学的运动的一个失败,但是董事会作出了中立的决定。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到了1944年1月,赫钦斯似乎意识到最后的较量不可避免。据说由一群资深教授领导的某种联合阵线正在形成,“阻止赫钦斯”运动正式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决定应战。在他的1月演讲过了一个月之后,他打破了他严格的演讲日程,接受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西北大学全体会议的邀请。在抨击美国高等教育的“严重的轻浮”时,

他说道：“美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可能是封闭性的，对自由教育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详细阐述了他一个月前提出的全日制工作改革建议，指出在这方面，大学是一个“神圣的社区”，在这里，所有职位上的差别由于有损同志感情和合作关系，应该遭到废除；大学校长应该在创建大学活动的过程中承担起全部的责任，他应该是高度紧张的民主社会中负责的执行者，“如果他开始向下沉沦”，就应该遭到解雇。<sup>①</sup>

他对1月演讲提出的建议所作的这些说明不是针对一所大学，而是所有的大学。他正在作出一个全国性的指控，提出一个全国性的要求。他在呼吁各地展开重组和重建工作。这是个新闻，即使在世界大战处于高潮时期也是个可怕的新闻。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刊登他的言论，芝加哥报纸更是头版予以报道。他五年前在《星期六晚报》的系列报道中就有过先例；他在全国各地对自己的学校进行肆意的攻击。他的这种攻击方式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因为把自己的大学与其他大学绑在了一起。许多教师受到采访，著名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开辟了由资深记者主持的专栏报道，标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师群情激愤”——担心最近教师“共产化”的建议是为了抓权。

“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充满着强烈的神秘和怀疑气氛，除院长之外，在系科中几乎没有教师声称他们完全理解校长的动机和目标，教师大都承认校长的举动是令人不安的……他们宣称，赫钦斯博士是一个诱惑性言论的大师；但是当有人试图让他明确说清楚自己的想法时，他引用罗斯福的策略，用妙语

---

<sup>①</sup> 赫钦斯：“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午餐会上的讲话”，1944年2月14日。

去搪塞……这些术语——如‘神圣的社区’、‘以需要为基础’、‘高度紧张的民主社会’与‘权利与责任相称’、‘在短期内’——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它们可以意含很多,也可以意含很少。一些教师感到这些术语有点类似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写《不能的事》(*It Can't Happen Here*)时的思维模式。有些教师回顾了休伊·朗(Huey Long)主政路易斯安那大学时的情景,他们认为,在一位他们看来雄心不让休伊,但更加能干和精明的人的绝对控制下,芝加哥大学的危机正在来临。”<sup>①</sup>

赫钦斯的言论最终伤害了他的支持者,并引发了人们15年的愤怒——这些人不欣赏他,也不喜欢他的莽撞。他喜欢——我没有误解——用玩笑的口吻挑逗那些野蛮的人;但这种玩笑过于尖刻。当然,他并非指的是“教师不好,学生和校长都是好的”;当然,他也并非指的是“商人也许有理想,但是一个教授为了金钱什么都干”。老教授不习惯于被人这样议论,尤其是被一个大学校长,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他的精灵似的幽默,其中包含着一些藐视;但是他们像憎恨他的观点一样,也憎恨他言辞中那些故作精灵的术语。

在方庭俱乐部的餐厅和走廊里暗潮涌动,结果就在赫钦斯在董事会晚会的演讲过去几周之后,由分别代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六名资深学者组成的小组宣布成立,其平均年龄远远超过赫钦斯的团队。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将他们称做“加来可敬的市民”(取自于罗丹描绘的一个发生在14世纪的事件,当时六名受困城市的市民为了其他市民能够

<sup>①</sup>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44年3月2日。

得到英国国王的赦免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给赫钦斯的第一封“信”中——整个信函的交换是公开的——他们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对大学当前和未来的路线产生的严重和广泛的惊慌”。

“你在1月12日演讲的结束阶段指出,‘大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全世界道德、精神和理智的革命’,后来你又提到‘这场运动在召唤着我们’,‘如果人类想要和平共处,这场革命一定会到来’,你说这场革命必须包括‘彻底转变我们社会所依存的整个价值体系’。”在这些可敬的市民看来,这些言辞暗示了一种大学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基本上与大学通过自由的研究和教学增进知识的发展……(要求)形成某种共同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学术观的功能是冲突的。”

他们说,他们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因为赫钦斯建议博士学位“可以重新定位,主要面向你认为需要的教师,以实现人人受自由教育”,重新定位之后的博士学位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普通教育学院颁发,大学应该重组,包括选举任期很短的校长、要求校长征求教师的意见(而不是批准)、作出决策并承担后果。后面的那条建议与他提出的缩小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成员应经过全体教师选举产生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那六位可敬的市民看来,这个建议将“对作为学者和教师自由共和国的大学的学术和政治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sup>①</sup>

几天后,赫钦斯回应说,他并不打算将一项计划强加给大学,首先是因为他不想这么做,其次是因为他即使做了也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一直清楚地表明,我不认为通过自由的研究

<sup>①</sup> “致赫钦斯校长的信”,1944年2月28日。

和教学增进知识的发展完整地阐述了大学的目标”。他说,早在1936年《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他就已说明了他的理由。至于建立一个新的自由教育学院,完全只有董事们才能决定。在过去的15年里,他本来可以在任何时间直接向董事会建议成立任何新的系科,而不用征求教师们的意见。至于校长的权力,他已向董事会建议,要求评议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协助董事会讨论他的下述建议,即校长应该既是教职工的主席,又是一个负责的执行者。<sup>①</sup>

两周后,这六名可敬的市民回应说:“如果大学作为一个机构不能遵守一定的信条,他们看不出赫钦斯所关注的这场‘革命性的运动’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他们说,他们仍然对赫钦斯提出的那种大学的共同任务感到不安,“因为它与我们主张的在不受任何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教条损害的情况下,通过自由的研究和教学增进知识的发展的主要功能完全是水火不融的。”如果赫钦斯像他们推测的那样打算利用自己目前的权力及董事会可能给予的更多的权力来推动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他们想教师们都应该知道。<sup>②</sup>

一周后赫钦斯对他们作出了回应。他重申自己不打算将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学校:“如果大学遵守过某种信条,是因为这种信条得到了系科的认同。”为实现自由教育计划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将与系科协商,以往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又补充说,许多他们的同事觉得,评议会由于其成员资格仅仅局限在教授层次,并不能公正地代表系科。他有关行政机构重

---

① 赫钦斯:“致六位教师的信”,1944年3月2日。

② “六位教师致赫钦斯的信”,1944年3月18日。

组的建议——要么废除校长,设立一个教职工主席,要么使校长成为负责的执行者——“将增加教职工对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参与”<sup>①</sup>。

争论毫无结果,双方的脾气越来越坏,手段越来越粗暴。赫钦斯3月25日的信件结束了他们书信的交锋,但校园内依然火爆。这些可敬的市民没有罢休,这位漫不经心的国王(他们不想向他交出城市的钥匙)也毫不让步,他只是平和而友善地重申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尽管这还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决定要求召开一次大学评议会会议,进行公开的辩论。会议于5月22日举行,会场有警察把守,评议会成员须凭特别通行证入场。195名评议会成员中有135名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的人数出人意料的多。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不对记者开放,据说会场的气氛非常激烈;但是副校长威尔·马耐克(Will Munnecke)三十年后回忆说,赫钦斯当时的表现“不带任何明显的情绪和兴趣”。会议的主要议程——惟一重要的议程——是向董事会递交表达反对者的不满的抗议书。

有120个人在抗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人数接近大学评议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包括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赫钦斯当时提出校长由选举产生,通过评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可以将校长免职;他没有得到他所提出的那种校长制度,却得到了(一个代表极少数系科的评议会成员)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当会议将重组评议会以吸纳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成员这个建议记录在案之后,这个评议会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当然,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机构会如何投票;但他们的

<sup>①</sup> 赫钦斯:“致六位教师的信”,1944年3月25日。

平均年龄将下降 15 岁。

据说评议会以 94 票对 42 票表决通过了这个抗议书。42 位反对者是否是亲赫钦斯的人士令人怀疑；有些人可能只是反对这种对抗。由于签名者之间存在一些统计上的混乱，还有 30 至 35 名反对赫钦斯的评议会成员没有签名，因为他们不喜欢“麻烦”。总的算来，195 名教授中，赫钦斯支持者实际上不可能超过 30 或 40 人。无论如何，15 年的争论已到了高潮。他的敌人已绕过他直接向大学的法人代表们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提到了诸如行政机构的重组、新的自由教育学院的建立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绝对是董事会的事，董事会应该就这些问题与系科协商——而不是系科先于董事会自搞一套。

评议会中那个抗议书的起草者和宣传者非常在意赫钦斯在董事会中影响，尽管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们的言辞还是尽可能的温和。尽管可能有相反的感受，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他们“不相信校长会不倾听人们就教育原则和政策提出的一些友善的建议，他毕竟要依靠这些人去执行他的计划，他们也不相信他会不愿意向未来计划的执行者详细说明他的目的……评议会认识到了董事会的权力和责任，他们相信董事会会同样关心当前大学面临的困难，如果他们完全了解的话。因此，评议会请求董事会积极与校长和系科一起，共同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明确捍卫大学的这些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基本原则……大学就不再是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地方。”但是抗议书的起草者——据评议会说——还是坚持他们的立场，要求“大学不应该认同这样的‘目的’，即将研究和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的



自由选择从属于特定的道德、社会哲学和科学价值观的构建”。<sup>①</sup>

接受了抗议书之后,董事们指出校长“无意使大学遵守任何特定的哲学”<sup>②</sup>。斯威夫特主席特别表达了董事会对赫钦斯的信任,同时承认了“15年来在他的领导下学校所取得的教育成就”。为了避免上述言论引发不好的联想,这位主席补充说,董事会“希望他在学校现有的章程和法规改变之前,继续按照这些章程和法规管理本校的事务”<sup>③</sup>。当被问到抗议书的事情时,赫钦斯说,芝加哥大学的“组织机构既无效率又不民主,董事会和评议会各有一个委员会自1943年就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大学校长有义务提出自己对大学目标的想法,人们不一定要赞同校长的观点,把特定的理念强加于人将破坏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当局一向予以保证的学术自由原则”<sup>④</sup>。

在公开场合每个人都显得彬彬有礼,但是争论三方——因为董事会已全面介入——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些人肯定还不了解争论的内容,但是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愿意支持赫钦斯关于教育和管理问题的观点,因为他在教育方面的观点不是那么激进,他在管理方面的观点反映了大多数董事的心声。但是这边是大学的教授——都是了不得的

---

① “向董事会就大学的状况递交的抗议书”是1944年5月22日大学评议会通过的决议。抗议书的内容、董事会通过主席所作的回应以及董事会采取行动后赫钦斯的申明,见1944年6月的《芝加哥大学杂志》(*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第5至9页和第11页。

② 芝加哥大学董事会斯威夫特主席“致大学评议会”,第9页和第11页。

③ “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主席的申明”,第9页。

④ “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会议后主席的申明”,第9页。

人物,背后还有一大群人——使董事会大伤脑筋。许多董事会成员没有体会到抗议书的起草者的那种恐惧的心情,但是董事会的大多数人(根据非正式的民调)总是发现赫钦斯的言论过于夸张;绝对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性的道德、精神和理智的革命,也没有必要为这个大学寻找新的目标,它的教师在这个年轻的校长到来之前一直满足于跟着感觉行事。

自从抗议书发表之后,似乎赫钦斯和评议会双方的意见没有得到真正的调和,赫钦斯不能接受“研究和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的自由选择”,而评议会也不能接受将大学作为革命的工具。董事会要做的——如果它能做——就是回避这个问题,赫钦斯似乎也确信董事会会这么做。他现在的感觉是,董事会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了解他,15年来一次也没有。

在董事会收到评议会的抗议书不到一周,赫钦斯向斯威夫特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标题非常奇怪,称是对这些请求的“个人见解”。于是斯威夫特就通知董事会的有关成员将这份备忘录交给董事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以往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与评议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讨论赫钦斯的建议。备忘录这样写道:

不要再提那些荒唐的小事,如指责我没有召开评议会会议,拒绝与系科协商,对方庭俱乐部在过去四个月进行的有系统的名誉暗杀运动视而不见。(自他1月份在董事会晚宴发表演讲以来)主要的指控如下:

(1) 我在试图将某个特定的哲学强加给大学。

①对此我已书面否认。

②我的意思在记录中非常清楚。

③我有义务为大学制定一个目标。

(2) 我在威胁学术自由。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比我为学术自由做的更多。

(3) 我正在追求独裁。

①从一开始我就声明,如果我当选的那套组织理论改变了,我就辞职。

②我提出的二个建议怎么看也不像一种独裁制度。

(4) 我在越权。我所做的一切都经过董事会或评议会或两者的批准。

(5) 我重教学轻研究。在我主政期间,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芝加哥大学对研究的重视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及的。<sup>①</sup>

赫钦斯经常说一些自我嘲讽的话,他的朋友将它归因于意识中的他对个人处境的不满。其中有句话是“我总是忙于同情自己,以至于无暇同情别人”。在他写给董事会的备忘录中,他是如此地为自己感到委屈,以至于言语间充满了不寻常的愤怒。他从未指控对手用荒唐小事或名誉暗杀进行攻击(他一定不会想到他自己会提出后者的指控)。他利用直接否认——“无罪”——和不受欢迎、听起来像在以自我吹嘘的语言为自己辩护。上述第2条和第5条的宣示就是一个号称一向含蓄的人夸大其辞的典型例子。在15年的温文尔雅之后,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蜕变成为一个粗鲁的人,他经常说自

---

<sup>①</sup> 赫钦斯:“个人见解”,见“至斯威夫特主席并分发给董事会教学和研究委员会的备忘录”,1944年5月31日。

己“非常沮丧和愤怒”；最终真是天遂人意。

备忘录没有要求回应，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但这位沮丧和愤怒的大学校长要求有机会——尽管有战时的工作压力——在短暂的夏日向学校师生表达他对芝加哥大学的组织和目标的想法。集会的日子被定在7月20日——即还有60天时间。他的演讲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刻意降低愤怒的调门，但仍然看得出他的愤怒。一开始他就说：“在最近的讨论中……我只能保持沉默，但是由于在争论期间海外对我立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我认为现在似乎应该，而且也有必要对我的立场作出说明。”

他接着向他的听众作了一个赫钦斯式的道歉，打着客观的幌子掩饰他的好战：“恐怕我不会说什么新东西，但是我得承认多年来我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开始全面回顾他所提出的每项建议及由此引发的教师的指控。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大学教堂的阴影给人们带来了些许凉意，在他选择的听众和场地面前，他的演讲显然要想创造一个记录。他只能设想，如果他对反对他的建议和行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极力作出回应，他的敌人将带着悔过之心走上前来，接受献身的召唤。但是这次演讲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他的演讲精致优雅，这是他所作的最后努力，那是1944年7月20日，距他辞去芝加哥大学的职务相差整整七年。

在炎热的气候下，他忘记了听众可能会变得焦躁不安，对每个问题进行了逐个的讨论，并介绍了他们和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他提到他支持董事会有权在设立新的学院和系科时不考虑教师的意见，借此提醒听众在教育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人们现在普遍认为”这些进展“是必要的，如果让利

益相关的教授决定是否应该开始这些改革,那么这些进展就不可发生。”——这等于是在用含蓄的方式说,美国教育的伟大成就已经使无数教授无法生存。他顺便提到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废除了拉什医学院,将拿薪水的教师并入大学的生理学院。

接着他挽起袖子,表情严肃而平和,话锋一转,谈起他和他的反对者最感困惑的问题。“我最近听说”——他听说这事情有15年了——“我在寻求将特定的哲学强加给这所大学,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意见太恭维我了,因为它暗示我有我的哲学,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家”,——他不能自己了——“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是否喜欢它,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据自己对人和世界本质的基本认识采取行动。说自由的教学和研究是大学的目标就是为大学陈述了一种哲学,说没有别的哲学是可能的就是试图将这种哲学强加给大学。

“……我可以负责地说,大多数资深教师就这样将他们公认的那种哲学强加给了大学。

“我没有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只是说比起指控我在试图将我的哲学强加给大学,他们的做法更接近上述情况。如果15年来我还没有成功地将已有的哲学向前发展一小步,就可能说明我没有在发展它,而是在极力避免将已有的哲学强加给自己,强加给赞同我的观点的那些教师,强加给所有新的雇员……

“号召进行世界性的道德、精神和理智革命是某个特定信念的陈述吗?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信念的陈述。在任何场合当我说起这些,我都是在攻击唯物主义,即人类生活和

组织机构的目标是财富和权力。既然每种哲学和宗教几乎都是持相同的立场,它就不是某个特定信念的陈述。此外,这个普遍的信念应该在大学里受到欢迎,因为那些将财富和权力视为生活目标的人很少选择大学作为一展抱负的地方……

“我想一所大学可以通过确立一个官方的信条而团结起来,我很早以前就拒绝这种方法。大学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使自己成为一个和谐和团结的机构,不压制思想的交流,不违反对自由的承诺。要做到这一点,要依靠共同的训练和共同的目标。通过共同的训练,大学就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化,通过共同的训练,大学社会中的成员就可以彼此相互理解……

“如果大学认为当代世界的根本混乱与大学无关,那么大学就不能改变当代世界的智性……要改变当代世界的智性,就要不断地提出一些大的问题,并急切地寻求它们的答案,向世界人民阐述对世界的看法。如果认为这与大学无关,甚至与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就是在推卸责任,因为大学必须对如何使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和力量作出决定。

“说让我们获取知识和力量,而不要去考虑我们的目标,不是在改变而是在顺从当代世界的智性,因为这就是当代世界的要求。在这里,大学放弃了作为智性领导者的任务,反映了和象征着一种本末倒置及使之合理化,而这种本末倒置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乱源。当我们只能茫然发现知识和力量的增长并没有暗示我们如何去使用它们时,情况的确如此;因为当世界上关于自然的信息、技术和能力的发展到达最高点时,道德和政治生活就会同时滑落到最低点……

“在我所预测的道德、理智和精神的冲突中,大学可以任

意站在其中的任何一方。它可以支持我们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可以加入到推翻它的行列中去。在我看来,大学惟一不能做的就是由于自己的超然地位而对冲突袖手旁观,这注定会使大学变得毫无用处。这等于放弃对智性的领导,等于在历史上的巨大危机关头放弃我们对人类的责任。”<sup>①</sup>

他在演讲开始时说过他很乐意回答问题,但是没有人提出问题,因为他的听众要么接受了他的观点——这部分听众可能包括大多数在场的学生和一些年轻教师,要么拒绝他的观点。年长的人总是拒绝接受赫钦斯的观点,他们拒绝接受大学有责任改变世界的智性,或领导道德、理智和精神的革命。实际上他们没有完全理解“大学”一词这种统一的、有目的和神圣的意义。大学——任何一所大学——不是一个社区,它(正如加来六个可敬的市民所说的)是一群以自由的教学和研究为惟一目标的人。除了这个无法将同处一个方庭的无数爱好者团结起来的松散的目标之外,在他们眼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目标。在这些大学的方庭中,自由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们彼此并不了解;大部分人可能彼此没有碰过面。大学怎么能在世界道德、理智和精神的竞争中任意站在其中的任何一方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赫钦斯本来不可能对这次演讲的影响抱乐观的态度;他的演讲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展现了自己优雅的风度,仅此而已。这的确是他最艰难的也是最后的尝试。他说了整整一个小时,创造了记录。但是就效果而言,在5年、10年、15年唠

---

<sup>①</sup> 赫钦斯:“大学的组织和目的”,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对师生的讲话,1944年7月20日。

叨同样的东西之后,他的话没有人再听。如果存在一个芝加哥大学的话,芝加哥大学既没有支持我们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没有加入到推翻它的行列中去。与其他自由的大学一样,它此后所做的正是赫钦斯认为不能做的事情——对冲突袖手旁观。

## 结 局

不用说,他的辞职问题摆上了桌面。(“行政官员必须时刻有辞职的打算,我的意思不是指无奈地接受这个世界,而是他必须时刻准备退出。”<sup>①</sup>)他的董事会和他对此都非常清楚。当赫钦斯第一次提出有关校长权力的两套选择方案时,他就说出了他的辞职意愿;如果其中的任何一套方案被接受,大学的行政官员就会集体辞职,以便让新的校长角色重新得以行使。至少他对这件事是认真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董事会和评议会下属的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抗议书的问题,而他在考虑无条件辞职。他在1944年7月20日的演讲中袒露了一切;他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显然他厌倦了常年的压力。他经常谈论辞职,而且谈论了好几年,他与他的朋友及他的父亲(他像往常一样对赫钦斯冲动的性格非常担心,劝他耐心等待董事会的决定)谈论过此。

1944年12月1日,他向董事会教学和研究委员会主席莱

---

<sup>①</sup> 赫钦斯:“管理者”,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1946年4月23日。



尔德·贝尔(Laird Bell)递交了一张便条,上面(略显诚恳地)写道:“我不能过分强调董事会明确而果断的决定对教师产生的影响,不应该去问教师,而应该去告诉教师。董事会决定缩小评议会的规模的消息泄露了出去。”——这个泄露出来的消息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如提到赫钦斯和评议会对董事会的想法一无所知——“反对者中的强硬派现在在忙于起草评议会的章程,他们正在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sup>①</sup> 他的情绪是轻松的,充满了感叹,这不太像他,他是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吗?

不管他是否在为自己壮胆,他仍在黑暗中徘徊。董事会在他递便条的那天完成了它的工作并作出了它的决定。三天后,董事会主席斯威夫特宣布了六点决定:

(1) 大学评议会将扩大成员的范围,包括在校至少三年的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这意味着评议会成员将从目前的 195 人扩充到 350 人。

(2) 将选举一个由 40 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负责讨论教育问题。理事会将至少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

(3) 将选举一个 7 人的执行委员会,与校长保持经常的联系。

(4) 理事会将对教育问题采取果断的行动,有权不赞成校长的建议,但是校长也可以否决理事会的行动。如双方僵持不下,将由董事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5) 校长可以在未经系科负责人认可的情况下,向董事会提出有关教师任命的建议。

(6) 董事会可以自行成立或解散系科。

---

<sup>①</sup> 赫钦斯:“致莱尔德·贝尔的信”,1944年12月1日。

因此,赫钦斯将如愿地得到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评议会,但是这个评议会同时也将比以往更缺乏效率,因为它的成员几乎增加了一倍。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在校长没有获得新的权力的情况下对决策起推动作用。第5条是赫钦斯无需夸耀的一个胜利,它实际上重申了传统的程度。第6条只是确认了大学的惯例。

这些新措施的目的是,“建立比目前的程序更好的想法和信息的交流机制。”它对问题作了澄清,但是在层次上比赫钦斯追求的要低,校长和反对派之间真正的分歧却被忽视。赫钦斯提出校长要么是教师的主席,要么是负责的掌权者,但是新措施没有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赫钦斯一再呼吁大学应该是领导道德、理智和精神革命的场所,这条上面也是没有提到。这个呼吁是赫钦斯教育改革的基础,自从他来到这所大学以来,他对这一点一直是偏爱有加。回避这一点,实际上表明在董事们看来它不值一提。他们在试图阻止他,把它的有效性交给反对派去评判。

真的,他已经促使董事会对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作出决定;评议会提出了学院和大学的管理人员不太适应的一些教育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管理人员不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遇到。作为保守主义的庄严的捍卫者,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却发表了一个“反对守旧主义的宣言,而守旧主义两百年来一直是董事资格的象征”。它不那么具有攻击性,但是赫钦斯真的已经迫使某些人在大学的管理方面作出一些姿态,尽管传统上没有人管理过大学;而且,与他一起去董事会的那些教师使董事会意识到了它的责任,而传统上这些责任一直被认为是教

授们——或没有人可以承担——的特权。

芝加哥大学不可能再恢复赫钦斯到来前的平静,但是它逐渐成为赫钦斯所希望的那种大学。他已经战斗了15年了,直到现在才被击败。他上任伊始就深入到了学院,而且在各个层次的课程中,或许有四分之一在内容和方法上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他的印记(如苏格拉底的讨论法和用原著代替教科书)。在12年的任期内,他在大二结束时即向学生颁授学士学位(他离开大学后,该方案被废除)。但是不管他在国内外如何攻击,如何作不懈的努力,大学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立在部门基础上的组织方式并没有削弱系科的权力和独立性,旧的混乱依然存在,在芝加哥或其他地方,没有也不会有学者的社区。

整个争论的主角是赫钦斯——他是最稀有的校长,但是他没有为芝加哥大学和美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带来根本性的和长远的改变。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关系呢?也许有一点关系,也许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不具备典型的改革家的性情和姿态,时常怒目而视、大喊大叫、咄咄逼人、祈求支持。他一直是一个性格活泼、轮廓鲜明的人,受到那些性格活泼或喜欢性格活泼的人们的喜爱。但是他一直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表里一致,努力工作,坚守信念。他的对手几乎都尊敬他,或最终得到他们的尊敬,但是15或20年之后,他们或者不再为他的光彩所折服(包括他的言辞的光彩),或者对他采取排斥的态度。对于长期的争论对手保持惊奇、愤怒和着迷是不可能的。当魅力和烦躁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理性的支持或反对。

总的来说,他的对手开始理解他了:知道他不是一个异想

天开、自相矛盾的人,也不是一个用俏皮话褒扬或诋毁别人的人,而是一个有方向的人,他希望改变(不管如何激进)工作的重点,而不是教育原则。他争论的是教育的方法、内容和结构,而不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他反复提到“我在讨论工作重点的问题……如果你正在经营一家钢铁公司,你可以去经营铁路和煤矿,也可以去打理许多工厂和投资,但是首要的事情是生产和销售钢铁”。他反复指出,他不是坚持一种特定的方法、结构和教材内容,只要学生掌握人文科目和伟大的传统。“如果他能够通过参加钓鱼活动和随时参加一般性考试做到这一点,那就太棒了。”他反复强调他只是认为,“除科学实验之外,获取知识还有其他的途径”。但他的学术同行不相信他的话,他贬低科学的神话使他们相信,他将把实证调查和改变世界面貌的实际成就交给游戏活动。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反科学主义者、古董爱好者、守旧主义者、固执己见的人、反动派和威权主义者,但是他一成不变的挑衅语言使他的敌人毫无顾忌地对他所称的“这个问题仅仅是工作重点的问题”持观望的态度。

他是一个坚定的绝对主义者,但不是方法、内容或结构方面,而是基于以下这一点,即他认为不变的和普遍的价值是存在的——“勇气、正义和克制仍然是人们的美德”——对这些价值的探求要求大学必须致力于社会道德、理智和精神的重建。他的对手利用这种不妥协的绝对主义,争取到了董事会对他们反对的每件事的一致支持。在1944年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令人敬畏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写道:“大学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如此的持久和普遍,以至于除了过程与方法之外我们无从表达它们。真理本身是一个过程,它不能局限

于一个准则,也不能想像成一个乌托邦。承认真理的局限性、准则的可误性以及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辨别有生命力的文明的特征。”<sup>①</sup> 认识到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每个意见都有坚持的理由,所有这些,都是对不确定的、不可确定的和短暂的价值观的嘲讽和挖苦,就像赖特的情况那样。纽约大学校长哈里·伍德伯恩·蔡斯(Harry Wodburn Chase)坚定地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敏锐的价值体系,所有知识不是具有同样的价值。”——不过他的口气立即又软了下来,以令人愉快和欢迎的口吻说:“但是,价值观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我们的判断有统一的标准吗?”<sup>②</sup> ——蔡斯校长后来也没有提出什么统一的标准;他的话就到此为止。

约翰·杜威——仍然——对赫钦斯的关于工作重点的观点不屑一顾。同样在1944年盛夏,85岁高龄的杜威在《财富》杂志上写道:“我们从孩提时代就对赫钦斯的观点非常熟悉,它是我们在家庭和星期日学校接受的传统训练的一部分。不过,它表达了一种狭隘的传统,体现了一种前科学的文化,因为有了科学,才有今天的一切。”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工厂和现场操作……有助于教育的解放和人的能力的是高,也有助于大批廉价的消费品的生产……这个问题本身只有通过不断地运用科学的实验观察和检验的方法才能解决”<sup>③</sup> ——好像赫钦斯总是说工厂和现场的操作应该通过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

① 昆西·赖特:“什么是大学”,载《大学教授联合会通讯》,1944年夏,第30集第2期,第175页。

② 哈里·伍德伯恩·蔡斯:“赫钦斯高深学问的基础”,载《美国的学者》,1937年6月,第236—244页。

③ 约翰·杜威:“自由思想的挑战”,载《财富》,1944年8月,第154—157页。

得到阐述和证明。

赫钦斯谈论的是工作重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他的大多数同事来说过于广泛和复杂,最终变成人们精心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套。多数学者并不完全是出于偏好,或在乎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前科学的。一般来说,教师无论在何种层次都是一个折磨人的职业,需要的是稳重和冷漠。对于那些不愿接受煽动或煽动别人的人来说,赫钦斯是一个煽动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学年开始时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到了学年末就会疲惫不堪,对持续不断的争论没有多大的热情。教师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一般薪水不多,由于为经济问题所困,使他们不能安心于真理的探求。与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教师而言,他们的个人生活通常比工作更加重要。如果他在大学里教书,他的工作首先是做研究;如果他容易为他工作感到激动,那么这个令他激动的工作就是他的研究,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耗费了教师的所有精力。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像其他可以信赖的大学的教师一样——不可能、也不会时刻准备为教育做一些事,除了少数几个(他们大多很年轻也没有影响力)感到有责任和那个大男孩似的校长一起奋斗。1944年,他已经45岁了,早就超出了大男孩似的年龄。

回顾往事,赫钦斯坚持认为,他可以比在芝加哥大学时做得更好。他认为,如果具备了耐心(他在上任的第一年曾嘲笑过它),他可以在取得共识——“这个不幸的字眼”——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依靠争取多数。“我经常争取到多数并经常依靠他们。依靠多数决、接近多数决不是理智社会的

精神,更不要说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决定做一件事。”<sup>①</sup>

“我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说那种需要的耐心几乎是超人的,你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权力,也就是说,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做任何事,你不能威胁任何人,因为在大学的环境下这样做效果会适得其反。如果人们知道我在威胁一个教授,那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你也不能奖励任何人,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支持你就去奖励他。你可以因为他在自己领域的杰出成就对他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应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并征得董事会和他所在系科的同意。但是如果我开完一个教师会议后建议给一个为我感兴趣的项目出了力的教师加薪,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因此,(大学校长)完全要依赖他的说服能力。”

“如果你开始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劝说一个人,那么你的人格魅力和言辞的流畅性就会下降,这当然是我最终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另外的人可以进来,给这个地方一个新的,当然也是不同的激励。我只是觉得,我正在丧失一个严肃对待自己职责的大学校长必须具备的东西,这就是权力和不停地进行说服工作的忍耐力。”<sup>②</sup>

权力、忍耐力——欲望。他并不那么热心地展现着说服别人的欲望。他回忆起几年后在他看来是数不尽的所谓亲善见面会,“你和一个个人见面,你和一群群人交谈,和你遇到的任何人交谈,因为你……没有权力……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管理一所大学,我会用两个字来回答:午饭。你必须不断和别

① 赫钦斯:“与麦克唐纳的谈话”,抄本,第130—131页。

② 赫钦斯:“与麦克唐纳的谈话”,抄本,第131—132页。

人一起吃午饭,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消化不良症,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有时会把工作做得更好。”<sup>①</sup>

如果他与别人一起吃午饭的次数更多,如果他的言辞不那么充满火药味,如果他的耐心不那么容易失去,如果他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他是否可能就会做更多的事情,做的时间也更长?也许不是。“时间问题是不可解决的。”——这是在1945年,当时他仍然在位——“管理者决不应该做那些他不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要做的事是如此之多,他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它们。他决不应该将可以迟到明天做的事情放在今天就做。他决不应该做别人能为他做的事情。他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好的助手,因为他们可以代替他做事。但是在这里他不应该有任何错觉,他的助手们越好,他们就会为他想出越多的事情。”<sup>②</sup>

十年后,即离开芝加哥大学五年后,他表明了他的信条:“(一般而言,大学的)现有结构是不可能的……基于说服和协议的行政管理是产生持久效果的惟一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可能在美国大学的一片混乱中推行。如果我推行这种方法的话,我可能在1929年就开始了我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案。我应该建议按照牛津和剑桥的模式来重建芝加哥大学。大学应该重组成一个学院的联盟,每个学院代表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这些学院应从大三开始,学生大二结束前在大学学院学习基础课程。这类学院应该成为人文学科训练馆、法国的高中(Lycees)或英国的公学。这种改革可能会意味着在接受了基

① 赫钦斯:“与麦克唐纳的谈话”,抄本,第17—18页。

② 赫钦斯:《管理者》,第175页。



本的自由教育之后,强制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代表交流,如果是教师,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就要贯穿他们的一生。对于这样的学院,250名学生和25名教师是一个便于管理的规模。每所学院可以有一名管理官员,他的职责是引导学生获得巨大而持久的进步。整个大学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全日制领导人。大学校长的一些礼仪性的和代表性的工作像牛津和剑桥一样可以由一个临时性的官员负责。”<sup>①</sup>

这就是赫钦斯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之一。鉴于20年来他未能给芝加哥大学带来他所追求的变革,不难想像,如果他推动这样一种完全激进的方案来分割大学,把大学重组成一组小规模学院,“强制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代表交流,如果是教师,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就要贯穿他们的一生”,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疯狂的计划只能在其疯狂的倡导者付诸实施后的几个月内立刻招来愤怒的拒绝和一片激烈的辞职之声。他本来会做一些事情,但不会有广泛和持续的影响。这20年来他所取得的成就可能没有一个产生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影响,或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关注。

在国内的大多数大学和下属的学院,他的成就开始得到人们的了解和仿效。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更是暂时的。他的作为引起了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讨论,不仅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和亚洲。赫钦斯的名字众所周知,20年来他的一些思想体现在教育的每个层面,他是此后10年继杜威之后的又一个教

---

<sup>①</sup> 赫钦斯:“对管理者的反思”,1955年9月19日在亚特兰大市对医院管理者的讲话。

育界名人。自从他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后的 50 年里,整个学校教育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崩溃引发了回复“基础”的强烈呼声。在 80 年代,每所大学仍有许多教师和教师运动将他们的传统追溯至赫钦斯,各地有无数教师尽管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通过这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成为他的信徒。

他私下认为并公开暗示自己是一名失败的教育家。当然他失败了,他没能将美国的教育变得更好,其他人也一样。美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变得更糟。在普遍道德滑坡和社会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其他许多事情也在变得更糟。总统们、总理们和行李搬运工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赫钦斯校长是他们中的一员。原罪者并没有一些原罪,包括基本的原罪,但是他们骄傲于这个基本原罪。鲍伯·赫钦斯 1918 年在意大利前线狭小的帐篷里读过《浮士德》(德文版),在该书的引言里,他读到过造物主问墨菲斯托菲里斯<sup>①</sup>,他在地球上最喜爱的造物物过得好吗?这个魔鬼回答说:“他还是那个同样的老家伙。”

---

<sup>①</sup> 墨菲斯托菲里斯(Mephistopheles),《浮士德》传说中众所周知的魔鬼精灵。——译者注

## 附录二

# 名著：过去与现在<sup>①</sup>

莫蒂默·J·阿德勒

## 成人的自由教育

名著运动的目标是普及成人的自由教育——使它像学校教育之于儿童和年轻人那样平常，并尽可能扩展到所有公民。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也许令人满意，但是它更多的是使人们有信心期望，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参与到名著的阅读和讨论中来。

然则，近年来名著已经成为许多教育争论的主题；它们在我们的大学和成人教育中越受欢迎，就越会受到攻击或（至少是）反对。可以预料它们在得到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会出现反对的意见。

---

<sup>①</sup> 莫蒂默·J·阿德勒：《改革教育：开启美国的智慧》，1988年版，第318—350页。

为了对名著运动背后的基本思想作出评论,我求助于我们的批评者,忽视了在这场教育争论中关心名著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的那部分人士。不过许多讨论还是将名著作为成年人自由教育的一种手段。

友善的批评是有益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已经发表的攻击并不是这样,它们几乎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大多数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并不完全了解我们的行为,以至于他们不能发现真正的困难或缺陷。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好地批评自己,我们可以对将要克服的困难有更好的估计,我们可以对目标进行限制,以便这些目标有更多实现的机会。

已经发表的大多数批评意见纯属误解,它们没有为我们及我们未来的对手提出真正的问题。它们基本上都是不顾事实地指责我们为名著造势,将莫须有的理论转嫁到我们头上,将一些不属于我们的目标或目的强加在我们身上。

也许错就错在我们没有将自己的观点解释清楚。对名著的许多批评意见是误传和误解造成的,但是撇开是谁的责任不谈,事实毕竟是,所有的攻击都是指向那些并不存在的假想敌。我们完全承认,我们的批评者攻击他们印象中的名著运动是非常正确的,但这只是他们的印象,不是现实。如果现实中有任何人像我们的批评者提到的那样误用或滥用名著,我想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会和他们一起谴责这种教育上的愚蠢行为。

让我通过对什么是真正的问题的陈述,证明我们的对手与我们之间缺乏真正的问题,如果任何人——他们或我们——提出某种极端的陈述。

例如,如果我们说名著是成人惟一值得阅读的书籍,或如

果他们说名著根本不值得阅读,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想法上的真正对立。但是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人曾说过如此荒谬的话。

如果他们说名著对成人心智的持续发展完全没有贡献,或如果我们说只有阅读和讨论名著才能给成人一个完整和全面的教育,那么双方也就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似乎也没有人持如此激进的观点。

如果我们说参与名著计划本身可以造就好人或好市民,或如果他们说名著计划对好人和好市民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对手由于意见不一而再次对抗,但是我们与他们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他们说一个人知道生活的事实和当前的事情就足够了,如果说想法和理论是重要的,当前讨论的这些想法和理论就足够了;或如果我们说有关当前事情的认识和有关事实的信息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说惟一值得关注的想法和理论是那些在过去被考虑过的想法和理论,那么另一种明显的冲突就会出现,但是他们和我们都没有说过这种荒谬的话。

既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说过这些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说,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有必要共同提出反对——那么所有的争论都在争些什么?实际的指控或批评是什么,对此我们有什么回应?

我不是假装将它们一一列出,但是在我看来,我列出的这些情况真正反映了已经公开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很容易回答。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对我们对手的意见表示赞同,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创造的那个怪

物。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只是在个别情况下，人们提出了真正要考虑的问题，并对此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回答。

异议：据说阅读书目的选择方式是权威主义的，要人们接受前辈给他们制定的书目是不民主的。

回应：如果这是真的，会成为一个话题。但是在已经制定的所有书目中，名著的书目的选择方法最民主，最受欢迎。不是我们或其他任何人说一本书是名著它就成为名著。名著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来自于历史上大量的读者和专家们的一致意见。

一本畅销书就是一本畅销书，它不是来自权威的判断，而是来自大众的认同。因此，某些书吸引大量读者达几个世纪，这就是名著的一个标志。这不是名著唯一的标志，但是正是名著的这个特征明确了它们不是精英们的选择，而是大众的选择。

我们中间的那些编制名著书目的人，只是记录了大众和智慧者的主流判断。任何名著书目中有百分之十可能是有问题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对于是否应该收入某一本书可能有正常的意见分歧。不过，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问题，既不至于招致谴责，也不会阻止名著计划目标的实现。

异议：据说我们阅读课程所列的名著书目有两方面的缺陷：第一，忽略了当代最优秀的著作；第二，忽略了东方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名著。

回应：从事实上看，这两个指控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从原则上看，我们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两个忽略。

我们在阅读书目中忽略了当代的著作，是因为判断一本当代的著作是否是一本名著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没有经过时

间的检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一些著作有朝一日就不会成为名著,也不意味着当代最优秀的著作就不值得阅读。因此,参与名著的阅读和讨论的人可以自由阅读其他的著作,事实上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将名著的阅读和优秀的当代著作的阅读结合起来。但是,既然我们关注名著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我们认为将名著的书目限制在那些公认的名著是明智的。

至于忽略了东方的著作,答案非常简单,即理解我们自己文明的基础和来源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只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良好的基础,我们才能去理解对于我们而言非常陌生的那些文化和传统。

异议:据说名著计划只是与“古书”有关,它鼓励人们回到过去,培养人们对逝者和过去的兴趣,而不是对活生生的现在的兴趣。

回应:当代的和在世作者的著作除个别之外都未能入选名著书目,这是事实。名著计划只是与“古书”有关则肯定不是事实。事实上,超过一半的人选作者都在近三百年里生活和写作——这一时期我们称为“现代”——而且所有的阅读课程都延伸到了最近刚刚过世的作者以及对当代的思想有直接影响的著作。此外,我们坚持不用“经典著作”这个词并由“名著”取而代之,是因为“经典著作”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对古代的东西本身的一种崇敬,但是我们不会像古物爱好者那样对这类著作有任何的兴趣。

和我们的对手一样,我们不想生活在过去,以逃避当前现实的压力。我们对名著的兴趣无非是它们对于理解和面对当前问题的贡献。尽管大部分名著写于二至二十个世纪之前,

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基本问题,通常都是人们在思想和行动领域面临的一些老问题。

异议:据说没有人有能力处理我们自己时代的那些关键问题,除非他熟悉对当前问题目前的最佳想法。同样,据说人们必须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必须要对当前的事态有良好的了解,对当前的情况非常熟悉。

回应:完全赞同,具有健全心智的人都不会反对。

你不可能有火腿和鸡蛋,除非你有了一些火腿,除非你有了一些鸡蛋。你不可能对当前的问题作最佳的思考,除非你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方面,不论过去能提供什么帮助,通过最佳的想法可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或者非常类似;另一方面,对当前情况的熟悉是来自于直接经验和名著之外的阅读。

异议:据说名著代表了一种单一的哲学,它被武断地强加给名著讨论小组的学生,其他的观点受到排斥,不去面对分歧双方的问题。

回应:任何阅读过名著的人都知道,名著中没有单一的哲学立场、宗教教义、道德信仰或社会理论,对于任何基本问题的每一个观点,名著都列出了许多反对的意见。因此,对于想要将单一的哲学或观点强加于人的女士而言,推荐人们去阅读名著是非常奇怪的。

人们可能说是名著的讨论方式导致了武断和单一观点的强加,但是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名著班采用的是讨论的方法,主要包括观点的交流和观点的批评,不管是班的负责人还是成员。用讲授的方法将一个武断的教条强加于人要容易得



多,实际上这种方法很常见,而不是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因此,我们的另一群对手认为名著讨论组采用的方法过于辩证——对许多反对意见过于开明——他们赞成讲授而不是讨论。

那些有自己特定的信念并希望这种信念得到传播的人,担心名著讨论小组会走向一种折中主义——仅仅是发表意见而不是追求真理。那些惟一的信念就是不支持任何信念的人,担心名著讨论小组可能会试图通过对各种观点的处理和澄清这一辩证的过程,去发现真理。

这两个担心是合理的。但是名著计划所受到的这两种极端批评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名著计划努力在教条主义与诡辩之间保持中间的立场。

异议:据说在名著的传统中,不仅有许多真理,也有许多谬误,必须保护现在的一代人免受过去错误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

回应:我们完全赞同。既然名著中的每个观点几乎都可以同样在名著中找到相反的意见,名著中必然是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谬误。因此,在阅读和讨论名著时,我们的任务是对哪些是真理作出自己的判断,并通过发展我们自己的批评能力,去探讨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是名著讨论小组的目的,也是确定名著讨论小组活动方式的主要原则。我们也认为,如果阅读和讨论名著可以使教师变得具有批评精神,它不应该仅仅关注名著本身,而且还要关注其他事情。对我们来说,批判当代思想中的各种谬误及错误的价值观,与批判过去思想中的谬误同样重要,阅读和讨论名著的意图同时服务于上述两个目的。

异议:据说名著课程充其量也只是成人自由教育最低的要求。要使成人在离校后有一个全面的教育,应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回应:我们同意,在芝加哥大学的大学学院,我们开设的课程远远超出名著讨论,所花的课时因而也更多。

这里不可能有最低或最高要求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不认为阅读和讨论名著是自由教育课程的全部。我们的对手所乐于增加的许多东西可以使自由教育课程更加全面,我们也乐观其成,特别对于那些有足够时间接受继续教育的成人。

但是大多数成人在工作、家庭和公民的责任之外很少有什么时间,因此提出一个基本的或必要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教育是合理的。我们的确认为,阅读和讨论名著是最低的要求;我们认为这种最低的要求对于任何心智不断进步的成人都是必要的,尽管还不够。我们甚至很想指出——这点我们的一些对手也许会不同意——在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教育方面,其他的成人教育方案都不会成功。

异议:据说不管名著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价值,在名著基金会或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方法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例如,与芝加哥计划不同,有人提出在四年的课程中应该只选读 20 至 25 本名著,应该将古代到现代的名著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阅读原文进行评论和批判的方法对这些名著作出仔细的鉴别。

回应:这个学习计划应当再尝试一次,也许尝试这个计划的人可能比我们第一次严格按照这个方法组织名著学习更加成功。我们放弃了这个计划,是因为通过实验我们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通过试验我们还发现,如果成人想从部分名著的深入学习中受益,就需要使他们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有一

个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名著计划开始的六七年间广泛接触许多名著和作者,尽管我们没有通读所有的名著,尽管我们知道即使部分的阅读和讨论还是相当肤浅。对任何问题的深入理解应该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名著阅读开始的六年里选择的书目、每年阅读活动的组织方式、年度间阅读活动的连接,所有这些方面,都考虑到如何为初学者逐步开启学习之门。

然而,有一点我们和提出四年制名著学习方案的那些批评家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说,前六年的阅读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不会有结束。我们认为成人阅读名著应该贯穿他们的一生。他们在开始的六到十年里对名著有了面上的了解之后,接下来就能在另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里从更加深入地阅读数量较少的名著中获益——不仅通读,而且还要对原文进行解释和批判。

异议:据说名著计划的倡导者声称他们的计划不仅是成人自由教育最好的方法,也是惟一的方法,这种说法遭到了驳斥。相反,有人认为其他的计划和方法相比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应:在这里,我们也许找到了到目前为止争论中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确认为名著计划是成人自由教育的一种理想的最低要求,目标不是一年或者四年,而是终生学习。

我们认为名著计划是一种理想的最低要求——最好的或是惟一的——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极端,容易受到激烈的反驳。然而,正如我要极力表明的那样,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种非常中道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我看来是站得住脚的。

因此,为了回答最后的那个异议,我想尽可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对名著计划的主张。如果人们在提出争辩或反驳之前放开心胸,听一听我的介绍,我不相信他们对我的介绍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还有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可能发现一些真实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不再是基于对名著计划的错误信息和误解的一些错误的问题。

对于一个基于名著的阅读和讨论的成人教育计划,我们只是主张它对人的心智是有好处的。

它对人的心智有许多好处,它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基本智力技能,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阅读名著,而是将名著读好,我们关注的是阅读的技巧;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讨论名著,而是理智地和明确地就他们考虑的著名思想、问题和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关注的是交流的技巧。

除了这些技巧或技能的要求之外,名著计划对人的心智的好处还体现在增加个体获得洞察力、理解力甚至或许是小小的智慧的机会。我们不能承诺上述的任何一个好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给予个体诸如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这类不寻常的礼物。我们最多可以说——这是件好事——名著的阅读和讨论为这些心理品质的获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好材料,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充气站。如果个体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断取得进步,必须开动脑筋,积极投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一定的智慧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能实现,一个人对此不能有太多的奢望。

因此,显然任何有志于追求这些好的心智品质的人必须准备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当然任何想使自己保持清醒头脑

并在一生中不断取得进步的人必须愿意为此投入毕生的精力。像毕生追求理解力和智慧以及心智的不断发展这类长期的工作,不仅需要最好的阅读材料来激励心智的活动,为心智活动提供素材,而且也需要一套年复一年用之不尽的阅读材料。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名著正好构成了那么一套阅读材料,它们是公认的西方人迄今为止所积累的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宝库;它们公认地提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问题、原则和主题,构成我们现在的文化;它们是公认的很难一次读懂的书籍,任何尝试阅读这些著作的人会发现只有反复阅读才有收获——事实上,如果他想学到名著里的东西,他必须这么做。

除了名著和著名的思想之外,也许还有其他材料可供阅读和讨论,它们也能为个体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提供机会,终身激励和有益于人的心智,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当然没有更好的书籍。除了各种书籍,经验、对生活事实的熟悉和对自身任务的积极参与,也是心智的活力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即使阅读最好的名著也是不够的,当然对于极个别的天才则另当别论。

因此,我们认为名著计划是一生的事,是说它是个人获得理解力和智慧惟一的,当然也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就提出来。如果提出的方法结果比我们的方法更好,无论如何就应采用这些方法。

有些关于名著计划的看法,我们并没有说过,我想在此作一个澄清,以免上述中道的观点遭到人们的误解。

我们并不认为名著提供了所有有价值的知识,远远不是。

在提到作为名著计划目标的心智发展时,我一直很小心地避免使用“知识”这个词。我不是说有些知识,也许是非常基础的知识不能从名著中获得;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对于许多专门领域的知识而言,其他书籍或信息来源也许更加有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并不认为名著可以培养人所有的优点或长处,当然不包括美德。一个具有良好心智的人是一回事,一个好人和一个好公民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除非良好的心智、理解力和智慧不利于个体的美好生活,否则名著计划就不会减少他实现美好生活的机会。与此相反,如果拥有最好的心智对于一个公民和他的私人生活是有利的,那么名著计划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将有助于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有助于个体履行其公民的义务。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阅读和讨论名著一定会使一个人变成更好的人或更好的公民,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样做就一定会使人的心智变得更好。我们只是说阅读和讨论名著为心智的改善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加上其他许多因素的配合,就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和一个更好的公民。

我们并不认为名著将拯救世界,阻止下一场战争,或避免核弹自毁行为。我们并不认为名著将保护我们的民主不受它的敌人的损害,或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公正。但是,如果民主要求公民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自由的人,而且也是具有自由心智的公民,那么名著计划就有助于民主的繁荣,因为它无论如何都能培养人们批评的能力——就是个体对所有问题的优点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如果我们值得将我们的文化或文明从核弹的破坏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同样也值得将我们

的文化或文明从消亡和无知中拯救出来。

一种文化的延续和繁荣只有靠各个个体的掌握,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为这种文化增添一些东西,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应该将这种文化传承给下一代的载体。因为名著构成了我们文化的座座丰碑,构成了我们智慧传统的精华,不管通过名著的阅读和讨论人们对这种文化实际掌握了多少,这种人越多,就越有利于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进步。

我们经常将名著描述为不同时代的对话——关于基本思想、根本性的问题和人的心智方面的主要议题的对话。这些思想是任何个体在考虑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时必须用到的,这些问题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这些议题代表了值得人们探讨和学习的问题,如果人们希望对世界、社会和自己的本质有一点了解。

名著的阅读和讨论吸引个体进入这种对话。而且因为其他对话的参与者是各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使我们从参与先贤的对话中受益。此外,人们还可以愉快地就人类的那些永恒的主题相互交流意见。

好的对话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我们中间许多人很少体验到这种愉快:被人理解时的快乐、理解别人时的快乐、我们中间每个人在孤独的时候从思想的共同交流中得到的安慰、基于思想和情感交流的人际关系的丰富——我认为名著计划将会带来的这些好处并不过分。

我还想补充一点。成人在国家、家庭、其他组织或社会中是相互联系的,名著计划有助于提高人们明智地和明确地进行相互交流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名著计划丰富了人们的各

种交往。对于家庭而言,它可以发挥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在这里,成人是与孩子联系在一起,作为家长,他们要对孩子们的训练和发展负起责任。

现代的生活环境极大地削弱了家庭的活力,特别是家长在子女中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家长不再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不再是孩子们的指导者和顾问。随着学校教育的水平发展到大学,随着其他机构介入孩子的生活,随着社会风气甚至良好的行为方式的普遍崩溃,家长对子女的威信日益丧失,所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

当然,家长惟一应该有的威信是基于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就凭这点就值得尊敬——不光是年龄或体力。我并不认为名著计划能扭转我们时代家庭解体、家长和子女关系失范这一普遍的趋势;但是我要说,拥有更多理解力和智慧的家长,比起那些心智实际上落后于表面上受过更好教育的子女的家长,更有机会得到子女的尊重,也更有机会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服务。

受过学校教育甚至大学毕业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理解力,也完全没有智慧。在这个年龄,不要期望有这类心智的品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也不能做到。获得这些心智的品质需要人们更加成熟,包括经验、承担责任、参与生活中的任务。由于家长有这些成熟的有利条件,他们专注于那些有益的事情的收获远远超过子女在学校或大学的收获。即使孩子们想要阅读名著,也不会获得理解力和智慧,因为理解力和智慧只对他们的家长开放。因此,名著计划为家长提供了一个改善他们心智的机会,这不仅会使他们作为成人世界中的成人受益,而且也会使他们作为孩子的家长受益。



我已经尽可能中道地阐述了我们对作为贯穿个体终身的一个成人自由教育计划的名著计划。我也尽我所知澄清了我们并没有说过的那些事情,希望那些误解我们想法的批评或反驳可以停止。

我在一开始就说,作为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我们应该比外界的批评者和那些不愿意花时间精力验证事实的人更能够说出该计划的困难或缺点。现在,我想最后对其中的一些困难作简要地说明。

第一,名著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每个参与者的自愿合作。名著不能使他们思考,思考是困难的,它也许是人类要做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既然一个人从阅读和讨论名著中得到的收获必然取决于他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我们不能希望所有人都会成功,或达到同样的水平。

第二,名著讨论小组的负责人不是名著的作者,他们大都是普通人,自愿承担起帮助他们的同伴做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事情的责任。

他们本身从学中教,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计划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作为教师,或我们所称为“负责人”,他们的职责不是讲授,不是灌输,不是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不是将他们自己对书的意见或解释强加给别人,不是去散布他们自己以为的对一个思想更好的理解或对一个问题更好的智慧,而是通过提出问题、验证答案、指导讨论、维持讨论的主题和进行,使小组成员,包括他们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提高阅读和发言的技巧,获得理解力和智慧,这些正是名著计划的惟一目标。

实际上,小组的负责人可能经常会失败,他们可能永远也

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尽管有这些限制,我仍然相信,如果采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也就是与定期聚会讨论的其他同伴一起阅读,人们不仅更有可能去阅读名著,而且也更有可能是将名著读好。

最后,阅读名著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它们也许是最难的书籍,因为它们的内容最丰富,也最深奥。它们又不是最难的书籍,因为它们的专业性不是最强,从这个意义上看,教科书和教授或学者撰写的专业论文要难得多。

人们不要期望在第一次阅读时就能很好地理解名著,甚至也不要期望经过多次阅读就能完全掌握它们。名著的难度要求人们反复去阅读,这需要耐心和毅力,要求精神上的努力,因而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痛苦。就像生活中所有其他好事情那样,名著的好处是很难得到的。但是名著也是有价值的,即使是第一次阅读;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加,名著的价值也会日益增加。

正是名著难以阅读的特点,使得它们比其他书籍更具可读性,也更值得阅读。正是因为名著中提出的问题名著本身也没有作出最终的回答,它们能够激励我们思考、探索和讨论。正是因为名著的难度对我们的阅读技能提出了挑战,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方面的技能。正是因为名著经常挑战我们的成见,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批评能力。

名著的难度不是来自于不良的写作或构思,而是来自于对人类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作出了最简单明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获得理解力和智慧的机会。

理解力和智慧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获得——根据天才程度和个体的努力程度。因此,名

著的难度不会使这个计划仅仅局限于那些智力上的精英分子,但是它也只限于那些希望改善心智——也渴望获得理解力和智慧——愿意投入精力的人,那些充分意识到如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断进步,心智的活动不仅限于学校或大学,而必须贯穿其一生的人。

## 西方文明中的名著

### 一、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 1900 年

人们对名著提出了许多定义,对名著的重要意义也提出了许多看法。当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定义最为巧妙,他说名著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读过,但又不想去读的书籍。

最近,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更加郑重地指出,名著是永远也不必重新再写的书,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如此完美,它们是不可改进的。

对于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而言,名著的意义不限于他们写作的那个世纪,它们对当代通常也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它们当今的意义可能与以前不同,但是同样重要。我们阅读名著,并不是将它们看做文化古董或过去永恒的遗产,而是因为它们阐述的基本思想和问题是超越时代的,是永恒的。

1937年,斯科特·布坎南(Scott Buchanan)将一本名著定义为一本满足他提出的那些先决条件的书籍。也许没有一本书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但是名著比其他著作更接近这些标准。

他的五个标准是:

(1) 它拥有最多的读者……它历来都要比其他著作拥有更多的读者,并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2) 对于它的各种独立的和持续的解读最多。

(3) 它提出了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

(4) 它必须是一件艺术品。

(5) 它必须是一部人文科学的杰作。

对于这些苛刻的名著选择标准,我想补充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由于它们以各种方式涉及基本的思想和问题,它们必须是明显可以讨论的书籍。这就排除了所有的教科书,因为它们是不可讨论的;排除了所有只传达信息而不是知识的书籍;甚至也排除了那些有系统的知识,但没有激励我们从事反思性思考和追求理解力的书籍。这意味着,一本名著必须有许多段落基本上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重大思想和问题有关。

第二,与每年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和那些甚至值得一读的书籍(通常不到出版总数的百分之二)不同,名著不仅值得阅读几次,而且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完全理解。名著的伟大之处是无尽的,不管我们读过多少遍,它们总是超越我们的心智,因此,它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以将我们的心智提升至更高水平的理解力。

当孩子们在低年级开始阅读名著时,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为他们选择的书籍应该超越他们的心智。随着阅读的继续,为他们选择的名著应该越来越难——总是超越他们的心智,以便激励他们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除了富有想像力的文学领域外,所有领域的名著一

定是由一个博学者撰写的,不论作者同时是否是某些特殊领域的专家。而且,名著一定是写给那些好奇的和聪明的非专业人士,而不是作者的专业同行——也就是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根据这一标准,要找到 20 世纪的名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时期所有科学和学术领域变得非常专业化。在 20 世纪以前,除了个别例外——主要是德国,名著都不是由大学教授出于提高学术声望而撰写的。

第四个标准已经说过:名著来源于各种富于想像力的和叙事性的文献,来源于人类所有的学术领域,它们不限于杰出的叙事诗、小说或剧本。

最后,还有一个反面的限制,即如果作者的影响不是因为撰写了符合上述标准的一本名著,就不能因为这些作者的影响而将他们的著作列为名著。这就排除了许多没有写过名著,但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者。对于当前参与“名著”学术争论的人而言,也许应该进一步指出,在 19 世纪前西方的传统中,没有一本名著是由女性、黑人或非欧洲人撰写的,这个事实丝毫不损害男性白人早期著作的伟大。

根据指导名著选择的这些标准和先决条件,我向读者提供一份名著作者的清单,从古代的荷马,到威廉·詹姆斯、易卜生,到 19 世纪末的弗洛伊德,并列出了每个人撰写的一本或一本以上著作的名称。

下面的清单是依据《如何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两个版本的附录列出的著名作者和名著以及其他材料编辑而成的,只有少数完全符合真正名著的标准,超过半数充其量只是接近标准。

(1) 荷马(Homer)(公元前 9 世纪)、《伊利亚特》(*Iliad*)、

《奥德赛》(*Odyessey*)

(2) 旧约圣经(*The Old Testament*)

(3)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公元前 525—公元前 456 年):《埃斯库罗斯悲剧》(*Tragedies*)

(4)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 495—公元前 406 年):《索福克勒斯悲剧》(*Tragedies*)

(5) 希罗多得(*Herodotus*)(约公元前 484—公元前 425 年):《波斯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

(6)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 485—公元前 406 年):《欧里庇得斯悲剧》(*Tragedies*)

(7)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400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8)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7 年):《医学著作》(*Medical Writings*)

(9)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 448—公元前 380 年):《阿里斯托芬喜剧》(*Comedies*)

(10)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对话》(*Dialogues*)

(11)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亚里士多德著作》(*Works*)

(12) 伊壁鸠鲁(*Epicurus*)(约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 年):《致希罗多得的信》(*Letter to Herodotus*)、《致梅诺斯埃的信》(*Letter to Menoecus*)

(13) 欧几里得(*Euclid*)(活跃时期约公元前 300 年):《几何原理》(*Elements of geometry*)

(14)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 287—公元前 212

年):《阿基米德著作》(*Works*)

(15)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活动时期约公元前240年):《圆锥曲线》(*On Conic Section*)

(16)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西塞罗著作》(*Works*)

(17) 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5—公元前55年):《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

(18)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维吉尔著作》(*Works*)

(19) 普罗塔克(Plutarch)(约公元45—120年):《论希腊、罗马、摩拉维亚的贵族生活》(*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Moralia*)

(20)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17年):《历史》(*Histories*)、《(塔西佗)编年史》(*Annals*)、《阿格里科拉传》(*Agricola*)、《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21) 尼科马科斯(Nicomachus of Gerasa)(活跃时期约公元100年):《算术引论》(*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

(22)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60—120年):《谈话录》(*Discourses*)、《手册》(*Handbook*)

(23) 托勒密(Ptolemy)(约公元100—178年,活动时期公元127—151年):《天文学大成》(*Almagest*)

(24) 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默念》(*Meditations*)

(25) 加伦(Galen)(约公元130—200年):《自然官能论》(*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26) 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

(27)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约公元 354—430 年):  
《奥古斯丁著作》(*Works*)

(28)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公元  
1225—1274 年):《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29) 但丁(Dante Alighieri)(公元 1265—1321 年):《但丁  
著作》(*Works*)

(30)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公元 1340—1400  
年):《乔叟著作》(*Works*)

(31)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约公元  
1469—1527 年):《君主论》(*The Prince*)、《论蒂托·李维的最初  
10 年》(*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

(32) 狄赛德里奥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公  
元 1466—1536 年):《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

(33) 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公元  
1473—1543 年):《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  
enly Bodies*)

(34)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约公元 1478—1535  
年):《乌托邦》(*Utopia*)

(3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公元 1483—1546 年):  
《三部著作》(*Three Treatises*)、《桌上谈(主恩)》(*Table-Talk*)

(36)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公元  
1495—1553 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巨人传》)(*Gargan-  
tua and Pantagruel*)

(37)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公元 1509—1564 年):  
《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38) 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公元 1533—



1592):《随笔集》(*Essays*)

(39) 威廉·吉伯(William Gilbert)(公元1540—1603年):《论磁石、磁体和地球大磁石》(*On the Loadstone and Magnetic Bodies*)

(40)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公元1547—1616年):《堂吉诃德》(*Don Quixote*)

(41)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公元1561—1626年):《论说文集》(*Essays*)、《科学推进论》(*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新工具》(*Novum Organum*)、《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42)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公元1564—1616年):《莎士比亚著作》(*Works*)

(43)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公元1564—1642):《星辰的使者》(*The Starry Messenger*)、《两种新科学的对话》(*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44) 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公元1571—1630年):《哥白尼天文学概要》(*Epitome of Copernican Astronomy*)、《宇宙和谐论》(*Concerning the Harmonies of the World*)

(45)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公元1588—1679):《动物心血运动的研究》(*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血液循环的研究》(*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论动物的生殖》(*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46)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公元1588—1679年):《利维坦》(*Leviathan*)

(47)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公元1596—1650年):《理解方法的准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Under-*

*standing*)、《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几何学》(*Geometry*)、《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48)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公元1608—1674年):  
《弥尔顿著作》

(49) 莫里哀(Molière)(公元1622—1673年):《莫里哀喜剧》(*Comedies*)

(50) 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公元1623—1662年):《致外省人信札》(*The Provincial letters*)、《思想录》(*Pensées*)、《科学著作》(*Scientific treatises*)

(51)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公元1629—1695年):《论光》(*Treatise on Light*)

(52) 本尼狄克·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公元1632—1677年):《伦理学》(*Ethics*)

(53) 约翰·洛克(John Locke)(公元1632—1704年):《论宽容的信札》(*A Letter on Toleration*)、《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54) 让-蒂斯特·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公元1639—1699年):《拉辛悲剧》(*Tragedies*)

(55) 伊萨·牛顿(Isaac Newton)(公元1642—172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光学》(*Optics*)

(56) 戈特夫里德·威廉·冯·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公元1646—1716年):《谈形而上学》(*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神正论》(*Theodicy*)、《单子论》(*Monadology*)

(57)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公元1660—1731年):

《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58) 约拿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公元1667—1745年):《一只澡盆的故事》(*A Tale of a Tub*)、《给斯特拉的信》(*Journal to Stella*)、《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59) 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公元1670—1729年):《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

(60) 乔治·伯克利(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公元1685—1753年):《人类和知识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61) 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公元1689—1755年):《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

(62) 伏泰尔(Voltaire)(公元1694—1778年):《哲学通信》(*Letters on the English*)、《老实人》(*Candide*)、《米克罗梅加斯》(*Micromégas*)

(63)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公元1707—1754年):《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Tom Jones*)

(64)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公元1709—1784年):《人类欲望的虚幻》(*A Vanity of Human Wishes*)、《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Rasselas*)、《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Poets*)

(65)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1776年):《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道德原理研究》(*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人类理智的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66)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公元 1712—1778 年):《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论经济政策》(*On Political Economy*)、《爱弥儿》(*Émile*)、《社会契约》(*The Social Contract*)

(67) 劳伦斯·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公元 1713—1768 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感伤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68)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公元 1711—1776 年):《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69) 伊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公元 1724—1804 年):《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永久和平论》(*On Perpetual Peace*)

(70)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公元 1737—1794 年):《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回忆录》(*Autobiography*)

(71) 詹姆斯·鲍斯韦尔 (James Boswell) (公元 1740—1795 年):《伦敦杂志》(*Journals*)、《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 D.*)

(72) 安东尼·洛朗·拉瓦锡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公元 1743—1794 年):《化学元素》(*Elements of Chemistry*)

(73) 约翰·杰伊(John Jay)(公元1745—1829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公元1751—1836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公元1757—1804年):《联邦文件》(*The Federalist Papers*)

(74) 约翰内·沃尔夫甘·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公元1749—1832年):《浮士德》(*Faust*)、《诗与真》(*Poetry and Truth*)

(75) 约翰·道耳顿(John Dalton)(公元1766—1844年):《化学原理的新体系》(*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

(76)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公元1770—1831年):《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右派哲学》(*The Philosophy*)、《历史哲学的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77) 简·奥斯汀(Jane Austen)(公元1775—1817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

(78)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战争论》(*On War*)

(79) 司汤达(Stendhal)(公元1783—1842年):《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巴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论爱情》(*On Love*)

(80)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公元1788—1860年):《意志和表象的世界》(*On the Fourfold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81)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公元1791—1867年):《电(学)的试验性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82) 查理斯·赖尔(Charles Lyell)(公元1797—1875年):  
《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

(83) 奥古斯塔·孔德(Auguste Comte)(公元1798—1857年):  
《实证哲学》(*The Positive Philosophy*)

(84) 洪诺留·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公元1799—1850年):  
《高老头》(*Le Père Goriot*)、《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

(85) 阿列克塞·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公元1805—1873年):  
《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86)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公元1799—1850年):  
《自由论》(*On Liberty*)、《代议制研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女人的屈从》(又译《女人之卑屈》)(*The Subjection of Women*)、  
《穆勒自传》(*Autobiography*)

(87)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公元1809—1882年):  
《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88)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公元1812—1870年):  
《狄更斯著作》

(89) 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公元1813—1878年):  
《实验医学研究导言》(*An 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90) 瑟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公元1813—1855年):  
《非此即彼:生活的一个断片》(*Either/Or*)、《恐惧和战栗》(*Fear and Trembling*)、  
《对死的厌倦》(*The Sickness Unto Death*)、《对于哲学断片的非科学的附言的结论》(*The Conclud-*

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91)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公元1818—1883年):《资本论》(*Capital*)

(92)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公元1819—1880年):《亚当·比德》(*Adam Bede*)、《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

(9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公元1819—1891年):《白鲸》(*Moby Dick*)、《毕利·伯德》(*Billy Budd*)

(94)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公元1821—1881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白痴》(*The Idiot*)、《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95) 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公元1821—1880年):《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96) 亨利·易卜生(Henrik Ibsen)(公元1828—1906年):《易卜生戏剧》(*Plays*)

(97) 列昂·托尔斯泰(Leo Tolstoy)(公元1828—1910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

(98) 狄德金(J. W. R. Dedekind)(公元1831—1910年):《代数数论》(*Essays on the Theory of Numbers*)

(99) 马克·吐温(Mark Twain)(公元1828—1910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00)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公元1842—1910年):《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宗教经验变异》(*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01) 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

zsche)(公元 1844—1900 年):《善与恶之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道德体系论》(*The Genealogy of Morals*)

(102) 乔治·康托尔(Georg Cantor)(公元 1845—1918 年):《集合一般理论的基础》(*The Theory of Transfinite Numbers*)

(103) 西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公元 1856—1939 年):《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文明与偏见》(*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新精神分析引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04) 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公元 1862—1914 年):《几何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 二、公元 1900 年至今

当我们进入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时,我们似乎可以适当地问问自己,哪些具有持久的人文主义意义的书籍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中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名著”这个词不应成为一个障碍。我们用这个词,而不用“经典著作”,是因为后者有一种持久的文化纪念碑的含义,而不是代表当代的一部永恒的著作,这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说一本好书值得仔细阅读一遍,一本更好的书——一本名著——值得仔细阅读两遍或三遍,那么一本最好的名著就值得反复阅读——没有结束的时候。在西方,20 世纪前的文明产生的书籍中,只有极少数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认为最多不超过 15 本。

但是对于评判 20 世纪的主要贡献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它将要求我们将它们视同荷马、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和康德的著作,具有永恒的人文意义。还是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会推荐哪些20世纪的作者与著作加入具有持久意义的重要著作的大家庭,即使它们不是无休止地可以重新阅读下去。

我承认,在确定候选者名单时,存在着文化上的地域主义,也就是将我们的视野局限于西方文化的范围。迄今为止没有人编纂过一份世界名著的清单,完全代表世界上五种或六种主要的文化;迄今为止也没有人在这五种或六种文化汇合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时,确定过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那些著作。因此,至少在目前,让我们只限于探讨本世纪西方文化的重大贡献。

20世纪还没有结束,它的前88年远远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考察了1900年以来文学、哲学、科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著作之后,人们会深深地意识到,这个世纪在文化上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0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个阶段从1945年至今。从1989年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是否和上述的第二个阶段一致,或成为不同的第三个阶段,每个人都可以猜想。当我开始提名我自己的20世纪著名著作的候选人时,我立刻明显地感觉到,提名第一个阶段的作者及其著作比提名第二个阶段的作者及其著作对我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在时间上离这些著作更远,因而对这些著作有更好的视野;但是我也倾向于认为还有别的原因。

在1900至1945年间出现的主要著作,其作者自身的教育和文化灵感仍然源自于19世纪的文学和知识成就。因此第一个阶段的重要著作的总体特性与前一个世纪的名著更加

类似。1945 年以后的作者及其著作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之所以很难在第二阶段提出同样多的作者及其著作,不仅是因为它比第一个阶段离现在更近,还因为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基本的文化裂痕,这种文化裂痕导致人们对具有持久人文意义的东西的判断标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此外,尽管 20 世纪第一个阶段文学和哲学领域主要著作的产生与 19 世纪具有同样的特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重大的科学贡献大都出现在高度技术化和专业化的论文当中,其读者不是一般的、好奇的和聪明的非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可以愉快地阅读拉瓦锡(Lavoisier)的《化学元素》、法拉第(Faraday)的《电(学)的试验性研究》、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并从中受益,这类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在 20 世纪如果有的话,也非常少见。在行为科学方面,也没有多少著作可以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原理》及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概论》相提并论。

因此,当我们提名 20 世纪的科学著作时,除了考虑著作的内在价值之外,我们必须再加上一个标准,即著作对于聪明的非专业人士的易读性和可读性。

最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值得我们考虑,即对于 20 世纪可以产生持久的人文意义的著作,在数量上我们可以有多少合理的预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前面 25 个世纪的统计中得到某些启发。我们可以将“西方名著丛书”中的统计作为一个很好的指标,在那组统计中,有 38 名作者代表了从荷马到现代初期的 2000 多年时间,有 36 名作者代表了过去的 300 年时间,其中 12 名属于 17 世纪(通常被称为“天才的世纪”),13 名

属于 18 世纪,11 名属于 19 世纪。考虑到 20 世纪撰写和出版的书籍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这个事实,人们可以预期 20 世纪大量的出版物中涌现出来的名著将超过以往的任何世纪。

因此,在考虑候选作者时,我们的目标是至少选择 20 名来自于 20 世纪的作者。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记住我们现在考虑的作者仅仅是从 1900 年之后的第一个 45 年中选出,我们必须为最后的 43 年左右时间预留位置;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从提名的作者当中只选择不超过 15 名作者。

明确了这些条件之后,我愿意尽可能提名一些作者及其著作,以便从中作出最后的选择。我急于承认我的提名可能包含着偏见,是因为我本人就是 20 世纪第一个阶段的产物,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流行的那些思想和信条,我的知识和文化结构与 19 世纪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然而,不论有多少价值,我在这里由易至难地提出我的一些候选作者;首先列出的是 1900 年至 1945 年间的作者及其著作,再列出 1945 年以来的作者及其著作;在每个阶段,首先列出文学(戏剧、小说、诗歌)领域的杰出著作,然后列出哲学和神学领域的杰出著作,最后列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以及历史学领域杰出著作。

#### 1. 公元 1900 至 1945 年

##### 文学(戏剧、小说、诗歌)

(1)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伤心之家》(*Heart-*

*break House*)、《圣女贞德》(*Saint Joan*)

(2)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青年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尤利西斯》(*Ulysses*)

(3) 马赛·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4) 托马斯·曼(Thomas Mann):《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约瑟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others*)

(5) 约瑟·康拉德(Joseph Conrad):《诺斯特罗莫》(*Nostromo*)、《特务》(*The Secret Sharer*)、《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

(6)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萨托里斯》(*Sartoris*)、《声音与疯狂》(*The Sound and the Fury*)、《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

(7) 劳伦斯(D. H. Lawrence):《儿子和情人》(*Sons and Lovers*)、《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8) 艾略特(T. S. Eliot):《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荒原》(*The Wasteland*)

(9)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审判》(*Trial*)、《城堡》(*Castle*)

(10) 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三姊妹》(*The Three Sisters*)、《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

(11)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12)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黛西·密勒》(*Daisy*

Miller)、《专使》(*The Ambassadors*)、《螺丝在拧转》(*The Turn of the Screw*)

(13) 鲁德雅·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王者》(*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 哲学、神学、宗教

(1)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Pragmatism*)、《多元论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哲学中的一些问题》(*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2) 约翰·杜威(John Dewey):《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必然事实的探索》(*The Quest for Certainty*)、《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

(3) 阿尔弗烈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数学纲要》(*A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s and the Modern World*)、《观念的历险》(*Adventures of Ideas*)

(4) 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数学纲要》(*A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哲学中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5)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怀疑主义和有生气的信仰》(*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6) 埃蒂内·吉尔松(Étienne Gilson):《哲学经验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

(7) 让-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8) 约瑟·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Revolt Y Gasset):《群众

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 自然科学

(1) 马克思·普朗克(Max Planck):《科学的出路》(*Where Is Science Going*)、《物理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ysics*)、《科学自传》(*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狭义相对论》(*Sidelights on Relativity*)、《相对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理论物理学的方法》(*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

(3) 尼尔·玻尔(Niels Bohr):《原子物理和人类知识》(*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

(4) 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

(5) 约瑟·H·伍德格(Joseph H. Woodger):《生物学原理》(*Biological Principles*)

(6) 尤莉斯—亨利·庞加莱(Jules-Henri Poincaré):《科学与假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

(7) 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遗传学与物种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 社会或行为科学和历史学

(1) 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暴力论》(*Reflections on Violence*)

(2)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俄罗斯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尼古拉·列宁(Nicolai Lenin):《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4) 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民风》(*Folkways*)

(5)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学短论》(*Essays in Sociology*)

(6) R·H·托尼(R. H. Tawney):《贪得无厌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7)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20 世纪的第一个阶段的重要著作就是这些。在我转到第二个阶段前,也许我应该提一提我曾经考虑过的其他一些 1900 年至 1945 年间的作者及其著作,它们包括: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造进化论》和《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泉源》;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人类的命运》和《希望》;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伪币犯》;亨利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一个小丑的看法》;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黛洛维夫人》;赖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人类的本性和命运》;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伟大转变》。

现在,让我们考虑 20 世纪第二个阶段的一些作者和著作的清单,这个清单比起上一个要短许多,时间跨度从 1945 年到现在。

## 2. 公元 1945 年至今

### 文学(戏剧、小说和诗歌)

- (1) 阿尔贝特·加缪(Albert Camus):《鼠疫》(*The Plague*)、《堕落》(*The Fall*)、《局外人》(*The Stranger*)
- (2)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兽园》(*Animal Farm*)
- (3) 托马斯·平钦(Thomas Pynchon):《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 (4)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癌病房》(*Cancer Ward*)、《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
- (5) 扫罗·贝洛(Saul Bellow):《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赫尔索格》(*Herzog*)
- (6)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最后一局》(*Endgame*)

### 哲学、神学和宗教

- (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 (2)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 (3) 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但以理》(*I and Thou*)

### 自然科学

- (1) 维尔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原子核科学的哲学问题》(*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Nuclear Science*)、《物理学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物理学及其超越》(*Physics and Beyond*)



(2)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偶然性与必然性》(*Chance and Necessity*)

(3) 理查·菲利普斯·费因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物理学讲演集》

(4) 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 社会或行为科学和历史

(1)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文明的审判》(*Civilization on Trial*)

(2)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

(3) 克劳德·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野蛮的思考》(*The Savage Mind*)、《生食和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

(4) 费尔南德·布劳德(Fernand Braudel):《历史论》(*On History*)、《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5) 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历史学家的领域》(*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我提出的从1945年至今的作者及其著作清单似乎是不够的,我认为这非常可悲。是不是我19世纪的思维方式使我对20世纪前45年的文学和知识成果能够作出评判,而对代表了后面近40年的艺术和知识文化的书籍中的那些显然我也不那么认同的价值却视而不见?如果我的这种怀疑是真实的,那么我就需要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比我年轻的人的帮助,因为他们更加符合当前主流思想和意识的变化。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跋